

第一章 哲学家的偏见

1

真理意志注定诱使我们做许多冒险事业，所有哲学家迄今都怀着敬意谈论过真理之中的那无人知晓的真实性，又有什么问题是它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提出的是些多么叫人觉得奇怪、令人困惑、成问题的问题！说来话长，然而又似乎还没有开始。如果我们变得不再轻信，失去耐心，不再烦地躲开，那有什么奇怪？不正是这个斯芬克斯最终教会了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吗？究竟是谁在这里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内心的这个“真理意志”究竟是什么？的确，我们曾长久地停下来思考这种意志来自何处——以致我们最终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一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我们质询这种意志的价值。假定我们需要真理，那为何不需要虚妄？不需要不确定性？甚至无知呢？真理的价值问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抑或是我们自己站到了这一问题面前？在这里，哪一方是俄狄浦斯？哪一方是斯芬克斯？这似乎是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问号。怎能让人相信，这问题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察觉到了它，瞥见到了，大着胆子提出了它。因为提出它是有危险的，或许没有比这更大



的危險。

2

事物怎能源自其对立面？譬如，真理源自谬误，真理意志源自欺骗意志，慷慨源自自私，智者的慧心源自贪婪。这是不可能的；谁这样想谁就是傻瓜，而且是傻瓜中的傻瓜；具有最高价值的事物肯定有不同的根源，有其自己的根源——它们的根源不会是在这个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不实、卑鄙龌龊的世界上，不会在这一团妄想与贪婪之中，而是在神的怀抱中，在永恒中，在匿而不露的上帝那里，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源一定在那里，决不会是在别处！这种推理方式暴露了一种典型的偏见，借此可识别出所有时代的玄学家，这种评估方式隐藏在他们全部的逻辑方法背后；依靠在这种“信念”之中，他们尽力探求“知识”，探求某种最终庄严地冠以“真理”之名的东西。玄学家的根本信念是相信价值的对立，就连他们当中最谨慎的人，也未在一开始就提出疑问（正是在开始时最需要提出疑问），尽管他们庄严地发誓：“*de omnibus dubitandum*。”因为首先可怀疑的是，究竟是否存在对立；其次可怀疑的是，玄学家认可的普通评估和价值对立，难道不会仅仅是肤浅的推测，仅仅是一时的想法，何况还很可能是产生于某一角落，也许产生于地狱——或借用时下画家常用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青蛙透视画法”。尽管可把许许多多价值归于真实、明确和无私，但一般说来，仍可赋予虚伪、欺骗意志、

自私和贪婪以更高、更基本的生活价值。甚至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其价值所在可能正是暗中与那些邪恶的、显然对立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于实质上正与它们别无二致。但哪一个愿意与这种危险的“猜想”沾边！要想考察这种猜想，必须等待出现新型的哲学家，他们将有别样的趣味和志向，与迄今流行的那些相反——一些名副其实地做危险“猜想”的哲学家。说实在的，我已看见这种新型哲学家开始出现。

3

我一直注意着哲学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文字，此刻我暗自思量，大部分自觉的思维肯定属于本能活动，就连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人们须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对遗传和“天赋”已有新的了解。正像生育行为在整个遗传过程中的作用很少被考虑过，“自觉”也很少与真正意义上的本能相对比。哲学家的大部分自觉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受本能影响，被逼入一定的轨道。在其全部条理性和看似自主的活动背后，有评估，或明白些说，有哲学家对维持特定生活方式的需要。譬如，确定的事物比不确定的事物有价值，虚幻不如“真实”有价值：这种评估尽管对于我们有调节上的重要性，但仍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评估，是特殊种类的无知，只是维持像我们自己这样的生物所需要的。总之，个人并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

.....



4

我们以为，一种意见的虚假性并不是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也许正是在此处，我们的新鲜话语听起来极其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一种意见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生存、维护生存、维护人类或养育人类。从根本上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虚假的意见（综合判断先验地属于虚假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最最必不可少的；不承认逻辑的虚构，不将现实与纯粹想像的绝对和永恒世界相比较，不经常用数字仿造世界，人就无法生存——放弃虚假的意见就是放弃生存，否定生存。承认不真实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吧。这肯定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危险责难，因而胆敢这样做的哲学便将自己孤零零地置于善恶的彼岸。

5

人们之所以半信半疑、半嘲笑地看待哲学家，并不是因为常常发现他们多么无知——多么频繁和容易犯错误，并迷失道路，一句话，多么孩子气，多么幼稚——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哪怕最隐晦地提及真诚问题，他们也都会立即大声义正词严地表示抗议。他们都摆出一副样子，似乎自己的真知灼见是通过冷酷的、纯粹的、绝对不偏不倚的辩证法的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得到的（这与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者形成了对照，他们光

明正大而傻里傻气地谈论“神的启示”）；可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思想或“建议”，是带有偏见的，是他们内心欲望的抽象和精炼，他们总是用事后寻求到的论据为其辩护。他们都是鼓吹者，而又不希望别人作如是观，也都是自己偏见的狡猾辩护者，却将自己的偏见称作“真理”，——决无勇敢承认这一切的良心，亦决无风度和勇气让朋友或敌人明白这一切，更不用说以欢娱的自信和自嘲态度做到这一点了。上了年纪的康德，穿得笔挺而讲究，把人们诱入了辩证法的小道，沿着这条小道，又把人们引向了（或更正确地说，错误地引向了）他的“绝对命令”。但康德的伪善，只是令我们这些挑剔者付之一笑，饶有兴味地觉察出了老道德学家和道德说教者的阴险伎俩。更加可笑的是，披着数学外衣的欺骗手法，如斯宾诺莎就是用数学给自己的哲学穿上铠甲和戴上假面具的——实际上，说得明白些，他的哲学就是“对他的智慧的热爱”——以此恐吓胆敢瞥看和攻击那一无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人：——一个病恹恹的隐士用这种伪装，暴露出他是何等的胆怯脆弱！

6

我已逐渐看清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是由什么构成的——即看到了其创立者的自白书，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传；并认识到每种哲学中的道德（或非道德）目的，是长成整个植物的真正活胚芽。的确，要想理解一个哲学家极其深奥的形而上学主张是如何得出来的，最好先问一下自己（这也是聪明的



做法)：“他们(或他)以何种道德观为目的？”因此，我不相信“求知的冲动”是哲学之父；而认为另一种冲动，在此处同在别处一样，把知识(以及错误的知识!)当作一种工具。但无论是谁，在考察人的各种基本冲动以确定它们作为鼓舞人的神灵起多大的作用时，都会发现，这些冲动都在这时或那时作过哲学思考，每一种动机都非常乐于将自己视为存在的最终目的，视为统领所有其他冲动的合法君主。因为每一种冲动都很傲慢，其本身都试图作哲学思考。诚然，就学者来说，就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情况“较好”。在他们那里，可能真的有诸如“求知欲望”那样的东西，有某种小巧而独立的钟表机械，上紧发条，便会不知疲倦地走到终点，其他冲突不会对其有任何大的损耗。所以，学者的实际“兴趣”一般在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家庭上，或在赚钱上，或在政治上；实际上，他的小机械用在哪一研究领域，年轻的他是成为优秀的语言学家或蘑菇专家，还是成为化学家，都几乎无关紧要。他的特征不是成为这或成为那。相反地，在哲学家身上，则绝对没有不带人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道德观，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是谁——也就是说，证明了他本性中最深层的各种冲动，是以何种顺序排列的。

7

哲学家多么恶毒啊！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什么比伊壁鸠鲁随意拿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开的玩笑更尖酸刻薄了；他称他们为

Dionysiokolakes。这个词的原意和表面意思是“狄奥尼西奥斯的奉承者”——因而也就是暴君的帮凶和马屁精。除此之外，这个玩笑还等于说：“他们都是戏子，他们毫无真诚可言。”（因为 Dionysiokolax 一词也是戏子的俗称）。这是伊壁鸠鲁对柏拉图的恶毒污辱：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很会装腔作势，很有舞台风格，而伊壁鸠鲁却不会！他为此感到恼火。伊壁鸠鲁，这位萨摩斯岛上年长的学校老师，隐居于他在雅典的小花园中，写出了三百多本书，也许是出于愤怒，出于对柏拉图的强烈忌妒，谁知道呢！希腊过了好几百年才看清了这位伊壁鸠鲁学派偶像的真面目。希腊究竟看清了没有？

8

每一种哲学中都有一处显露出哲学家的“信仰”；或用一古老谜语中的话来说是：

Adventavit asinus .

Pulcher et fortissimus.

9

你们想要“顺应自然”而生活？啊，你们这些高尚的斯多噶派成员，玩弄的是什么文字把戏！想像你们自己是像自然一样的存在物，无限地奢侈，无限地冷漠，没有目标或思虑，没



有怜悯或正义，既果实累累，又颗粒无收，且变化无常；想像你们自己是一种冷漠的力量——你们怎能顺应这种冷漠而生活？生活——不正是力图与这自然不一样吗？生活不就是评价，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事物，不公平、受限制，力图与其不一样吗？就算你们那“顺应自然而生活”的命令，实际上意味着“顺应生活而生活”——你们又怎能生活得有所不同？你们为何要根据你们所认可和不得不认可的东西提出一条原则？其实，你们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你们假装狂喜地辨读你们的自然规则的准则，但是想要的却完全与此相反，你们这些出色的舞台演员，自欺欺人者！你们傲慢地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强加给自然、强加给自然本身，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纳入自然之中；你们坚持认为，应该是自然“顺应斯多噶”，想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切，塑造成永远光辉灿烂，无所不包的斯多噶主义！你们虽然热爱真理，却长久以来那么顽固，那么死板地以虚假眼光，即以斯多噶派眼光看自然，以致你们已不能再以其他眼光看自然——尤其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傲慢使你们疯狂地抱有希望；既然你们能暴虐地对待自己——斯多噶主义就是自虐——自然也将听任自己被暴虐地对待：斯多噶派不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吗？……但这只不过是个古老而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过去斯多噶派发生的事，今天仍在发生；只要一种哲学开始自信，它就总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它无法用别的办法创造世界；哲学就是这种暴虐的冲动本身，就是最神圣的权力意志，“创造世界”的意志，探求第一原因的意志。

10

当前整个欧洲都在讨论“真实而明显的世界”问题，讨论得那么热烈、精细，甚至可以说巧妙，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谁要是只听说其背后有“真理意志”，而没有听说有别的东西，那他就不能吹嘘自己的耳朵最敏锐。在极少数的个别情况下，这种真理意志——某种过大而危险的勇气，玄学家的某种带有绝望色彩的勇气——可能确实碰巧起了作用，从而最终总是宁愿要一把“确定性”，也不要一整车漂亮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有凭良心行事的狂热清教徒，他们宁愿最终相信确实实的无，也不愿相信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但那是虚无主义，是绝望的、极其疲惫的灵魂的象征，尽管这种美德可能表现出勇气。但一些较为强健、较有生气的思想家，仍渴望生活，他们似乎与上面那种人不同。他们反对现象，傲慢地谈论“透视法”；他们认为自己身体的可信性同“地球静止不动”这一视觉证据的可信性，几乎一样低，因而表面上便洋洋自得地把最可靠的占有物放跑了（目前还有什么比人们更坚信自己的身体呢？），——谁又晓得他们实际上不是企图收复某种过去更可靠的占有物呢？即某种从前的信仰，或许是“不死的灵魂”，或许是“造物主”，总之是某种思想。与“现代思想”相比，他们借此可生活得更好，更有活力，更快活。他们不相信现代思想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相信昨天和今天建构起来的东西；他们或许对此既有点餍足，又有点嘲笑，不再能忍受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思想，例如所



谓实证主义当今投放于市场上的那些思想；他们的趣味也许较为高雅，厌恶所有那些注重实际的半瓶子醋哲学家，厌恶他们那种集市摆摊式的东拼西凑、修修补补的作法。在他们那里，除了这种混杂外，既无新东西，又无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意当今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反实在论者和知识微观分析者；他们的本能具有无法否认的真实性，迫使他们抗拒时髦的现实……他们的倒退与我们何干！他们主要不是想“后退”，而是想离开。再多一点力量、冲力、勇气和艺术家的才能，他们便会脱离——而不是倒退！

11

我认为，目前人们总是力图不去注意康德对德国哲学产生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忽视他对自己的评价。康德首先对自己的“范畴表”感到骄傲；他手拿“范畴表”说：“这是为形而上学所能做的最难的事情。”那就让我们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所能”吧！他因发现了人的一种新能力而自豪。这种新能力就是先验综合判断。虽然康德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自己，但德国哲学的发展和迅速繁荣却依赖于他的自豪，依赖于年轻一代急于要与他竞争，努力去发现某种更值得自豪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发现“新的能力”。但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在正是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这样问自己——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依靠一种手段（能力）”——可不幸的是，人们并非只用这几个字，而是排场很大地，非常壮观地，在充

分显示德国人的深奥与雄辩、完全漠视的回答中，包含了德国人的可笑无知。人们对这种新能力高兴得发狂，当康德又发现了人的一种道德能力时，这种狂喜便达到了顶点——因为当时德国仍是讲道德的，尚未陷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于是便降临了德国哲学的蜜月。图宾根大学的所有年轻神学家立即涌入了小树林中——都去寻找“能力”。他们都找到了些什么啊？——在德国精神的那个无知、荒唐和依然年轻的年代，浪漫主义这个心存恶意的小仙子，一个劲地在那里吹喇叭、唱赞歌，而当时人们尚不能分辨“发现与发明”！特别是发现了一种“超越能力”。谢林称其为智力直觉，由此而满足了天生具有虔诚倾向的德国人非常急切的渴望。对于这场情绪激昂而偏执怪异的运动（它确实很年轻，尽管它用灰白苍老的概念作了化装），最不公正的待遇莫过于认真看待它，甚或满怀道德义愤地对待它。不过世界已变得很老，梦已消散。人们终于揉揉脑门，而且现在仍在揉脑门。人们原来在做梦，尤其是老康德在做梦。“依靠某种手段（能力）”——他说，或至少他想这么说。可这是回答吗？是解释吗？倒不如说仅仅是重复了一下问题吧。鸦片是怎么使人入睡的？莫里哀戏剧中的那个医生回答说，是“依靠某种手段（能力）”，即催眠作用：

Quia est in eo virtus dormitua,

Cujus est natura sensus assoupire.

但这样的回答只能用于喜剧中，现在该替换一下康德提出的“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而代之以另一问题，即“为什么必须相信这种判断？”——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为了保存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必须相信这种判断是真实的；



尽管它们当然仍可能是假言判断！或者说得更明白、更粗俗、更易懂些——先验综合判断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权拥有先验综合判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先验综合判断，只不过是假言判断。当然，仍必须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因为看似有理的信仰和视觉证据，属于透彻的人生观。最后，让我们想一想“德国哲学”——但愿你明白它有权享有引号——在整个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有某种催眠作用的参与；由于有德国哲学，各国高贵的懒汉们，正人君子们，神秘主义者，艺术家们，四分之三的基督教徒们，以及政治蒙昧主义者，高兴地找到了一副解毒剂，用来对付仍大行其道的感觉论，感觉论从上个世纪一直泛滥到本世纪，总之——“*sensus assoupire*”。

.....

12

唯物主义原子论是遭到最彻底驳斥的一种理论，目前在欧洲的学术界，除了日常方便地使用一下它（当作表达方式的一种省略）外，恐怕没有一个人学问低得去认真地看待它——这主要得归功于波兰人博斯科维奇：他与波兰人哥白尼是迄今反对视觉证据的最伟大、最成功的人。因为，哥白尼使我们确信，同感官所感觉到的相反，地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与此同时，博斯科维奇使我们摒弃了对实体、对物质、对土地残留物、对粒子—原子的信仰：这是地球上迄今为止，对感官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但人们必须走得更远，也对“原子论式的要求”宣



战，与其进行无情的血战，原子论式的要求，如较为著名的“形而上学要求”，仍在一些地方阴魂不散，无人对其提出质疑。尤其是，人们还必须给予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原子论致命的一击，这就是基督教向人们灌输得最深、最长久的灵魂原子论。让我们用这个词表示这样一种信念，它把灵魂视为某种不可摧毁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东西，视为单子，视为原子：应把这种信念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不过，在你我之间却完全没有必要消除掉“灵魂”，没有必要放弃最古老、最受人崇敬的假设之一——笨拙的自然主义者就常常放弃这个假设，他们几乎一谈及灵魂，就立即失去它。但却应该敞开大门接受新的灵魂假设并使原有的灵魂假设更完善，今后诸如“终有一死的灵魂”、“主观多样性的灵魂”，“作为本能与感情的社会结构的灵魂”等概念，应该在科学中享有合法权利。新心理学家即将结束那些迄今围绕灵魂观念繁茂生长的迷信想法，因而他实际上可以说正在将自己投入新的荒漠，新的怀疑——老心理学家们则可能过得惬意一些、舒适一些；不过，新心理学家最终会发现，正因为如此，他也注定要发明——说不定或许是发现新的东西。

13

心理学家应该仔细想一想再断言，自我保存本能是有机物的基本本能。生物首先力求释放自身的力量——生命本身是权力意志；自我保存只是其最常见的间接结果之一。总之，在这里就如同在别处一样，让我们警惕多余的目的论本能！——其



中之一就是自我保存本能（我们认为它产生于斯宾诺莎的自相矛盾）。因而它实际上是那种自相矛盾方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必然节省了本能。

14

也许只有五、六个人刚刚醒悟，自然哲学只是对世界的展示和对世界的排列（但愿我可以这么说！），而不是对世界的解释。但只要自然哲学的基础是相信感官，它就会被视为更多的东西，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会被视为更多的东西——即被视为一种解释。它有自己的眼睛和手指，有自己的视觉证据和可感知性：这会对贫民趣味占优势的时代产生使人神魂颠倒、使人心悦诚服、使人确信不疑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在本能地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即大众欢迎的不配的感觉论是真实的。明白了什么？“解释”了什么？——仅仅是能被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人们对每一个问题只能问到这儿。不过，与此相对照，柏拉图的思维方式是贵族式的，其魅力恰恰在于同明显的感官证据相对抗——也许是对这样一些人魅力，他们拥有比我们同时代人更强有力、更挑剔的感官，但他们知道如何较为成功地控制感官；他们用灰白而冷酷的概念网来控制感官，用概念网罩住一团混乱的感官——或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罩住这群感官暴徒。他们用柏拉图方式战胜世界和解释世界所得到的享受，不同于当今物理学家向我们提供的享受——也不同于生理学家当中的达尔文主义者和反目的论者，他们的信条

是“以尽可能小的努力”，犯尽可能大的错误。“在没有更多东西可看、可理解的地方，也就没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这个命令确实不同于柏拉图的命令，但对于未来能吃苦且勤劳的机械师和桥梁建筑师来说，却可能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们只配干粗活。

15

要问心无愧地研究生理学，就得坚持认为，感觉器官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它们本身确实不能是原因！所以，感觉论即使不是探索性原则，至少也是调节性假设。什么？另一些人不也甚至说，外部世界是我们器官的产物吗？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作为这个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便是我们器官的产物了！于是，我们的器官本身也就是我们器官的产物了！在我看来，如果自因这个概念是某种根本荒谬的东西，那么以上便是完整的归谬法。所以，外部世界不是我们器官的产物——？

16

仍然有一些无恶意的自我观察者相信有“直接确实性”；譬如，“我思”，或像叔本华常说，“我运用意志的力量”；似乎认识能力在此不折不扣地抓住了客体，抓住了“自在之物”。无



论是在主体方面，还是在客体方面，都无虚假行为。然而，我要再重复一百遍，“直接的确定性”，以及“绝对知识”和“自在之物”，包含有词语的相互矛盾；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摆脱词语使人产生误解的涵义！人们也许认为，认识能力正在认识有关事物的一切，但哲学家必须对自己说：“当我分析‘我思’这个句子表达的过程时，我发现了一系列大胆的断言，很难或也许不可能对其进行论证式的证明。譬如，是我在思，必定有某种东西在思，思是一存在物的活动，这个存在物被视为原因，有一个‘自我’，最后，已经确定了思指的是什么——我知道什么是思。因为如果我内心尚未决定它是什么，那我如何根据什么标准，确定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许不是‘意志’或‘感情’呢？总之，‘我思’这个断言，假设了我拿我当前的状况与我所知道的我自己的其他状况相比较，以确定它是什么；由于具有这种与其他‘知识’的回忆性联系，它无论如何对我而言，都没有直接的确定性。”——因此，与普通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能相信“直接的确定性”不同，哲学家发现有人向他提出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一些有关智力的真正良心问题，即：“我是从何处得到‘思’这个观念的？我为何相信原因和结果？是什么赋予我谈论‘自我’的权利，甚至把‘自我’说成原因，把‘自我’不容置疑地说成思维的原因？”谁敢借助于某种直觉立即回答这些形而上学问题，而说“我思，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确实的”，那他只会博得当今哲学家的一笑置之和两个问号。哲学家也许会对他说：“先生，你可能没有错，但是，为何这是真实的呢？”



17

关于逻辑学家的种种迷信想法，我将不厌其烦地强调一微小而简洁的事实，这个事实已被这些易于轻信的人不情愿地认识到了——那就是，当“思想”想要来时，“它”便会来，而当“我”想要它来时，它却不来；因而说主语“我”是谓语“思”的条件，是对事实的歪曲。或许可以说自己思；有人会说这个“自己”正是那个著名的旧“自我”，但委婉些说，这种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一种断言，无疑不是“直接的确定性”。毕竟，自己已对这种“自己思”产生了太多的影响——以至于“自己”包含有对这一过程的解释，而不属于这一过程本身。根据通常的语法规则，此处自己指的是——“思是一种活动；每一种活动都需要有一主动的动原；”因此……正是遵循这一基本相同的路线，旧原子论除了寻找起作用的“力量”外，还寻找这种力量所赖以存在和赖以作用的物质粒子——原子。不过，思维较严密的人，最终已学会了没有这种“土地残留物”也能过日子。也许甚至有一天，我们也能从逻辑学家的观点来看事物，习惯于没有那一渺小的“自己”（这是值得尊敬的旧“自我”的升华）也能过日子。

18

可以被反驳，的确不是一种理论的最小魅力；正因为可以



被反驳，它才引起思维缜密的人的注意。被千百遍反驳的“自由意志”理论之能够存留至今，似乎就仅仅是由于有这一魅力；经常会冒出某个人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反驳这一理论。

19

哲学家习惯于谈论意志，似乎意志是人尽皆知的东西；叔本华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只知道意志，绝对而完全地、不折不扣地知道。但我总是觉得，叔本华在这方面也只是做了哲学家惯于做的事情——他似乎采纳了普通的偏见，并予以夸大。我认为，运用意志力尤其是件复杂的事情，是件只是在名义上统一的事情——普通的偏见正是暗藏在名称中，由此而控制了所有时代不够警惕的哲学家。因此，让我们这次破例谨慎些吧！让我们“没有哲学性”吧！我们要说，运用各种意志力时，首先有多种感觉，即每当我们运用意志力做任何事情时，都会感觉到“我们所离开的”那种状态，感觉到“我们所趋向的”那种状态，感觉到这种“离开”和“趋向”本身，随后还有一种相伴随的肌肉感觉，这种感觉即使未使“四肢”运动起来，也会凭借习惯的力量开始起作用。因此，正如应该承认各种感觉（确实有许多种感觉）是意志的组成部分，其次还应承认思想；在每一意志行为中，都有一种主导思想；——别想像可以把这种思想与“运用意志力”分隔开，似乎意志便可以留存下来！第三，意志不仅是感觉和思想的复合体，而且还是一种情感，实际上是命令的情感。称作“意志自由”的东西，实

质上是优越于必须服从的情感：“我是自由的，‘他’必须服从。”——这种意识是每一种意志所固有的；每一种意志固有的东西还有注意力的紧张，对一件事情的专注，无条件的判断：“现在只需要做这件事情”，内心确信无疑：命令——以及其他属于命令者地位的东西，运用意志力的人在内心命令表示服从的东西，或他认为会表示服从的东西肯定会得到服从。但现在让我们留意一下有关意志的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意志这玩意儿极为复杂，但是人们对其只使用一个名称。由于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既是命令的一方，又是服从的一方，而作为服从的一方，我们一行使意志力，通常便开始有受拘束、受驱使、受压迫、反抗和行动等感觉；由于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忽视这种双重性，习惯于用综合性词语“我”来自我欺骗，所以有关意志本身的一整套错误结论和虚假判断，便附着在运用意志力的行为上——以致运用意志力者坚信，只要运用意志力便足以导致行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指望得到命令，因而服从，并从而行动的结果时，只是运用意志力，所以这种现象便自我转变成了感情，似乎有一种结果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运用意志力者相当有把握，确信意志和行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回事；他把意志力的运用归因于意志本身，因而越来越能感觉到伴随着所有意志力运用的力量。“意志自由”——人们用这个词表达运用意志力者的复杂喜悦心情，他下命令，同时又把自己等同于命令的执行者——他作为命令的执行者，也享受到克服障碍的喜悦，但内心却认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意志克服了障碍。这样，行使意志的人便在他作为下命令的喜悦心情之外，又加上了他卓有成效的执行工具，即有用的“潜意识”或潜



魂——的确，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许多灵魂构成的社会结构——的喜悦心情。结果就是我：此处发生的事情，也是在每一个组织良好的和睦国家内发生的事情，即统治阶级把自己等同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运用各种意志力时，所涉及的绝对是下命令和服从的问题，下命令和服从的基础，便是上面所说的由许多“灵魂”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这一原因，哲学家有权把运用意志力本身纳入道德领域——把道德学说视为至高无上关系的学说，“生命”现象便展现在这些至高无上的关系之下。

20

各种哲学思想并不是随意或自发形成的，而是相互连结、互相关联地生长起来的；不管它们似乎多么突然和任意地出现在思想史中，它们都正如某一大陆动物群的集体成员那样，属于一个体系——这一点最终由以下事情暴露了出来：迥然不同的哲学家，怎么总是不断地填写可能有的哲学所具有的一个明确的基本表格。在一看不见的符咒指引下，他们总是又一次在同一轨道上旋转；不管他们在批判意志或系统意志方面感到彼此多么不相干，他们内心中的某种东西总指引着他们，某种东西总从确定的顺序，一次又一次地驱使着他们——那就是固有的方法论及他们思想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不如说是一种重新认识，一种回忆、一种返回，返回到灵魂的遥远且古老的共同家园，他们的思想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到目前为止，做哲学思考只不过是一种最高级的返祖

现象。很容易解释为何所有印度人、希腊人和德国人的哲学思维，令人惊奇地相似。实际上，哪里由于有共同的语法规则——我指的是相同语法功能的无意识支配和指导——因此使得语言相类似，哪里也就从一开始便为哲学体系的相同发展和交替，准备好一切条件；恰似阻塞了对世界作出其他解释的道路，乌拉尔 - 阿尔泰语群（该语群内主语概念最不发达）地区的哲学家，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走上与印度、日耳曼人和穆斯林不同的思想道路，某些语法功能的符咒，最终也是哲学评价和种族气质的符咒——就说这么多吧，以此驳斥洛克关于观念起源的肤浅看法。

21

自因是迄今构想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最佳例子，是对逻辑的某种违反，是某种不自然的东西；但人却骄傲得很，力图把自己同这种蠢东西纠缠在一起，以显得深奥和吓人。想要享有最高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享有不幸地仍在受过点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意志自由，想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和最后的责任，想要免除上帝、世界、祖先、机会和社会的责任，这一切所涉及的正是要充当这种自因，而且无比大胆地想要揪着头发往上拉自己而成为存在，脱离虚无的泥潭。如果有谁由此而发现那一著名的“自由意志”概念是多么粗俗而愚蠢，并从头脑中完全清除这一概念，那我请求他把他的“启蒙运动”向前再推进一步，也从头脑中清除这一可怕的“自



由意志”概念的对立面：我指的是“非自由意志”，非自由意志相当于对原因和结果的误用。不应像自然哲学家（以及任何其他与自然哲学家一样归化于当前思维的人）遵从流行的傻里傻气的呆板作法，使原因向前挤和推，直至产生“结果”，以此错误地把“原因和结果”具体化。应该把“原因”和“结果”仅仅当作纯粹的概念，也就是说，当作约定的虚构，用以指称事物和彼此相互理解——而不是用于解释。“自在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没有“心理学上的不自由”；在那里，结果并不跟随在原因之后，在那里也没有“规律”。正是我们自己发明了原因、先后顺序、相互关系、约束、数字、规律、自由、动机和目的；当我们把这种符号世界解释为“自在之物”，将其与事物混为一谈时，我们就再一次像惯常所做的那样，在制造神话。“非自由意志”是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意志坚强和意志薄弱的问题。

当思想者谈论“因果关系”和“心理上的必然性”而表现出几分受强迫、穷酸、卑躬屈膝、受压迫和不自由时，这几乎总是一种征候，表明他内心缺少点什么；至少让人怀疑他有这种情绪——他自己暴露了自己。一般说来，如果我观察正确的话，应把“意志不自由”看作由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引起的问题，但仍总是由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引起的：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责任”，不愿放弃对自己的信任，不愿放弃对自己的优点享有的权利（虚荣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些人则相反，不愿对任何事情负责，不愿为任何事情受责备，并由于内心的自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事务的纠缠。后者在著书立说时，目前惯于站在罪犯的一边；某种社会主义者的同情心，是他们

喜欢采用的伪装。其实，这些意志薄弱者的宿命论，在冒充为“人类苦难的宗教”时，对自己作了令人惊奇的修饰；这就是它的“高尚趣味”。

22

请原谅，我是个老语文学家，总禁不住爱捣蛋，揭露各种恶劣的解释方式，但你们物理学家却那么骄傲地谈论“自然符合于规律”似乎是吧——不过，只是由于你们的解释和恶劣的“语文学”自然才符合规律的。“自然符合于规律”不是事实问题，不是“原文”，而只不过是原文意思所作的天真而富于人性的调节和歪曲，以此而对现代人的民主本能作出重大让步！“法律面前处处平等——自然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隐密动机的一个极好例子，与一切特权和专制相对立的情绪——也是另一种较为精致的无神论——再一次隐藏在其中。“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这也是你们所需要的；因此“为自然规律而欢呼！”——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如前所述，自然规律是解释，不是原文；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由于具有相反的意向和采用相反的解释方式，会在相同的“自然”和相同的现象中，仅仅看到人们专横地、不顾及他人，且无情地坚持、并强力要求——这个解释者会非常坚决地把所有“强力意志”的无例外性和无条件性，放到你们的眼前，以至于每一个词和“专横”这个词本身，最终都显得不合适，或显得像是个软绵绵的比喻——显得太人性了。但他最后会对



这个世界作出和你们一样的断言，即这个世界有一个“必然的”和“可计算的”进程，不过这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规律，而是因为绝对没有规律，每一个强力都时时刻刻要实现自己的最终结果。当然，这也仅仅是解释——你们是否会急于提出这种异议？——哟，那就更妙了。

23

全部心理学迄今都搁浅在道德偏见和胆怯上，它一直不敢驶入深海。由于可以从迄今所写出的东西中辨认出尚未说出的东西，因而似乎还没有谁像我那样把心理学视作形态学和强力意念发展学说。道德偏见的力量已深深渗入了几乎整个知识界（虽然知识界表面上不偏不倚，没有偏见），并显然已产生了有害的、阻碍性的、叫人看不清方向的、扭曲的作用。真正的生理—心理学不得不与研究者心中的无意识对立情绪作斗争，它的“心”是反对它的：就连“好”冲动与“坏”冲动互为条件的学说，也会在仍然强健而具有男子气概的良心中，引起痛苦和厌恶（将其视为高雅的不道德）。更不用说认为所有好冲动源自坏冲动的学说了。然而如果一个人把仇恨、忌妒、贪婪和傲慢等情感，看作调节生活的情感，看作普通生活中必须有的、基本而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如果生活要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些因素也必须进一步发展），那他就会因为有这种看法而像晕船那样感到难受。不过，这一假设决不是这一巨大而且几乎新的危险知识领域内最让人感到奇怪和最令人痛苦的假设；实际上

有许多正当理由避开它，但是谁又办得到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驾着小船漂流到这儿，哦！那可太好了！让我们咬紧牙关！睁大眼睛，牢牢掌好舵！我们驶过道德，破浪前进，勇敢地向那边驶去，摧毁我们自己身上残存的道德——可那有什么关系！从未有比这更为深邃的悟性世界，展现给勇敢的旅行者和冒险者，并作为回报，那因此而作出了牺牲——不是牺牲理智，而是相反！——的心理学家，至少将有权要求人们再次承认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皇后，由于有了她的服务和她所提供的知识，其他科学才得以存在。心理学将再一次成为研究各种根本问题的必经之路。





第二章 自由精神

24

哦，天真纯朴的人！人生活在多么叫人奇怪的简化与伪造中啊！人一旦留心看到这个奇迹，肯定会惊奇不已！我们是怎么把周围的一切弄得无挂无碍，舒适简单的！我们是怎么能够使我们的感觉容忍一切肤浅之物的，是怎么能够使我们的思想神圣无比地想要随意胡闹，想要作错误推理！我们怎么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地保持无知状态，以享受几乎不可想像的自由、无思想、轻率、热心和愉快——以此享受生活！迄今为止，只是在这一坚硬的、花岗岩般的、无知的基础之上，知识才得以建立起来，求知的意志建立在一更加强得多的意志之上，这个意志就是求无知、求不确定、求不真实的意志！不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对立面，而是看作对前者的提炼！的确，我们希望，语言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不要克服其尴尬处境，希望它在事物只是有逐渐变化和许多改进的地方，仍然谈论对立；我们同样希望，已道成肉身的虚伪道德（它们现在已属于我们不可战胜的“肉体”），将歪曲我们这些有识别力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不时地对其表示理解，对最高级的知识竭尽全力使我们待在这



个简化的、完全人造的、适当虚构的和适当伪造的世界上的方式，付之一笑，对它热爱谬见的方式，付之一笑，它之所以热爱谬见，是因为作为生活本身，它热爱生活！

25

在这样令人愉快地开始后，人们也许想听到严肃字眼；严肃字眼才合大多数一本正经者的心意。当心，你们这些哲学家和知识之友，留心不要因此殉难！留心不要“为了真理”而受苦！即便为了保护你们自己，也要留心啊！它损害了你良心中的天真无邪和优雅的中立；它使你听不进反对意见，动辄发怒；它使你在与危险、诽谤、怀疑、驱逐，甚至更恶劣的敌意行为作斗争时，变得丧失理智、兽性大发、残酷无比，最终使出最后一着，声称自己是地球上真理的保护者——似乎“真理”是个非常天真无邪的、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人来保护他！需要你们大家，你们这些一脸哀容的骑士、游手好闲的先生们和制造时代精神的人们！最后，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你们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你们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哲学家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你们知道，你们在自己特意说的话和自己特别喜欢的学说后面（以及偶尔在你们自身后面）加的每一个小问号，要比上诉人在法庭面前上演的所有严肃滑稽剧和玩弄的骗人把戏，有更值得称赞的真实性！还不如躲开的好！躲开、藏起来！带着你的各种假面具和各种诡计，以便把你误当作你现在的样子，

或担心你的样子！请不要忘记那个花园，那个有金花格凉亭的花园！把人们聚集在你周围的是花园，或者是白天已成记忆时的黄昏的水上音乐。选择有益的孤独吧，选择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轻松愉快的孤独吧，它亦将使你有权保持善，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善！每一场长期斗争都使人变得那么恶毒、那么狡猾、那么坏！长期斗争是不能明目张胆地用武力进行的。长期的恐惧，长期警惕着敌人——可能的敌人——会使人变得多么爱攻击别人啊！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些被长期追捕、遭到残酷迫害的人——以及被迫隐居的人，这些斯宾诺莎似的人，或吉奥达诺·布鲁诺似的人——最终总是在极其富于理智的伪装下，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有教养的复仇者和毒药的酿制者（只要揭穿斯宾诺莎伦理学和神学的基础就可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道德愤怒的愚蠢了。就一个哲学家而言，道德愤怒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已没有了哲学家的幽默感。哲学的殉难，他“为真理所作的牺牲”，暴露了隐藏在鼓动者和演员内心的东西；如果有人迄今一直以艺术家的好奇心打量哲学家，那便容易理解许多哲学家为何危险地想要看到自己也堕落（堕落成为“殉难者”堕落成为舞台上和讲坛上的大声喊叫者）。

26

每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都出于本能地寻求避难所和隐居处，在那里他可以摆脱人群，摆脱群众，摆脱多数人——在那里他可以忘却“作为规则的人们”，而成为例外；只是不包括这样的



情况，即一更加强烈的本能把他直接推向人群，以伟大而杰出的明辨是非者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谁，在与人们交往时，若不偶尔由于恶心、厌烦、同情、沮丧和休戚相关而痛苦得脸色一会儿发青、一会发白，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趣味高尚的人。不过，如果他并不主动挑起这个重担，并不对自己反感，假如他执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执意像我说的那样，静静地、高傲地待在避难所中，那么有一件事便是确定无疑的：他天生不是、也注定不是有学识的料。他这样的人有一天会不得不对自己说：“魔鬼剥夺了我的高尚情趣！但是‘规则’要比例外——比我自己，比我这个例外，更令人感兴趣！”于是他会感到垂头丧气，特别是会进入“内心世界”。长期而认真地研究普通人——因而尽量伪装自己，进行自我克制，表现出亲热的样子，作不自在的交往（除了与同等的人交往外，所有交往都是不自在的交往），构成了每一位哲学家个人经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许是最令人不快的、最令人作呕的、最令人扫兴的一部分。不过，如果他幸运的话，他作为知识的宠儿，会遇到合适的助手，这些助手会减少和减轻他的工作；我指的是所谓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只承认兽性，只承认平庸的东西，只承认他们内心的“准则”，与此同时，他们超凡脱俗，敏感而易激动，喜欢当着人谈论自己和与其同样的人——他们有时沉迷于书本中，犹如在自己的粪堆上打滚一般。犬儒主义是卑贱的人借以接近所谓诚实的惟一方式；高等人应侧耳倾听犬儒主义者讲的所有难听或好听的话，应为粗鲁之人在自己面前变得不知羞耻，或具有科学头脑的人羊神开口说话而暗自庆幸。有时甚至狂喜和厌恶会混合在一起——即：会看到天生的畸形儿，

天才的头脑竟附在某个不知检点的公山羊和猿人的身上，加利亚尼道长就是如此，这是个在他那个世纪思想最为深邃和敏锐的人，或许也是思想最为肮脏的人——他远比伏尔泰深邃，因而也更加缄默得多。如上面所暗示的，科学头脑竟安在猿人的躯体之上，卑贱的人竟具有绝好的理解力，这种情况决非罕见，尤其是在医生和品行端正的生理学家当中。每当有人不刻薄地，或更确切地说，非常无知地谈论人类，把人类说成是具有两种需要的肚子和一种需要的头脑时；每当有人认为或力图认为饥饿、性欲和虚荣是人类行为的惟一真实动机时；一句话，每当有人“诋毁”人类或说人类坏话时，爱知识的人都应侧耳细听；一般说来，只要这种谈论不带有怒气，他就应洗耳恭听。因为，愤愤不平者和总是用自己的牙齿撕咬自己（或不撕咬自己，而撕咬世界、上帝或社会）的人，固然从精神上说，要比性嗜嬉戏、自满自足的人羊神站得高看得远。但从其它各种意义上说，他却是更为普通、更为平凡、更无启发性的人。愤愤不平者，是最大的撒谎者。

27

要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像恒河那样急速地思想和生活，而别人却以其它方式思想和生活——即乌龟般地，或至多“青蛙般地”思想和生活（我在尽力使自己“叫人难以理解”！）——我要衷心感谢某些人的好意，竭力挖空心思地对我做出解释。不过，“好朋友们”总是那么悠闲自得，



并自以为作为朋友有权逍遥自在。对于他们，首先应提供操场和娱乐场，允许他们误解——自己因此而仍然在笑；或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不在乎这些好朋友们做何感想——于是还是笑！

28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最难表达出来的是语言风格的速度。语言风格的速度源自民族的特性，或侧重于生理方面来说，源自消化营养物的平均速度。有些翻译想要忠实于原文，但由于不自觉的通俗化，几乎歪曲了原文。原因仅仅是，原文活泼而愉快的速度（借助于这种速度而跳过和避开了词语上的所有危险）也是无法表达的。德国人几乎无法快速地说话，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出，德国人几乎无法理解自由自在、奔放不羁的思想中那些最令人愉快、最意气风发的微妙之处。正如丑角和人羊神在肉体和精神上与德国人格格不入一样，阿里斯托芬和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也无法翻译介绍给德国人。一切沉重、阻滞、笨手笨脚的东西，以及一切冗长而令人厌倦的文风，都在德国人中间花样翻新，大放异彩——恕我直言，就连歌德的那些生硬与优雅参半的散文也不例外，它们所反映的是其所属于的“过去美好时光”，表现的是当初的德国趣味。所谓德国趣味，就是有气无力而精巧细致的趣味。拉辛由于具有演员气质是个例外，这种气质使他悟性极高，精通许多事情；他卓有成效地翻译了培尔的作品，自愿躲避在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阴影之下，更加自愿地躲避在罗马喜剧作家当中——拉辛也热爱奔

放不羁的精神和奇思异想，这些都不合德国的节奏和规矩。但德语，即便是拉辛散文中的德语，怎能模仿马基雅弗利的速度呢？马基雅弗利在其《君主论》中，使我们呼吸到了佛罗伦萨干燥纯净的空气，并禁不住以喧闹愉快的方式展现了最为重大的事件，或许以艺术家特有的心怀恶意的对比感，以骏马奔驰的速度，以最为卓越、最为放纵的幽默感，表述了那些冗长、沉重、难以理解而又危险的思想。谁又胆敢用德文翻译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呢？在题材选择、思想和词语方面，佩特罗尼乌斯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大音乐家，都更是急板大师。若像他那样拥有风的双脚，能像风那样急速行进、呼吸和不受约束地表示轻蔑，使一切东西都跑动起来，从而使一切都健康向上，那么，对布满沼泽的病态世界，对“旧世界”还在乎什么！至于阿里斯托芬——那个善于使人变形的天才，为了他的缘故，我们应原谅曾存在的全部希腊精神，假如我们理解了其深刻含义所需要原谅和变形的所有那些事情的话。关于柏拉图的秘密和其令人猜不透的性格，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那件被保密得很好的小事，即：他临终时，枕头下放的不是《圣经》，不是埃及人的书、毕达歌拉斯的书，或他自己的书——而是阿里斯托芬的一本书。没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又怎能忍受生活——他所拒绝接受的希腊人的生活！

29

只有极少数人能保持独立；保持独立是强者的特权。任何



试图保持独立的人，即便是最有权利这样做的人，只要不是被迫这样去做，都证明他或许不仅是强者，而且还有无比大的胆量。他进入了一个迷宫，千百倍地增加了生活本身已具有的危险；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和在哪里迷路，将变得孤立无助，被某个良心怪物撕成碎片。假如这样的人倒了霉，他的不幸将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力，人们既不会感觉到这种不幸，亦不会同情这种不幸。他不再能回头！甚至不再能得到人们的同情！

30

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直觉，若蓦地讲给那些从气质上和本性上不直接接受它们的人听，肯定会——也理应会——被认为是傻念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认为是犯罪。按照哲学家从前所作的区分，宗教徒有显教教徒和密教教徒之别；这两者——在印度人当中，正如在希腊人、波斯人和穆斯林中一样，一句话，在相信等级差别而不相信平等和平等权利的人当中——在显教教徒看来，相互之间并不那么对立；显教级教徒是站在外面，从外面而不是从里面来观察、评价、衡量和判断；较为本质的区别是，显教级教徒是从下面往上看事物——而密教级教徒则是从上面往下看事物。在一些心灵层次上，悲剧本身不再显得是悲剧；若把世界上的痛苦聚集在一起，谁敢肯定见到这些痛苦必然会使人生出同情之心，从而使痛苦增加一倍呢？……高等阶级视为补品或提神物的东西，在完全不同的低等人看来，几乎必然是毒品。普通人的美德在哲学家的眼中，也许是邪恶

和软弱；一高度发达的人，若人们原以为他会堕落，走向毁灭，反而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优秀品质，则他为此会在自己所坠入的低等世界中，被尊为圣人。有些书对于心灵和健康具有相反的价值，这要看是低级心灵和低级生命力在利用它们，还是高级心灵和强健的人在利用它们。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书是危险的、引起恐慌的、令人不安的书；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书则是传令号角，召唤最勇敢的人们表达出自己的勇敢精神。供一般读者读的书总是有股难闻的气味，卑贱者的气味总是萦绕不散。在下层民众吃饭喝水的地方，甚至在他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常发出臭味。若要呼吸纯净空气，就不要走进教堂。

31

年轻时，我们只知道表示尊敬和轻蔑，不知道有表达细腻感情的艺术；掌握了这种艺术才是生活的最大收获。我们曾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和事，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悔过。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所有喜好中最糟的一种喜好，即对绝对事物的喜好，总是被愚弄和滥用，直到一个人学会在感情中掺入一点艺术，与虚假和不自然决一高低，像生活的真正艺术家所做的那样。年轻时特有的激愤之情和恭敬态度，使年轻的生命躁动不安，直到适当歪曲了人和事，得以把感情倾泄于它们之上；年轻时代本身甚至就是某种歪曲他人他物、令人上当受骗的东西。以后，幻想不断破灭，年轻的心灵备受折磨，最终开始怀疑自身——但即使在良心的这种怀疑和悔恨之中，也仍激情洋



溢，仍狂暴易怒，此时，它严厉地谴责自己，不耐烦地撕咬自己，为自己的长期自我蒙蔽而进行自我报复，似乎年轻的心灵当初是故意欺骗自己！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感情，以此惩罚自己；用怀疑折磨自己的热情，甚至觉得问心无愧是一种危险，似乎它是自我掩饰，是正直诚实的困倦；尤其是出于本能地开展起反对“年轻”的事业——十年之后才明白，所有这一切也仍然是——年轻！

32

在人类历史的一段最长时期——人们称之为史前时期——某一行为是否有价值，是根据其后果来推定的；那时并不考虑行为本身，亦不考虑其起因；但正如现在的中国孩子的荣辱会作用于父母那样，当时成功或失败的反作用力，促使人们认定某一行为好或坏。让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人类的道德前时期；当时尚不知道“了解你自己”这一命令。——另一方面，过去一万年里，在地球上的一些广大地区，人们已走得非常远，以至于不再让某一行为的后果，而是其起因，来决定其价值。整个说来，这真是一项伟大成就，是对眼光和标准的一项重大改进，是优越的贵族价值观和“起因”信仰，在不知不觉中带来的结果，亦是一个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在狭义上可称为道德时期：因而人们首次尝试了解自己，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好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观点的转变无疑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动摇才能实现！毫无疑问，一种不祥的新迷信，一种特别狭

隘的解释，由此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行为的起因被明明白白、确确实实地解释为意图；人们一致认为，某一行为的价值在于其意图的价值。意图是行为的惟一起因和史前史，于是便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给予人们道德上的称赞或责备，并以此对人们，甚至对迄今为止的哲学家作出判断。——不过，由于人们现今有了新的自我意识和敏锐感觉，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再次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再把价值颠倒过来？——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个时期的门槛上吗？首先，这个时期将逆转方向，以超道德而闻名：因为现今至少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已开始隐约觉得，某一行为的决定性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无意图，其全部意图，即所看到、感觉到或“意识到”的全部东西，只是其表面或肌肤——这种肌肤同每一种肌肤一样，暴露出了某种东西，但却掩盖了更多的东西。简言之，我们认为，意图只是一个符号或症状，它首先就需要解释——而且是个有太多解释的符号，因而其本身几乎没有意义：道德迄今被理解为意图——道德，这一意义上的道德是一种偏见、同时也许是过早或初步的看法，亦很可能是占星术和炼丹术之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是某种必须加以克服的东西。克服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自我克服道德——这是心灵的活的试金石，是对长期的秘密劳作的称谓，这种劳作要等待当今最细腻、最正直、同时也是最邪恶的良心去完成。



33

我忍不住要说：必须无情地要求人们对让予的感情、为邻人作牺牲的感情，以及所有舍己为人的道德，作出解释和判断；恰如要对“不偏不倚的沉思”美学作出解释和判断。在这种美学之下，当今对艺术的阉割正不遗余力地力图为自己创造一种问心无愧的心境。“为他人”和“不为自己”的感情太富于魅力，太甜蜜了，以致无须疑心过重，就会马上问道：“它们会不会是——欺骗？”——它们所取悦的——是有这些感情的人，是他享用了它们的果实，还有纯粹的旁观者——这根本算不上支持这些感情的论据，可却提醒人们当心。因而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34

无论从人们当今所具有的哪一种哲学观点来看，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所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错误性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最确定无疑的事情，我们可为此找到一个又一个证据，这些证据将诱使我们推测“事物本质”的骗人原理。不过，有人认为思维本身要对世界的虚假负责——好一个体面的退却，每一有意的或无意的魔鬼的辩护者，都可加以利用——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包括空间、时间、形式和运动，

是毫无根据地推论出来的，这样的人至少最终有充分理由，也对所有思维活动产生怀疑：它迄今不是一直在对我们玩弄最卑鄙的伎俩吗？怎么能保证它不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呢？说实在的，思维者的无知有几分感和令人肃然起敬，现今竟使他们服侍起意识来，要求它对一些问题作出诚实的回答。譬如，意识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意识使外部世界与人保持一定距离，以及诸如此类的另一些问题。相信“直接的确定性”是一种给我们这些哲学家增光的道德上的天真；但是——我们现在已不是“完完全全有道德的”人！这种信仰除了是道德外，还是一种愚蠢观念，并没有给我们增什么光！如果在中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中，动辄怀疑这怀疑那被认为是品质恶劣的标志，从而被认为是鲁莽轻率的，那么，在我们这些超越了中产阶级世界和其简单肯定和否定态度的人当中，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表现得鲁莽轻率，并大声说，哲学家作为迄今在地球上最被愚弄的人，终于有了“品质恶劣”的权利——他现在有义务表示怀疑，有义务从每一怀疑的深渊往外作最为邪恶的窥视——恕我开玩笑，作此阴郁的怪相和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因为我早已学会了骗人和被人骗，作不同想法和估价，对哲学家被人骗时的无名怒火，只是付之一笑。为什么不呢？真理比表面现象更有价值，这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偏见；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无法证明的假设。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除非以透视法的评价和表面现象为基础，否则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如果像许多哲学家那么品性正直，热情而愚蠢地想完全去除“表面世界”——且假定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你的“真理”会荡然无存！究竟是什么迫使我们认为“真”与“假”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认



为只有不同程度的似然性，宛似稍亮和稍暗的色度和色调——即画家所说的不同明暗变化，不就够了吗？纠缠着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不可能是——一种虚构呢？有人会说，“但是虚构是创作者的呀？”对此难道不可以干脆地回答说：“嗨，这个‘是’不也可能是虚构吗？”怎么就不能像对待谓语和宾语那样，对主语也来点讽刺呢？哲学家难道不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对语法的信仰之上吗？一切都与女统治者有关，哲学家现在不正是该抛弃对女统治者的信仰吗？

35

哦，伏尔泰！哦，人类！哦，白痴！真理和追求真理有点难办；如果弄得太人性了——“只是为了行善而追求真理”——我敢打赌，那将一无所获！

36

假设除了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世界外，其他东西都不是“给定的”，假设除了我们的冲动外，我们不能下沉或上升至任何其他“现实”——因为思维只不过是这些冲动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提出这样的问题：给定的“这种东西”凭借与我们相对应的东西，便足以理解所谓的机械（或“物质”）世界？我指的不是幻觉、“假象”或（贝克莱和叔

本华所说的)“表象”世界,而是真实程度与我们自己的情感相同的世界——一种较为原始形式的情感世界,在这种世界中,一切尚处于全能的一之中,这个一后来在有机过程中分叉并发展(自然也变得优雅精致和衰弱)——成为一种本能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全部有机功能,包括自我调节、吸收、滋养、分泌和物质变化,仍综合地相互结为一体——成为一种生命的最初形式?——最终,不仅可以做这种尝试,而且逻辑方法命令做这种尝试。不要假设几种因果律,只要所作的仅涉及一种因果律的尝试,不被推至极端(推至荒谬的地步,请允许我这样说);这是所采用的方法应具有的道德,现今尚不能加以批驳——用数学家的话来说,它“得自于定义”。问题最终是,我们实际上是否承认意志是起作用的,我们是否相信意志的因果律;如果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说,我们相信这一点只是相信因果律本身——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假设意志的因果律是惟一的因果律。“意志”自然只会对“意志”起作用——而不会对“物质”(譬如“神经”)起作用。简言之,我们必须试着猜测,在辨认出结果的地方,意志是否不作用于意志——在有力量起作用的地方,全部机械作用是否不仅仅是意志的力量、意志的结果。最后,假定能把我们的全部本能生活,解释为一种基本意志——即我所说的强力意志——的发展和衍生;假定一切有机功能都可追溯至这种强力意志,解决生殖和营养问题——这确是一个问题——的方法也可在这种意志中找到,那么便有权把全部作用力毫不含糊地界定为强力意志。从内部看的世界,根据其“悟知性格”界定和命名的世界——只能是“强力意志”,而别无他物。



37

“什么？说白了不就是——上帝，而不是魔鬼，被驳倒了？”
正相反！正相反，朋友们！到底谁迫使你说大白话！

38

正如现代人最终理解了法国大革命（那场可怕的闹剧，若从近处判断完全是多余的，但是整个欧洲高贵的、有眼力的观察者，却隔着一段距离，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如此狂热地把自己的愤怒和热情，掺进对它的解释，以致在这种解释下，文本已经消失了），高贵的子孙或许再次误解了整个过去，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忍受过去——或确切地说，这不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吗？我们自己不就是——那“高贵的子孙”吗？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点，可不因此也成了过去吗？

39

谁也不会仅仅因为一种理论使人幸福或道德高尚，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也许和蔼可亲的“唯心主义者”除外，他们对真、善、美，满怀热情，让所有五花八门的、粗俗的、无恶意的、值得想望的东西，飘浮在眼前。幸福与美德不是论据。但

甚至善于思考的人，都那么轻易地忘记了，使人不幸福和使人邪恶也同样不是反论据。一件事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其实，存在物的本质可能是这样的，即人们会由于充分了解它而被压垮——因而头脑的力量可用它所能忍受的“真理”的数量来衡量——或说得更明白些，可用它要求稀释、掩盖、美化、弄湿和歪曲真理的程度来衡量。但毫无疑问，对于发现某些真理来说，道德败坏者和不幸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更不要说那些幸福的道德败坏者了——道德家们缄口不谈此类人。对于培养坚强和独立精神的哲学家来说，严厉苛刻和狡猾诡诈，也许是比学者身上那种宝贵的温文尔雅和从容不迫，更为有利的条件。试假定“哲学家”这个词并不专指那些著书的，甚或立说的哲学家！斯丹达尔描绘了奔放不羁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考虑到德国人的趣味，我将突出一下这个特征——因为它与德国人的趣味正相反。这位近代的伟大心理学家说：“要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就得冷酷无情、眼光锐利和没有幻想。发了财的银行家，就具有作出哲学发现，即看清存在物所需的部分性格。”

40

所有深奥的东西都喜欢面具；最深奥的东西甚至憎恨外形和相似。难道上帝的羞愧所寻求的正当掩饰，就应该与此相反吗？真是个值得问的问题！——如果某个神秘主义者不也冒险这样做，那只会令人感到奇怪。有些做法精细得很，要用粗糙



的外表覆盖，使其不易辨认；仁爱和宽宏大量之后，最聪明的做法便是拿棍棒痛打一顿目击者，以此模糊其记忆。许多人都能模糊和滥用自己的记忆，以至少报复一下这个惟一的知情者：羞愧是有创造力的。这并不是人们最感羞愧的最坏事情。假面具背后不仅有欺诈——诡诈中亦有许多善良。我可以想像，一个人若有昂贵而易碎的东西要掩盖，终生便会像一箍得很紧的、装满新酒的旧酒桶那样，笨拙地轱辘轱辘滚动！微妙的羞愧之情使其不得不如此。深感羞愧之人会在朋友们一无所知的小径之上，遭遇命运和作出棘手的抉择。危及生命的危险，朋友们未予注意；重新获得的安全，也悄然不觉。这种隐秘的天性，本能地为缄默和遮掩辩护，尽力避免交流，因而希望并想要用面具占据其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即使不希望这样，有一天他也会意识到，还是戴着面具好。每一思想深邃的人都需要戴面具；而且不仅如此，由于虚假日增，也就是说，由于人们肤浅地解释每一思想深邃的人所说的每句话，走的每步路，表露的每一生命迹象，因而在其周围会渐渐生长出假面具。

41

我们必须自己考验自己，证明自己是独立和发号施令的，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作此考验。千万不要躲避对自己的考验，尽管这也许是所能玩的最危险的游戏，并且最终是面对我们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法官所作的考验。不要依恋任何人，即使是最心爱的人——每个人都是一座监狱，也是一个壁龛。不要



依恋祖国，即使它是最受苦受难、最为贫穷的国家——高奏凯歌的祖国就不那么难淡忘。不要依恋对任何人的同情，即使是对高等人的同情，我们已有缘洞悉他们遭受的特殊折磨和孤苦无助的心境。不要依恋任何科学，即使它以最有价值的发现引诱我们，表面上专为我们保留的发现。不要依恋于自我解放，不要依恋于鸟儿为满足感官快乐所追求的遥远距离，鸟儿总是往高飞。往高飞，就是为了看到身下更多的东西——飞得太高是有危险的。不要依恋自己的美德，也不要完全成为某一专长的牺牲品。譬如不要成为“殷勤好客”的牺牲品，对于高度发达的富人来说，这是最为危险的，他们对自己大大咧咧，几乎毫不在意，把慷慨大方这一美德推至极端，以致使其变成了罪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是对独立性的最好考验。

42

正在出现新的一类哲学家，我将不无危险地冒昧替其取名。就我对他们的理解而言，就他们允许别人对他们的理解而言——他们从内心希望自己依然是个谜——未来的这些哲学家也许正确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应把自己称作“诱惑者”。这个名字本身毕竟只是一种尝试，或毋宁说是一种诱惑。

43

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会是“真理”的新朋友吗？很可能是，



因为迄今所有哲学家都热爱自己的真理。但他们无疑将不会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的骄傲与趣味，肯定不是要自己的哲学仍然是每一个人的哲学——这是迄今所有教条主义哲学家内心的希冀和最终的目的。“我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其他人无权轻易享有。”——未来的某一哲学家会如是说。我们必须抛弃想与许多观点一致的态度。一旦被邻人占有，“利益”将不再是利益，怎么会有“公益”！这个词自相矛盾：可以共有的东西，价值总是很小。最终，事物必然恢复原貌——伟大之物将保持其伟大，深不可测之物将保持其深邃，精巧和令人兴奋之物将保持其精妙。总而言之，一切珍稀之物将保持其珍稀本色。

44

在说了上面这些之后，我或许无需说明，未来的这些哲学家将是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同时他们肯定将不仅是自由精神，而且还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更高等、更伟大、根本不同的东西，希望这点不要被误解、被搞错。但在我说此话的时候，我感到我对他们以及对我们自己（我们是自由精神，是他们的先驱和前导）负有义务，必须从我们自己身上彻底涤除一种愚蠢的旧偏见和误解。这种偏见和误解犹如一层迷雾，长久以来弄得“自由精神”这一概念模糊不清。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当前有人在滥用这一名称：他们是一帮非常狭隘的、充满偏见的、被锁链束缚着的人，希望得到的东西几乎与我们的意愿和本能想要的东西相反——更不用说相对于正在出现的新

型哲学家而言，他们肯定更加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简言之，可悲的是，这些起错了名的“自由精神”是平等主义者——是民主嗜好及其“现代思想”的奴隶，且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他们都不孤独，都没有个人内心的那种孤独感，他们是耿直而诚实的，不乏勇气，亦不乏光明磊落；可他们不自由，肤浅得很，尤其是他们几乎将人类的全部苦难和失败，归因于社会迄今存在于其中的古老形式——这种观念恰恰完全颠倒了真相！他们用尽全力想要获取的，是绿茵茵草地上羊群的普遍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保障、安全、舒适和慰藉；他们最常高唱和吟诵的两首歌曲和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所有受苦人”——痛苦本身被他们视为某种必须去除的东西。然而，我们这些与他们正相反的人，已凭借双眼和良心反省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迄今为止以何种方式和在什么地方，最为起劲地栽种植物，通过反省我们深信，人类一直是在相反的条件下栽种植物，因而为此应该极大地增加人类处境的危险性，应在长期的压迫和强迫下发展其创造力和掩盖力（即他的“精神”），使其变得细腻和勇猛；应增加生命意志，使其变成无条件的强力意志：——我们深信，严酷、猛烈、奴役、外界和内心的危险、隐密、禁欲、诱惑者的各种诡计和妖术，——对人类来说是邪恶、可怕、残暴、食肉和阴险的东西。人类的这些对立物，亦可用以提升人类：——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仍觉意犹未尽；无论如何，畅言也好，沉默也好，我们都处在全部现代思想意识和人们喜爱的群居生活的另一极端，或许是在与其作对？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并不是最爱交际的人，这有何奇怪？我们不想在每一方面都把精神所能摆脱的事物和精神由此而被逼至



的地方暴露出来，这又有何奇怪？至于“善恶的彼岸”这一充满危险的语句所具有的寓意（我们至少应避免把其搞混），我们决不是“自由思想家”，决不是这些“现代思想”的忠实鼓吹者津津乐道的任何东西。我们已熟悉或至少已涉足许多精神王国；一次又一次地逃离阴暗而惬意的避难所，偏爱与偏见、年轻时代、出生地、偶然遇到的人和读的书甚或旅行后的疲惫，都似曾把我们禁锢于这些避难所；满怀怨恨地抗拒依赖的诱惑，这种诱惑隐藏在荣誉、金钱、地位或感官兴奋之中；甚至对苦难和疾病的变化无常心存感激之情，因为它们总使我们摆脱某一习惯，从而摆脱其“偏见”，并感激我们心中的上帝、魔鬼、绵羊和虫豸；过于爱刨根问底，探究事物到残忍的程度，毫不犹豫地用手指摸索无形之物，用牙齿和胃对付最难消化之物。由于“自由意志”过剩，随时准备做任何需要运用聪明才智和敏锐感官的事情，随时准备作各种冒险；用先天和后天的灵魂探索难以窥视的意图和人迹不可至的目的；灯罩下的藏匿者和盗用者，尽管我们从早到晚类似于继承人和败家子、调停者和收税员、守财奴和吝啬鬼，经济地学习和忘却，工于心计；有时为范畴表而骄傲，有时是饱学之士，有时整天挑灯工作；如果需要，甚至是稻草人——现今也确实需要，因为我们是孤独的、天生的、起过誓的、招人忌羡的朋友，这种孤独是我们自己在午夜和正午深而又深的孤独——我们，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就是如此这般的人！也许你们也是某种同类物，你们这些未来之人？你们这些新型哲学家？

第三章 宗教情绪

45

人类灵魂及其限度，人类迄今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这些体验的高度、深度和距离，灵魂至今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穷尽的可能性，这对于天生的心理学家和喜欢打“大猎物”的人来说，是命定的狩猎范围。但他肯定会常常绝望地自言自语：“单个人！哎，仅仅是单个人！这片大森林，这片处女林！”他希望有几百名打猎助手，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猎犬，打发他们进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但这是妄想，他一次又一次深深地、痛苦地感到，要找到助手和猎犬来帮助做那些直接激起他好奇心的事情有多么困难。新的危险狩猎需要人们勇敢、聪明和敏锐，然而不幸的是，把学者遣人这些地方后，出现“大猎物”而面临巨大危险时，他们却一点用都没有——此时，他们的眼不尖，耳不灵了。譬如，为了推测和确定知识和良心问题，在宗教人士的灵魂中有何种历史，一个人在知识和良心上，也许要具有像帕斯卡尔那样深刻、脆弱和广博的体验；然后还要具有纯结而顽皮的灵性，广阔而高高在上，能从上面俯瞰、排列和有效地表述这许许多多危险而痛苦的体验——但



是有谁能帮上我这个忙！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能帮忙的人显然是太少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少有这样的人！最终，我们还得自己做每件事，以对事情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像我那样的好奇心，肯定是最令人愉快的恶习——恕我这么说！我的意思是，热爱真理会在天国得到报偿，而且已经在地上得到了报偿。

46

早期基督教所希望的和怀疑主义盛行、奔放不羁的南方世界（在南方世界，各哲学派别之间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这种斗争颇有价值，罗马帝国提供的耐力训练也很有价值）常见的那种信仰——并不是路德那样的人、克伦威尔那样的人或某个北方野蛮人也许仍借以依附于上帝和基督教自我克制的真诚信仰；而毋宁说是帕斯卡尔的信仰，这种信仰令人可怖地类似于理性的连续不断的自杀——这是种坚韧的、长命的、虫豸般的理性，是无法一下子立即杀死的。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牺牲：牺牲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上的自信；与此同时这种信仰是屈从、自我嘲笑和自我残害。这种信仰中有残忍和宗教上的腓尼基精神，被弄得适合于柔弱的、多方面的、很爱挑剔的良心；它理所当然地认为，使这种精神屈服具有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精神的全部过去和全部习惯，都抗拒荒诞主义，而“信仰”正是以荒诞主义的形式发生。现代人对基督教的一整套术语麻木不仁，不再能体味“十字架上的上帝”这

一矛盾说法在古人头脑中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联想。迄今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颠倒，也从未有过像这种说法那么可怕的、那么好探究的、那么成问题的东西：它重新评估全部古老的价值——正是这个东方人，这个思想深刻的东方人，正是这个东方奴隶，由此而报复了罗马和其高尚的、漫不经心的宽容，报复了罗马人的无信仰的“天主教”。常常不是这种信仰而是摆脱这种信仰，对这种信仰的严肃性采取半斯多噶派的、面带微笑的冷淡态度，使奴隶们对其主人感到愤怒并揭竿而起。“启蒙运动”导致造反：因为奴隶想要无条件的东西，他只得残暴，甚至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他爱的方式与恨的方式一样，没有深浅不同的爱，爱得深而又深，爱到使人疼痛和不舒服的地步——隐藏在内心的许多痛苦，使他厌恶那种表面上拒绝受苦的高尚情趣。对受苦所抱的怀疑态度，从根本上说，是贵族道德的态度，决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决不是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最初一次奴隶大起义的原因。

47

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只要出现宗教神经症，便会对饮食起居开出三个危险的药方：隐居、禁食和禁欲——但却无法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后一种怀疑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便是突然过度纵欲；然后又突然转变为一阵悔罪、弃世和断念。这两种症状也许都可解释为隐



蔽性的癡病？但此处最需要的是把解释撇在一边：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周围，都未出现过如此大量的荒谬和迷信言行，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都未如此令人们，甚至哲学家感兴趣——或许现在该超脱一点，该学会小心谨慎，或更应该把眼光移向别处，或抽身走开。——但在最近的哲学背景下，在叔本华的哲学背景下，我们几乎发现了问题本身，即发现了宗教危机和觉醒背后的可怕问号。怎么可能否定意志？怎么可能出现圣徒？——叔本华似乎就是从这一问题起步，并成为哲学家的。因而叔本华带来的实际后果便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就德国而言，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追随者），即理查德·瓦格纳竟将其毕生事业停止在这里，最后将那一可怕的永恒类型，作为真实的类型搬上了舞台。而此种类型的人在爱和生活的时候，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精神病医生，便有机会在近处，在宗教神经病——或我所谓的宗教情绪——最近一次蔓延和爆发，并表现为“救世军”的地方研究他们。——然而，如果在有关圣徒的整个现象中，要问是什么东西使各个时代的各种人极为感兴趣，则无疑是其中出现的奇迹——即一连串直接的对立物，一连串被认为在道德上对立的灵魂状态：人们在此处认为，不言而喻，“坏人”一下子转变成了“圣徒”，即好人。迄今的心理学都在此出了事；出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学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支配下，相信各种道德价值观处于对立状态，认为具体情况的文本和事实中便有这种对立。什么？“奇迹”只是解释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缺乏语文学知识？

48

拉丁民族对天主教的依恋，似乎比我们北方人对基督教的依恋要深得多。在天主教国家无宗教信仰的含义，似乎完全不同于对新教徒的含义——对拉丁民族而言，这是对民族精神的某种反叛，然而对我们而言，则毋宁说是复归于民族精神（或非精神）。我们北方人无疑源于野蛮民族，甚至我们的宗教天赋亦源自野蛮民族——我们的宗教天赋实在很差。凯尔特人或许是例外，他们为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播，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基督教的理想是尽可能地多吸收北方惨淡的阳光，而在法国生长开花。每当后来法国怀疑论者的血统中流淌凯尔特人的血液时，他们在我们的口中，便有多么大一股怪异的虔诚味道！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带有多么浓的天主教气味，多么的非日耳曼，本性上具有多么强烈的罗马人的逻辑！尽管圣伯夫对耶稣会会士抱有敌意，但是在他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史》中，那个和蔼可亲而狡猾的导游，却多么像耶稣会会士！甚至还有欧内斯特·勒南：宗教的每次震颤，都使他那贪恋酒色、安逸舒适的灵魂失去平衡，这样一个勒南的谎言，我们北方人又怎么能够理解！让我们抄录下他的几个精美语句——这些语句在我们也许不是那么美丽的铁石心肠中，即在我们那较为日耳曼式的灵魂中，立即会唤起多么邪恶和高傲的情感！——“因而可以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产物，人在最虔诚，对无限的命运最有把握时，处于最真实的状态。……正



是在人最善良的时候，人希望美德与永恒的秩序相一致，正是在人不偏不倚地思考事物时，更觉得死亡令人厌恶而荒谬。怎能不认为正是在此时，人看得最清楚？”……这些语句太逆我的耳了，太不合我的思维习惯了，当时一看到它们，我便怒不可遏，在旁边批注道：“真是宗教混帐话！”——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反而喜欢上它们，这些应完全颠倒过来看的语句！有自己的对立面，真好，真荣耀！

49

古代希腊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是它喷涌出不可遏制的感恩之流——只有非常优等的人，才会对自然和生命抱有如此的感恩之情。——后来，当下层民众在希腊占了上风时，恐惧也在宗教中蔓延开来；于是便为基督教的出现作好了思想准备。

50

对上帝的热爱：有种种粗鄙的、实心眼的、纠缠不休的爱，如路德的那种爱，——整个新教都缺少南方的精致与优雅。这种爱有时表现出东方人式的兴高采烈，犹如奴隶受到过分宠爱和提拔。圣奥古斯丁就是如此，他咄咄逼人，举止和愿望全无高贵气质。这种爱有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和欲求，渴望一种神

秘的自然的统一，居伊昂夫人就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爱似乎是少女或小伙子青春期的伪装；甚至似乎是老妇人的歇斯底里，亦似乎是老妇人最后的期待。教会常封这样的妇人为圣徒。

51

有权势的统治者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圣徒打躬作揖（圣徒是自我屈从和完全自愿地自我奉献的谜）——他们为什么打躬作揖？他们在圣徒身上——似乎在圣徒那虚弱而可怜的外表背后——感悟到了这种屈从检验自身的超等力量，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对力量的热爱，而且知道如何敬重这种力量：他们敬重圣徒，就是敬重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此外，圣徒沉思冥想的样子，使他们觉得，圣徒不会无缘无故地以如此大的毅力，进行自我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本性——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样探问道。也许其中有某种很大的危险因素，禁欲者或许希望通过秘密的谈话者和来访者对其有更准确的了解？总之，世界上的统治者在圣徒面前渐渐有了一种新的恐惧，体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个尚未被征服的敌人——正是“强力意志”迫使他们停在圣徒面前。他们不得不盘问他。



52

在犹太人的神圣的正义之书《旧约全书》中，人物、事例和言论多得数不胜数，希腊和印度的文献难以望其项背。人们站在那些令人惊叹的古人遗迹面前，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敬畏，悲哀地怀念古老的亚洲及其凸出来的小小半岛欧洲。欧洲无论在亚洲面前，都要扮演“人类进步”的角色。当然，本身只是柔弱而温顺的家养动物，只知道家养动物之需要的人（如现今有教养的人，其中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站在这些遗迹当中不一定感到惊异，甚至也不感到悲哀——是否喜欢《旧约全书》是“伟大”与“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会发现，《新约全书》这本恩典之书更合他的口味（这本书散发出道道地地的、多愁善感的、无知的祈福者和怜悯的浓浓气味）。把这本《新约圣经》（各方面都具有洛可可式的风格）与《旧约圣经》装订成一本书，装订成“圣经”，也许是欧洲文坛昧着良心所做的最厚颜无耻的一件事，即“对圣灵犯的罪”。

53

当今为何无神论甚嚣尘上？“圣父”被彻底驳倒了；“最高审判者”和“最高恩宠者”也被驳倒了；他的“自由意志”亦复如此。他未听到——即便是听到了，也束手无策。最糟糕的

是，他似乎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是拿不准？——这就是我（通过在各种交谈中的提问和倾听）了解到的欧洲有神论衰落的原因；我觉得，虽然宗教本能在茁壮生长，可它却带有深深的怀疑情绪，无法使有神论者得到满足。

54

整个现代哲学有何贡献？自从笛卡尔以来——实际上更多地是违抗他，而不是依据他的程序——所有的哲学家一直在批判主谓概念的幌子下，试图谋杀灵魂这一古老的概念——也就是说，试图谋杀基督教的基本前提。现代哲学在认识论上采取怀疑态度，暗地里或公开地反对基督教，虽然（对于耳朵灵敏的人来说）并不反对宗教。以前，人们就像相信语法和语法上的主语一样，相信“灵魂”的存在。人们常说“我”是条件，“思”是谓语，受条件制约。思是一种活动，必须假设有一主语是这一活动的原因。于是，人们作出种种努力，看看是否能把事情颠倒过来：“思”是条件，“我”被条件所制约；所以，“我”只不过是由“思”本身所作的一种综合。康德实际上想要证明，从主体出发不能证明主体，亦不能证明客体，主体从而“灵魂”表面上存在的可能性，一向与他是格格不入的，——此种思想便是佛陀哲学，曾经风靡一时。



55

宗教的残酷像个大梯子，有许多梯级；但最主要的是三个梯级。从前，人们把自己的财产献祭给神，或是把自己最热爱的人献祭给神——属于此类的有：所有原始宗教的首批祭品，以及卡普里岛屿上米特拉神岩洞中，提比略皇帝奉献的祭品，这可以说是古罗马所犯下的所有时代错误中最最可怕的一种。继之，在人类的道德时代，人们把自己的“天性”献祭给神；这种节日般的快乐显露在禁欲者和“违反天性的”狂热宗教信仰徒的无情扫视之中。最后，还有什么可以献祭的呢？人们是不是必须把一切令人感到欣慰、治愈心灵创伤和神圣而崇高的东西，一切希望，一切对隐秘的和协、对未来的幸福和正义的信念，都献祭给神呢？是不是必须把神本身也当作祭品，严苛地对待自己而崇拜石头、愚蠢、重力、命运、虚无？为虚无而献祭神——这一自相矛盾而神秘的、最终的残忍行为，将留待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完成；但我们大家都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56

无论是谁，若像我这样，被某种神秘的欲望所驱使，长期以来力图把悲观主义搞个水落石出，以摆脱半基督教、半德意



志的狭隘和愚蠢（悲观主义在本世纪正是以这种狭隘和愚蠢，即以叔本华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无论是谁，若以亚洲人或超越亚洲人的眼光，真正观察人的内心世界，观察所以可能的思维方式中最为厌世的思维方式——超越善与恶，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的理论，被道德所控制和蒙蔽——无论谁摆脱道德的束缚，或许会不知不觉地睁开眼睛，看见相反的理想：那些最热爱现世、生气勃勃、活泼快活的人们的理想，他们不仅已学会了与过去和现在妥协，而且还希望生活永远保持过去和现在那种样子；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整个人生大声喝彩：不仅仅是为人生而且实际上是为需要人生——使人生成为必要——的人们喝彩；因为这些人总是要更新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的。——唉，这难道不是——恶性循环？

57

人四周的距离或空间，会随着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加强而增大。人的世界会变得更为深广，不断出现新的星辰、新的奥秘和新的观念。也许智力之眼以其敏锐和深邃的目光观察一切时，只不过是眨一眨眼，是在作游戏，是在闹着玩。或许曾引起最多厮杀的苦难的最庄严的概念，如“上帝”和“罪恶”，有一天对我们来说将不再重要，而只不过是老人眼中小孩子的玩具或小孩子的痛苦；于是“老人”或许又需要有另一种玩具和另一种痛苦——总是孩子气十足，永远是孩子！



58

人们是否已观察到，表面的懒散或半懒散，对于真正的宗教生活（也对于其喜欢的、不辞辛劳而明察秋毫的反省；对于“祈祷”时的温和与平静；对于为“上帝降临”时刻做好准备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那种问心无愧的懒散，那种只有昔日具有高贵血统之人才享有的懒散，此种懒散与眼下辛苦工作正在败坏——使身心庸俗不堪——的贵族气质何其相似。因而，不正是这种腐败的气质在教育人们“无信仰”，并为“无信仰”铺路吗？譬如，在目前远离宗教而生活的德国人当中，我发现了各种不同的出身各异的“自由思想家”，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代一代辛勤劳作，已消解了宗教本能；因而他们已不知道宗教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呆笨而吃惊地注意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宗教。这些好人感到自己太忙了，无暇旁顾，既要工作又要享乐，还要为“祖国”出力，要看报，还要尽“家庭义务”。他们似乎没有一点时间来顾及宗教；特别是，他们不清楚宗教究竟是一种新工作呢，还是一种新享乐。他们自言自语道，反正人们去教堂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破坏情绪吧。他们决不是宗教习惯的反对者；假如环境或国家利益要求他们服从这种习惯，他们会按要求去做的，正如他们已经按要求做了许许多多事情——而且保证会耐着性子，认认真真地去做，不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他们繁忙得很，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前便可以把属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

新教徒划归这种人之列，特别是在人们辛勤劳作的大贸易和商业中心；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学者和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也可算作这种人（神学家不在此列，心理学家总是感到纳闷，怎么会有神学家他们，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就那些虔诚的或仅仅去教堂作祈祷的人们而言，我们几乎不知道一个德国学者目前需要有多少自觉自愿的成分，或随心所欲的意志，才能认真对待宗教问题。他的专业工作（以及我已经说过的他那像工人一样、由现代良心驳迫的辛勤劳作），往往使他对宗教采取一种高傲的、几乎是仁慈的平静态度，偶尔对一些人的“邪”念表示些许的蔑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谁仍宣称属于基督教会，谁就有邪念。只是在历史的帮助下（因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者才得以对宗教表现出可敬的认真态度和某种畏畏缩缩的敬意；但即使他达到对宗教充满感激之情的地步，他也仍未亲自再更进一步，树立起对教会的信念，从而虔诚地对待宗教；甚或与此相反。他是在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环境下出生和长大的，就他来说，这种对宗教的淡漠，通常会升华为小心谨慎和纯结正直，避免接触宗教界人士和宗教问题；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宽容和仁爱，促使他躲避宽容带来的麻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神圣的幼稚行为，其他时代会因为有人发现了这种幼稚行为而深表忌妒：学者深信自己高人一筹，深信自己的宽容问心无愧，深信应确定无疑地把笃信宗教的人视为价值较小的低等人，而他自己则是超出和高于他们的——但他只不过是那个傲慢的小侏儒和骗子，过于警觉、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思想”，各种“现代思想”！所有这一切又包含了多少幼稚行为——多少可爱的、小孩子般的、愚蠢的幼稚行为。



59

无论谁深深地了解了世界，都会发现人的浅薄无知是明智的。正是人的乖僻本性使得人轻浮、轻飘和虚伪。在各处都会发现，哲学家和艺术家狂热而极端地崇拜“纯形式”，毫无疑问，谁都非得膜拜表面上的东西不可，而有时就会不幸掉进它的束缚。那些被烧伤的孩子，那些天生的艺术家，甚至也有等级，他们发现，生活的惟一乐趣就是尽力歪曲生活的形象（似乎是要疲惫地报复生活）。人们会推测，生活究竟怎么会使他们那么反感，致使他们那么想歪曲、缩小和神化生活的形象。人们会把艺术家当中笃信宗教的人，视为最高等级的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作出了宗教上的解释：人们从本性上害怕会太快地获得真理，在人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坚强、具有足够多的艺术家气质以前。……虔诚，“神之生命”，以这种观点看，似乎是害怕真理的最终结果，似乎是艺术家在所有最为符合逻辑的真理面前的赞颂和陶醉，似乎是颠倒真理、不惜以任何代价说谎的意志。或许，迄今为止，美化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说他虔诚；说某人虔诚，某人就会变得非常狡猾，非常浅薄，非常光彩照人，非常善良，其样子也就不再惹人讨厌。

60

为上帝而爱人类——这是迄今人类获得的最为崇高和最为超然的感情。不要任何补偿地爱人类只不过是另一种愚蠢和残忍行为，热爱人类的这种倾向，首先必须从一种更高的倾向得到其均衡的比例。谁先觉察和“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他力图表达事情时多么结结巴巴，他都将永远是神圣的和令人尊敬的，是迄今飞得最高、迷路迷得最讨人喜欢的人！

61

我们这些自由人所理解的哲学家——哲学家是负有最重大责任的人，对人类的发展负有良心上的责任——会利用宗教来训练人和教育人，正如他们利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做这项工作那样。利用宗教所产生的控制性影响，其所迷惑和保护的人不同，既可以是具有创造性和塑造性的，也要以是有破坏性的。有些人性格坚强而具有自立精神，天生注定和后天培养成是发号施令的人，具有统治民族的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宗教是另一种工具，可用来克服行使权力的障碍——是连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纽带，可把被统治者的良心拱手交给统治者，而人们从内心深处总是尽力逃避服从。贵族出身的人很特别，精神境界高人一等，倾向于过闭门索居、沉思默想的生活，喜



欢以较优雅的方式（通过某一阶层中精选的追随者或成员）进行统治，他们可利用宗教获得安宁，远离管理粗俗事物的嘈杂和麻烦，避开一切政治鼓动中不可避免的肮脏和龌龊。譬如，婆罗门就明白这一点。借助于宗教组织，他们拥用为人民指定国王的权力，同时在思想感情上又超然物外，具有高于国王的使命。与此同时，宗教给予某些被统治者引诱和机会，使他们在未来的资格进行统治和发号施令：这些人属于缓慢上升的阶级和阶层，仰赖幸运的婚姻习俗，其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不断增加，宗教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诱惑，使他们努力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体验必须进行自我控制的情感，体验沉默不语和寂寞的滋味。某一种族若想超越其卑下的遗传特征，未来达到高人一等的优越地位，则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便是教育该种族和使该种族高尚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最后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他们生来是为了干活和劳作的，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宗教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境况感到心满意足，内心感到平静，觉得服从是光荣，具有较多的社会幸福感和同情心，脸上容光焕发，使灵魂上的一切平庸、一切卑下和一切贫乏得到了原谅。宗教连同生活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给这些永远遭受折磨的人带来了阳光，甚至使他们能够忍受自己的悲惨样子；宗教对他们起的作用，恰似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等级的受苦受难者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别开生面，高雅别致，几乎利用了受苦受难，最终甚至把受苦受难神圣化，证明受苦受难是正当的。基督教和佛教中最令人的敬佩的，莫过于它们有办法教导最底下的人，通过尊奉表面上等级较高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从而使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觉得在现实世界中

生活很困难——据说这种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62

毫无疑问——对这些宗教作蹩脚的反计算，暴露其隐秘的危险——若宗教不是在哲学家手中作为教育人、训练人的工具，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裁决工具；若宗教一心要成为万物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充当一种工具，则其付出的代价总是过于高昂。在人们当中，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当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患病的、堕落的、体弱的、必然受苦的人；在人们当中，成功者也总是例外；而且由于人是尚未完全适应环境的动物，成功者是罕见的例外。更为糟糕的是，人所处的等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小；人类一般政体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法则，对高等级的人产生的破坏作用最为可怕，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是脆弱的、多样的、难以确定的。那么，上述这两种最伟大的宗教对生活过多的失败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们力图保存一切能够保存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宗教，它们原则上站在受苦受难者的一边；它们总是喜欢那些忍受生活痛苦的人，宁愿把每一种其他的生活体验视为虚假的和不可能的。不论我们给予这种溺爱式的和保护性的关心（在关心其他人的同时，更多地是关心受苦受难最多的那种类型的人）多么高的评价，迄今至高无上的这两种宗教——这是对它们的一般性评价——都是导致“人类”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它们保存了太多的本该消亡的东西。我们要感谢它们作出的无法估



价的贡献；哪位充满感激之情的人想一想基督教迄今为欧洲所做的一切不感到难受！但是，在它们安慰了受苦受难者，鼓励了受压迫者和绝望者，给予了孤苦无助者以依靠和支持，把社会中的失意者和苦闷者吸引到修道院和悔罪所以后，它们还要做别的什么来有计划、有步骤地、问心无愧地保存一切患者和受苦受难者，以确确实实地促进欧洲种族的堕落呢？颠倒全部价值判断——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摧毁强壮者，使一切伟大的梦想破灭，怀疑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捣毁一切自由自立、男子汉气魄、征服气概、专横傲慢——所有这些最高等级和最为成功的人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天性——把这一切都变为犹豫不决、自责自疚和自暴自弃；无疑地，把对现世的全部热爱，把统治尘世的欲望颠倒过来，变成对尘世和世俗事物的憎恨——这就是基督教会强加在自己身上并且不得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任务，直到根据它的标准：“对钱财嗤之以鼻”、“对酒色不感兴趣”，“高级人”融合为一种感情为止。如果人们能以伊壁鸠鲁主义者嘲弄的和不偏不倚的眼光，看一看欧洲基督教导演的这出叫人感到不自在和痛苦、既粗糙又雅致的喜剧，那我认为人们会惊异不已和笑个不停；似乎某种意志支配了欧洲 1800 年，要使人类庄严地流产，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过，某人若像欧洲的基督教徒那样（例如帕斯卡尔），需要的东西与此相反，手里拎着一把神圣的斧子，能考察人类的这种几乎自愿性的堕落，他便会愤怒地、同情地、浑身战栗地高喊：“喔，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专横而可恶的笨蛋，你们干了些什么呀！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怎么能这么胡砍乱弄我最好的这块石头！真是放肆无礼！”——我要说，基督教是迄今为止最为放肆

无礼的。人们尚未伟大得和坚强得能作为艺术家参与塑造人类的活动；人们尚未强大，也尚未有足够多的远见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力，听凭千百万人必然失败和灭亡的规律肆虐；人们尚未崇高得能够看清把人与人区别开来、迥然不同的等级和差距：——这样的人们高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迄今一直支配着欧洲的命运；以致最终产生了一个发育不良的、样子可笑的物种，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谦和有礼，病恹恹，平平庸庸，即当今的欧洲人。





第四章 箴言和插曲

63

地地道道的教师认真对待各种事情——甚至认真对待自己——不过只是认真对待与学生有关的那些事情。

64

“为知识而知识”——这是道德设下的最后一个陷阱：我们因此再一次与道德纠缠在一起。

65

若不是在通向知识的道路上，有如此多的羞愧要加以克服，知识的魅力便会很小。



65A

犯罪！说这句话，乃是我们对上帝最不老实的态度。

66

一个人听凭自己堕落，听凭自己被掠夺、被欺骗、被利用或许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67

只爱一个人，是一种野蛮行为，因为这会牺牲所有其他人。只爱上帝亦是如此！

68

“这是我干的。”我的记忆说。“我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我的矜持说，并坚持不退让。最终——还是记忆退让了。



69

如果人们未能看到那只手——那双温和地杀人之手，那就是对生命漠不关心。

70

如果一个人有好品德，那他也就有典型的人生经历。情况总是这样的。

71

作为天文学家的圣人。——只要你感到星辰是“在你之上”的东西，你就还缺乏明眼人的眼睛。

72

造就伟人的。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时间。



73

达到自己理想的人，也就因此而超越了理想。

73A

许多孔雀藏起尾巴，不让人们看——这就是孔雀的矜持。

74

有天才的人，若除了天才外不具有以下两者，即感恩和纯洁，那就令人无法忍受。

75

一个人好色的程度和本性，往往延伸至其精神的极点。

76

在和平条件下，好斗者会自己攻打自己。



77

一个人在本性的驱使下，会力图控制自己的习惯，或竭力为自己的习惯辩护，或尊重、责备、掩盖自己的习惯。具有相同本性的两个人，很可能会追求根本不同的目标。

78

鄙薄自己的人，却因此而作为鄙薄者尊重自己。

79

一个人知道别人爱自己，可自己却不爱别人，便暴露出了沉淀物：于是沉渣泛起。

80

一件事情得到了解释，也就与我们无关了。——上帝劝告我们：“了解你自己！”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意思也许是：“别再关心你自己了！要客观而不带偏见！”——变成苏格拉底？——变成“科学家”？



81

在大海上渴死非常可怕的。过于吹嘘真理的价值，真理就不再——止渴了，有必要这样做吗？

82

“同情所有人”——便会对我的好邻居苛刻而暴虐！

83

本能。——房子着火，连午饭都会忘记吃。——是的，可是却会在灰烬上补吃。

84

女人忘记如何妩媚动人的速度越快，学会憎恨他人的速度也就越快。



85

男人与女人的感情是相同的，但进入和摆脱感情的速度不一样；因此，男人和女人总是相互误解。

86

女人有针对某个人的虚荣心，可是，却有并非针对某个人的蔑视——蔑视“女人”。

87

受束缚的心灵，自由精神——当一个人紧紧束缚自己的心灵，囚禁自己的心灵时，会听凭自己的思想享有许多自由：我以前曾说过这一点。但我这样说人们不会相信，除非人们有亲身的体验。

88

很聪明的人不知所措时，人们便开始不相信他们。



89

可怕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是也是可怕的。

90

心情沉重、郁郁寡欢的人，恰恰会由于使他人心情沉重的东西——恨和爱，而变得心情轻松些，脸上暂时有些表情。

91

这么冷淡，这么冷冰冰的，可一碰到他却会吃苦头！抓住他的每一只手，会嗖地缩回来！——正是由于这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他是炽热的。

92

谁没有为了博得好名声委屈过自己？



93

和葛谦恭时，男人一点也不招人恨，可是正因为如此，男人太叫人瞧不起了。

94

男人的成熟——意味着重新获得儿时玩耍时的那种一本正经劲儿。

95

对自己的不道德感到羞愧，便迈上了一级梯子，登上梯子的顶端，会对自己的道德也感到羞愧。

96

告别人生应当像俄底修斯告别瑙西卡那样——更多的是祝福，而不是迷恋。



97

什么？伟人？我看到的只是尽力实现自己理想的演员。

98

训练自己的良心时，它既吻我们，也咬我们。

99

失望者说。——“我倾听反响，可听到的只是赞扬。”

100

大家都装出一副纯朴老实的样子；于是人人放松了对朋友的警惕。

101

当前眼光敏锐的人，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赋予上帝以动物



性。

102

发现人们会相互喜爱，实际上会使情人不再迷恋自己所钟爱的人。“什么！她那么贤淑，会爱上你？有那么蠢？那么……那么……”

103

福中有祸。——“现在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最美好的。我现在在热爱每一种命运——谁愿意像我的命一样？”

104

不是他们的博爱，而是他们的欲爱不能，阻止了当今的基督教徒——把我们烧死。

105

与恶意的谎言相比，善意的谎言更不合自由精神（“虔诚的知识分子”）的口味（“虔诚的信仰”）。因此与教会相比，便严



善恶的彼岸

重缺乏判断力，这是“自由精神”的特征——是其不自由的表现。

106

感情可以通过音乐尽情发泄。

107

性格坚强的一个迹象是，一旦下了决心，即使对最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也充耳不闻。因而有时也就是一意孤行地要做蠢事。

108

根本没有道德现象这种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

109

罪犯常常与其罪行不符：他总是为罪行开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百般辩解。



110

罪犯的辩护律师很少具有足够的艺术家气质，能把罪犯的可怕罪行说得美丽动人，为其减轻罪责。

111

我们的虚荣心很难受到伤害，而我们的自尊心却易于受到伤害。

112

对于感到自己命该沉思默想而不是遵奉信仰的人而言，宗教信徒太吵闹、太爱管闲事了，必须提防他们。

113

“你想要他对你有好感吗？那你必须在他面前显得局促不安。”



114

对性爱的巨大期望，以及在这种期望之中表现出的羞怯，会在一开始就歪曲对女人的全部看法。

115

既不懂得爱，也不懂得恨，这样的女人是平庸的。

116

我们生活的伟大时代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获得勇气，把我们内在的恶重新命名为我们内心的至善。

117

克服一种感情的意志，最终只是另一种感情或另外若干种感情的意志。



118

有人不知道赞美为何物：一个人若尚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人赞美，他就不知道赞美为何物。

119

我们太厌恶肮脏了。竟忘记了把我们自己弄干净——忘记为我们自己辩护。

120

肉欲常常迫使爱情生长过快，致使根扎得不牢，很容易拔起。

121

奇怪的很，上帝想成为作家时学习了希腊语——可惜没有学得更好一些。



122

受到赞扬而表示高兴，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表示礼貌——与精神空虚正相反。

123

甚至非法同居也被姻婚败坏了。

124

在火刑柴堆上仍欢欣雀跃的人，不是由于战胜了痛苦，而是没有感到他所预期的那种痛苦。一个比喻。

125

当我们不得不改变有关某个人的看法时，我们把由此而带来的麻烦，重重地记在他的账上。



126

一个民族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六、七个伟人。——是的，然后围在他们周围。

127

在一切真正的女人看来，科学对羞耻感怀有敌意。他们感到人们似乎想借助于科学，窥视其皮肤下面的东西——更有甚者！想窥视漂亮衣服下面的东西。

128

你想让人了解的真理越抽象，你就必须把越多的感官吸引到真理那里。

129

魔鬼对上帝了解得更透彻；因而他对上帝敬而远之——魔鬼实际上是知识最老的朋友。



130

某人江郎才尽，无法再显示自己能做什么时，便开始暴露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也是一种装饰；装饰也是一种掩盖。

131

两性总是相互欺骗：原因是他们实际上只尊重和喜爱自己（或者说得好听些，只尊重和喜爱自己想像中的事物）。男人希望女人温和，但实际上女人像猫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不温和的，不管她外表装得多么温和。

132

人常常因美德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133

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过得更没有意义，更加寡廉鲜耻。



134

由感觉产生一切信任，一切坦然的心境，一切真理的证据。

135

伪善并不是好人的堕落，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好人的一个必要条件。

136

一个人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助产士，另一个人寻找要帮忙的人。由此便会产生有益的交谈。

137

与学者和艺术家交往，人们很容易错误估计到相反的方向上去：常发觉一个杰出的学者是个平庸的人，而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却是个非常杰出的人。



138

我们醒着的时候和做梦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虚构和想象出与之交往的人——然后立即忘掉他。

139

在报复和恋爱方面，女人比男人野蛮。

140

作为谜语的劝告。——“如果绳子不断，那就先用牙咬——保准没错！”

141

要填饱肚子，是人不能那么容易地把自己看作上帝的原因。



142

我听到过的最纯洁的话乃是：“在真正的爱情中，灵魂裹住肉体。”

143

我们的虚荣心，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成为我们最难以成为的那种人。——这关乎许多道德体系的起源。

144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做学问，那她一般说来，在性的方面就有点毛病。不孕本身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趣味的男性化；恕我直言，男人实际上就是“不孕动物”。

145

将男人和女人泛泛地作一番比较，便可以说，女人如果没有做配角的本能，就不会有装饰打扮的天才。



146

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防自己因此而变成怪兽。如果你长时间地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

147

引自佛罗伦萨旧小说的一句话——而且也是得自生活的一句箴言：*Buona femmina e mala femmina vuol bas - tone*。——萨彻惕，第 86 位小说家。

148

诱使邻居对自己有好看法，随后便暗中相信邻居的这种看法——有谁能比女人这么巧妙地玩魔术呢？

149

某一时代认为是恶的事情，通常是对人们以前认为好的事情所做的不合时宜的仿效——即旧理想的返祖现象。



150

在英雄的周围，一切变成了悲剧；在半神半人的周围，一切变成了羊人剧；在上帝的周围，一切变成了——什么？或许是一个“世界”？

151

拥有一种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你们的批准，方可拥有这种才能；——朋友们，是吧？

152

“哪里有知识之树，哪里就有天堂”——最古老的和最现代的毒蛇如是说。

153

出于爱所做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善恶的彼岸。



154

不喜欢，躲避，欢快地表示不相信，爱讽刺挖苦，是健康的标志；一切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都属于病理学。

155

悲剧感随着感官敏感程度而增减。

156

疯狂就个人而言是少见的，但就集团、政党、国家和时代而言，却屡见不鲜。

157

自杀的念头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人们借此安然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158

不仅是我们的理性，而且我们的良知也屈从于我们最强烈的冲动——我们内心的这个暴君。

159

我们必须报善惩恶；但究竟为何要报答行善的人和惩罚作恶的人呢？

160

人把知识传授给他人后，就不再那么热爱知识了。

161

诗人对自己的经历表现得很无耻——对其加以肆无忌惮的利用。



162

“我们的同类不是我们的邻国人，而是我们邻国的邻国人。”——每一个国家都这么认为。

163

爱情将谈情说爱者的隐蔽的高尚品质——难得的好品质暴露出来，因而很容易使人对他的一般品质产生误解。

164

耶稣对犹太人说：“法律是为仆役制定的；——请像我作为上帝之子那样爱上帝！但是我们这些上帝之子，又该如何对待道德！”

165

从每个政党的观点看。牧羊人总是需要有一只系铃领头羊，否则，他有时自己就得充当领头羊。



166

人确实可以张嘴说瞎话，但是，脸上所带的不自然表情，却会露出真相。

167

对充满活力的人来说，卿卿我我是叫人感到羞耻的事——是某种贵重的东西。

168

基督教赐予爱神厄洛斯毒酒，但厄洛斯喝下毒酒后，并没有死，而是堕落成了罪恶。

169

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能是掩盖自己的一种手段。



170

赞扬比责备有更多的强加于人的成分。

171

怜悯对知识分子会产生一种几乎荒唐可笑的作用，就像温柔的手对独眼巨人产生的作用那样。

172

一个人偶尔会出于对人类的爱而拥抱某个人（因为一个人不能拥抱所有人）；但这一点决不应告诉被拥抱的人。

173

对于被轻视的对象，人们不会表示憎恨，只是对于与自己地位相等，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才会表示憎恨。



174

尔等功利主义者——尔等也是只有在车辆合你们的意时，才喜欢这种有用的东西，——尔等实际上也觉得车辆的噪声叫人无法忍受！

175

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的欲望，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176

其他人的虚荣心只有在和我们的虚荣心相反时，才令我们反感。

177

关于什么是“诚实”，或许至今谁都不够诚实。



178

人们不相信聪明人会做蠢事：人的权利竟丧失到了如此地步！

179

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一股脑儿扣在我们的头上，而对我们在这一期间的“改过自新”漠不关心。

180

说谎是无辜的，因为说谎是对一项事业充满信心的标志。

181

一个人遭难时而祈神赐福于他，是没有人性的。



182

与上司关系亲密会使人有苦难言，因为可能得不到回报。

183

“我感到难受，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而是因为我不能再相信你了。”

184

亲切有时透着傲慢，令人感到不快。

185

“我不喜欢他。”——为什么？——“我比不过他。”——有谁这样回答过吗？





第五章 道德的自然史

186

欧洲目前的道德情操或许是微妙的、敏感的和细腻的，正如截至目前的“道德科学”是最新的、初步的和粗糙的那样——此种对照很有意思，有时明显地表现在道德家的身上。的确，“道德科学”这个词就它所表达的意思来说，太傲慢了，有失风雅，风雅总是预示着使用不那么嚣张的词语。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说明，要为建立各种类型的道德理论作好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需要做什么，就当前来说，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其中包括：收集资料，全面考察数量众多的、有价值的和特别有价值的细腻感情，并为其分类。这些感情是活的，不断生长，繁殖和消亡——或许应试着较为明晰地说明，这些活生生的感情反复出现的较为常见的形式。毫无疑问，人们迄今并没有这种谦虚。所有哲学家在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时，都摆出一副充满学究气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求自己取得某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庄重的成果：他们要给予道德以基础——每个哲学家迄今都坚信自己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道德本身一直被认为是某种“给定的”东西。描述各种形式的道



德与他们那令人尴尬的傲慢与自在相距何止上千上万里！这项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极其纤细的手和极其敏锐的感觉，却不一定能胜任！正因为道德哲学家对道德事实了解得不全面，只是随意了解一个梗概，或偶尔在哪里看到一个节略本——或许只是了解与他们的环境、地位、教会、时代精神、气候和地区有关的道德——正因为他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而且也不那么渴望了解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连道德的实际问题都未接触到——只有通过对照比较许多种不同的道德，道德的实际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在迄今的每一种“道德科学”中，实际上确实是忽略了道德本身这一问题；人们丝毫不觉得道德本身有什么问题！哲学家所谓的“给予道德以基础”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若以正确的眼光看，只不过是学术的形式坚信流行的道德，以新的方式表达流行的道德，因而只是在一明确的道德范围内就事论事。而且，从最终的动机上说，是一种否认，即否认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是合法的，并且拒绝检验、分析、怀疑和剖析对这种道德的信仰。譬如，请听一听叔本华是多么无知地——几乎可为此而获得勋章——谈论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你可以对道德“科学”的科学性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这门科学的最新大师仍在以小孩子和老妇人的口气说话。他说《伦理科学的基本问题》^①，第 136 页。): 所有道德家实际上都同意的一条原理或公理是：*neminem Laede, immo omnes quantum potes juva*，该公理实际上是所有道德导师力图证明的命

^① 叔本华：《道德的基础》，第 54—55 页，文科硕士阿瑟·B·布洛克译（1903 年）。



题，……就像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寻找点金石那样去寻找伦理学的真正基础。”——证明上述命题的困难确实太大了——众所周知，叔本华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本质为强力意志的世界上，无论是谁，只要彻底认识到这个命题是多么荒谬，多么虚假，多么感情用事，便可以告诉他，叔本华虽然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可每天晚饭后……却吹笛子，这是他的自传中说的。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抛弃了上帝和世界的人，却在道德面前止步——赞成道德，给 *Laede - nem-inem* 的道德吹笛子，那他究竟还是不是——悲观主义者？

187

撇开像“我们心中有一绝对命令”这样的断言有何价值不谈，我们总是可以问：这种断言对下断言者说了什么没有？在另一些人看来，有些道德体系力图为其创立者辩护；另一些道德体系则力图使创立者心情平静下来，使他自鸣得意；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要虐待自己，使自己谦卑低下；借助另外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进行报复；借助其他一些道德体系，他想掩盖自己，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使自己出人头地；——这种道德体系帮助其创立者忘却，那种道德体系使其创立者或创立者身上的某种东西被人忘却；许多道德家喜欢对人类行使权力，喜欢创造性地、武断地对待人类；还有许多道德家，尤其是康德则以其道德使我们确信：“我内心所尊敬的，就是我应该服从的，你我都是如此！”总之，道德体系



只是感情的一种手语。

188

与自由放任相对而言，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种对“自然”同时也是对“理性”的暴政；不过，这并不是反对道德体系的理由，除非人们又利用某种道德体系命令说，所有种类的暴力和非理性，都是非法的。每一种道德体系中本质的东西和无法估价的东西，是一种长期的约束。为了理解斯多噶哲学、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或清教主义，我们应记住每一种语言对力量和自由所施加的约束——即韵律的约束，韵脚和韵律的暴政。各国的诗人和演说家遇到了多少麻烦呵！当今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畔总是回响着要求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命令——正如功利主义的草率行事者所说，是“为了一个愚蠢的念头”而一丝不苟，这些散文作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明智的——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说，是因为服从了专断的规则才这么认为的，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然而，奇特的事实依然是，一切具有自由、文雅、果敢和巧妙必然性的事物，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存在的，无论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中，还是存在于管理或说话和劝说中，或是存在于艺术中，或是行为中，都是凭借着这种专断规则的暴政才发展起来的。说实在的，这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恰恰就是

法国天主教西多会女隐修院，17世纪詹森主义和文学活动中心。——译者



“自然的”——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为自然的”状态，即出现灵感时刻的自由安排、定位、布置和构造，是多么不同于他的自由放任状态——知道自己随后会多么严格而小心地遵守许许多多规则，这些规则正是由于其严格性和精确性，而完全无法用观念来加以表述（与这些规则相比，即使是最为稳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漂浮的、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天上和地上”本质的东西，显然（请再重复一遍这个词）是，应该有沿着相同方向的长期服从，由此才会产生，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产生某些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比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性、以及任何其他改变了面貌的、精致的、愚蠢的或神圣的东西。精神长期被束缚，思想的传播受到怀疑和限制，思想家在思考时约束自己，按照教会、法庭的规定，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前提进行思考，顽固的宗教意志按照基督教教义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在发生的每件事情中都要重新发现基督教的上帝，并为其作辩护：这一切暴行、专断、严厉、恐怖和不讲道理，已证明是一种惩戒手段，欧洲精神借此获得其力量、冷酷的好奇心和难以捉摸的流动性。当然也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窒息、闷死和毁掉许多不可恢复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自然”会显露真相，表现得过于辉煌，不偏不倚，令人震惊，却是崇高的）。过去欧洲的思想家们思考事物，只是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如今则相反，凡“想证明某件事情”的思想家，我们都对其表示怀疑——所要证明的事情总是在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他们极其严格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占星术中那样，或像当今的基督教道德为了“上帝的



荣耀”或为了“灵魂得救”而解释当前的个人事件那样——这种暴政，这种专断，这种严肃而堂皇的愚蠢，一直在教育着精神。无论是广义上的奴役还是狭义的奴役，都是精神教育和训练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我们可以用这种眼光看待每一种道德体系，因而每一道德体系“自然”要教导人们憎恨放任，憎恨太大的自由，使人们坚信需要限定地平线，需要履行当前的义务——告诉人们应当收缩眼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告诉人们，愚蠢是生活发展的一个条件。“你必须长期服从某人；否则你会遭难，会不再尊重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命令，肯定既不像老康德希望的那样是“绝对的”（因而才会有“否则”），也不是针对个人而说的（自然怎么会关心个人！）而是针对民族、种族、时代和阶层而说的，尤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动物性的“人”，即人类而说的。

189

勤劳的种族感到无所事事，非常难受，但英国人本能中是把星期天尊奉为极其神圣之日，以致下意识地渴望这一天不休息，仍然工作。于是便设计出斋戒，古代世界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虽然严格说来，就南方民族而言不是与工作有关）。许多种类的斋戒是必要的；哪里的强大势力和习俗占优势，哪里的立法者就务必要指定闰日，在这些日子这种冲动将受到约束，学会重新感到饥饿。从一种更高的观点看，整个时代在感染上道德狂热时，看起来便像是那些插入的克制和斋戒时期，



在这种时期，一种冲动学会低声下气，学会屈从——与此同时也学会弄干净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对某些哲学派别也可以作类似的解释（譬如希腊文化当中充满情欲气氛之下的柱廊派）。由此亦可得到解释以下矛盾现象的一个线索：为何正是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最盛行的时期，并且一般说来只是在基督教情绪的压力下，性冲动才会升华为爱情。

190

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实际上不属于柏拉图，而只是出现在他的哲学中，或者说，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这种东西就是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太高贵了，看不上苏格拉底哲学。“没有人想伤害自己，因而所有罪恶都是不知不觉地犯下的。坏人会自己损害自己；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罪恶，他就不会作恶了。所以坏人只是出于谬见而作恶；若使他摆脱谬见，就必然会使他成为好人。”这种推理方式散发着民众气味，民众只是觉察到作恶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后果，由此而作出实际判断，说“干坏事是愚蠢的”；同时他们把“善”等同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而不作进一步的思考。至于每一种功利主义体系。我们可以立即认为也有与上面相同的根源，循着此踪迹追踪下去，很少会出错。——柏拉图解释其老师的信条时，竭力将一些高雅和高尚的东西塞进去——他是所有解释者中最为大胆者，把整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拔高，使其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主题和一首大家喜爱的歌曲。用无穷无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体展



示他——即用他自己的所有伪装和多重性展示他。开句玩笑话，并用荷马的话来说，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是什么，难道不是—— $\pi\theta\acute{o}\nu\epsilon\ \Pi\lambda\acute{\alpha}\tau\omega\nu\ \acute{\alpha}\pi\lambda\acute{o}\nu\epsilon\ \epsilon\tau\ \Pi\lambda\acute{\alpha}\tau\omega\nu\ \mu\epsilon\sigma\sigma\eta\ \tau\epsilon\ \chi\acute{\iota}\mu\alpha\lambda\acute{\alpha}$

191

“信仰”与“知识”这一古老的神学问题，或者较为明白地说，本能与理性这一问题——即：就对事物的评价而言，本能是否应该比理性享有更大的权威，理性想要根据动机，根据“原因”也就是根据目的和效用来估价和行动——这个问题一向是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最先出现在苏格拉底的头脑中，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分裂了人的心灵。苏格拉底本人当然是由其具有的才能——即卓越的辩证法家的才能——牵着鼻子走，先是站在理性一边。实际上，他终生所做的，只是嘲笑高贵的雅典人表现出的那种叫人难看的无能，他们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是受本能驱使的人，绝对无法对其行动的动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然而，最终他也嘲笑了自己，虽然是默默地、偷偷地嘲笑：由于具有较为敏锐的良知和较强的反省能力，他发现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也是那么无能。他自言自语道：“但人们为何因此要使自己脱离本能！应摆正本能的位置，也应摆正理性的位置——人们必须遵从本能，但同时必须劝说理性，用有力的论证辅助本能。”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位伟大而神秘的讽刺家的虚伪；他把自己的良知带到了这样的境地，在该境地，他满足于一种自欺欺人。实际上，他觉察到了道德判断中的无

理性。——柏拉图在这些事情上较为无知，没有平民的那种狡猾，想要用其全部力量——一个哲学家所能付出的最大力量——证明，理性与本能自发地导向一个目标。导向善，导向“上帝”；柏拉图以来，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都采取了与此相同的路线——这意味着，在道德问题上，本能（即基督教徒所谓的“信仰”，或我所谓的“民众”）到目前为止取得了胜利。不过，理性主义之父（从而也是法国大革命之祖父）笛卡尔是个例外，他仅承认理性的权威，但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由此而知，笛卡尔仍是浅薄的。

192

不管是谁，研究一下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史，都会发现一条线索，借此可理解获得所有“知识和认识”中最古老和最常见的过程。不管在哪一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都是早熟的假说、虚构、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以及怀疑精神和耐心的缺乏——我们的感官姗姗学迟，而且从未完全学会成为获取完整知识的器官。在给定的场合，我们的眼睛易于产生已经产生过的图景，而难于捕捉住某一印象中的变化和新奇之处，因为后者需要运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耳朵听任何新的东西，也很困难和费力，因此听异国音乐感到很别扭。我们听到人们说另一种语言时，常不自觉地力图用我们熟悉的词语学说这种语言，例如德国人往往把 *arcubalista* 念成 *ambrust*（弩）。我们的感官也敌视和嫌恶新事物。一般说来，甚至在“最简单的”



知觉过程中，也是各种感情占支配地位——譬如惧、爱、恨，以及被动的懒散之感。——如今读者很少读一页书上的所有单词（更不用说所有音节了）——而只是读每 20 个词中的大约 5 个词，并“推测”这些词可能具有的适当意思——与此相同，我们现在很少正确而全面地观察一棵树，很少观察它的叶子、枝干、颜色和形状；我们发觉想像一棵树的际遇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非凡的经历当中，我们也这么做。我们杜撰大部分经历，几乎不能说服我们思考任何事件，除非我们是事件的“发明者”。这一切有助于证明，源于我们固有的本性，从久远的年代起，我们就一直习惯于说谎。或者说得较为文雅或矫饰一些，也就是说得较为好听一些。

一个人的艺术家气质要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在热烈的谈话中，我常常可以根据对方表达的思想或根据我认为他头脑里想的东西，非常清楚而明晰地观察到他的面部表情，其清晰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依靠视觉的力量——即双眼肌肉的巧妙运用所能看到的程度。他也许装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或根本没有表情。

193

白天做什么，梦中也会做什么，反之亦然。梦中经历的事情，若在梦中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最终就完全与“实际”经历的事情一样，与我们心灵中的东西相关联。由此我们就更加富有或贫乏，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种要求，最终，在大白天，甚

至在最清醒的时刻，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梦中的情景所支配。设想某人在梦中经常飞翔，设想他一做梦，就感到具有飞翔的能力和技术，感到这是自己的特权，自己享有的一种特别引人忌羨的幸福。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稍微动一下念头，就能作各种转变动作，就能自由自在地飞翔，毫不费力气、不受约束地“上升”，可自然而然地“下降”——不用费劲！——具有这种梦幻经历和做梦习惯的人，怎能不发觉另一种幸福，即使是在醒着的时候！他怎能不——渴望另一种幸福？与他自己的“飞翔”相比，诗人们所描述的“飞翔”，对他来说肯定太世俗、太费力、太剧烈、也太“麻烦”了。

194

人们之间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列出所想要的不同东西上——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对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好东西意见不一上，和对公认的好东西其价值大小、等级高低意见不一上——还更多地表现在他们认为什么是实际拥有和占有一件想要的东西上。譬如就女人来说，控制其身体和性满足，对于一个较为节制的人而言，便是拥有和占有的足够充分的标志；另一个疑心较重和对占有具有更大渴求的人，则觉得这种表面的拥有“成问题”，想作较为精细的检验，来弄清女人是否不仅只是把身体许给他，而且还愿意为了他放弃自己拥有或想要拥有的东西——只有作了这种检验之后，他才把她视为“占有物”。然而，即使做完这种检验，仍会有人觉得还有怀疑的余地，占



有欲还未得到满足：他会问自己，女人在为他放弃了一切之后，是否会为他的幽灵也这么做？他首先想要完全彻底地被人了解；为了得到爱，他大胆地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当他心爱的人对他不再存任何幻想，即爱他的卑劣和肮脏之处，又爱他的善良、坚韧和高尚精神时，他才会感到完全占有她。一个人想要拥有一个国家，会发现卡廖斯特罗^②和卡塔利那^②的高妙手法适用于此目的。另一个人的占有欲若较为高雅，会自言自语道：“我在想占有的地方不应行骗”——一想到他的假面具将在人们的心中占支配地位，他就生气，不耐烦。“所以，我必须让人们了解我，首先要学会自知之明！”人们总是会发觉乐善好施的人用叫人难看的灵巧手法给需要帮助的人作一番适当的打扮，打扮得如他似乎“应该得到”帮助，正寻求他们的帮助，并将会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眷恋。以这种傲慢态度，他们便像对待财产那样控制穷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宛似出于拥有财产的欲望。他们的施舍若与其他人相重复，或被其他人领先，他们会忌妒万分。父母总是不自觉地把孩子塑造成自己的样子——他们把这称作“教育”。没有哪位母亲在心底里怀疑她生的孩子是自己的财产，没有哪位父亲会对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犹豫不决。的确，从前父亲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新生婴儿的生死（例如在古代德国人中间）。与父亲一样，教师、班级、牧师和君主，也在每一新来的人身上，看到拥有一项新财

意大利 18世纪江湖骗子、魔术师和冒险家，流窜欧洲各大城市，以兜售假药、算命等行骗，因触犯刑律被判处无期徒刑。——译者

② 估计是与注 相类似的人物。——译者



产的机会。结果是……

195

塔西佗 和整个古代世界的人都说，犹太人是一“生来当奴隶”的民族。犹太人自己却说，而且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完成了颠倒价值评价的奇迹，由此在几千年岁月中获得了一种危险的新魅力。他们的先知把“富裕”、“不信神”、“邪恶”、“暴力”、“官能”等词语融合为一体，最先把“现世”这个词铸造成了贬义词。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价值评价的颠倒上（其中还包括把“贫穷”这个词用作“圣人”和“朋友”的同义词）；与犹太民族一起出现的，即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196

可以推断出：太阳附近有无数黑暗的天体。这些天体是我们决不会看到的。我们私下说，这是个比喻；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仅仅看成一种比喻性的符号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许多事物也许是未表达出来的。

塔西佗（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译者



197

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食肉的野兽和食肉的人（譬如，切萨雷·博尔吉亚），误解了其本性。我们力图在这些最健康的热带怪物和产物的体格上发现“病态”，甚或力图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地狱”——几乎所有道德家迄今都是这么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热带地区？他们是不是在不遗余力的诽谤“热带人”，说他们使人类患病，使人类堕落，或说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为何这样做？是为了偏袒“温带地区”，偏袒温带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吗？——那么，应该写出这样一章：“胆小的道德。”

198

所有致力于所谓“幸福”的道德体系，能是什么呢？只能是针对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险而提出的行为建议；只能是医治人们感情，纠正好倾向和坏倾向的药方，只要人们尚有强力意志，想要充当主人；只能是充满了老妇人智慧的大小权宜之计和巧妙手法。它们的形式都怪诞而荒唐——因为它们针对“一切”发表议论，因为它们不能在得出普遍规律的地方得出了普

① 博尔吉亚（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巴伦西亚大主教、枢机主教，善于利用阴谋和暗杀达到自己的目的。——译者



遍规律：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这说那，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它们都不仅让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过多的佐料，散发出危险气味，尤其是散发出“来世”的气味时，才是可忍受的，才具有诱惑力。从智力方面评价，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是“科学”，更不是“智慧”。但再说一遍，而且要再说三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掺杂着愚蠢，愚蠢，愚蠢——无论是像斯多噶学派劝说和鼓励人们的那样，对各种热烈而愚蠢的感情采取漠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还是像斯宾诺莎建议的那样，不再笑，不再哭，通过分析和剖析摧毁感情；或者像亚士多德的道德学说所鼓吹的那样，把感情降低到清白无邪的适当程度，在这一程度上，让感情得到满足；或者把道德视为拥有自觉减弱的感情，用艺术的符号作用使其超凡脱俗，或许表现为音乐，或表现为对上帝的热爱，表现为为了上帝而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在宗教中，感情只要是……，就会被再次授予公民权。最后，甚至是像哈菲兹和歌德教导的那样，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头和酒鬼，就可以顺从和沉溺于感情，大胆地放开精神和肉体自由意志的缰绳，因为在这种人那里，放纵感情“已不再有多大危险”。因而也应该写出这样一章：“胆小的道德。”

哈菲兹（1325？—1390？），波斯诗人。——译者



199

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联盟、社会、部落、民族、国家、教会），并总是大多数人相应地服从于发号施令的少数人。所以，迄今为止，人类最为经常地身体力行服从，最出色地培养出了服从精神。因而有理由认为，服从是每个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发布以下命令：“汝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总之，“汝应当”这种需要力求自己满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内容来填写其表格；依照其强度、不耐烦程度和急切程度，它那杂食性的胃口，可不加选择地立即明白和接受由各种各样下命令者对其喊出的任何东西——这些下命令者可以是父母、老师、法律、阶级偏见或舆论。人类发展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迟疑徘徊，拖延推迟，经常的倒退和改变方向，可归因于服从这一群居本能遗传得非常好，而命令艺术却受到了损害。倘若设想一下这一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则下命令者和独立的个人最终将消声匿迹；或者他们心灵深处会感到内疚，会先进行一番自我欺骗，然后才能下命令，宛如他们也只是在服从。目前欧洲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命令阶级的道德虚伪。他们使自己免遭内疚折磨的方法，只能假装是在执行（先辈、宪法、正义、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为久远的、更高一级的命令，或甚至用撷取自民众流行意见的熟语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爱群居的欧洲人目前摆出一副惟我

独尊的样子，对自己的各种品质赞不绝口，其中包括热心公益、和蔼可亲、服从依顺、勤劳、节欲、谦虚、宽容、富于同情心。由于有了这些品质，他便温文乐雅，坚韧不拔，有益于民众，从而具有了人类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认为不能缺少领袖和领头羊的情况下，当今人们一再试图把爱群居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取代发号施令者：譬如，所有代议制政体便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对于这些爱群居的欧洲人而言，出现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会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又会摆脱一个多么不堪忍受的重负呵——拿破仑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对这一事实的伟大证明。拿破仑的影响史，几乎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值得尊敬的个人和时期所获得的高级幸福的历史。

200

在各个种族相互融合的时代，人的身体中继承着多种多样的血统；也就是说，继承有相互对立的，而且常常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本能和价值标准。它们相互冲突，很少平静下来。晚近文化孕育出的这样一种人，通常是软弱的人。他的根本愿望是结束内心的战争；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种镇定药，就是某种（譬如伊壁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悠闲、无打扰、精神充实和最终和谐带来的幸福——用圣洁的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和刺激，同时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调和的本能外，他们身上还继承



和被灌输适当的控制力和机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骗的能力），来进行内心的这种冲突，那就会出现一些叫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和不可解释的人，他们注定要征服和胜过他人，最佳例子便是亚西比德 和凯撒（按照我的鉴别力，我要把欧洲第一人霍亨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与凯撒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当中或许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渴望休闲且软弱类型的人大量涌现的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是互补的，产生于相同的原因。

201

只要认为道德判断的效用仅仅是群居的效用，只要着眼点仅仅是保存社会，完全根据是否危害社会来决定什么是不道德的，就不会有“爱邻人的道德”。即便时常可见到些许关心、同情、公平、文雅和互助，即便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所有这些本能很活跃，近来被冠以各种荣誉称号，被称之为“美德，并最终几乎与“道德”概念相重合，但在此时期，它们仍不属于道德估价领域——它们仍超越了道德。譬如，同情行为在古罗马最鼎盛的时期，既不被称为好，也不被称为坏，即不被称为有德，也不被称为缺德；即便受到赞扬，赞扬中也含有怨恨和轻蔑，顶多把同情行为直接与有利于全体福利，有利于国家的行

亚西比德（？前 450—前 404），古雅典将军、政治家、苏格拉底的生死之交。——译者



为作一番比较。毕竟，相对于惧怕邻人而言，“爱邻人”总是次要的事情，部分是相沿成习的，是随意表露出来的。在社会组织总的说来似乎已牢固建立起来且能抵御外部危险之后，正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会再次带来有关道德评价的新观点。某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例如进取心、轻率鲁莽、报复心、狡猾、贪婪和权力欲，从一般效用的观点出发，不仅不得不给予荣誉——当然是以不同于此处所给出的名义——而且还不得不加以鼓励和培养（因为在抵御共同的敌人时，永远需要它们），但现在人们却感到这些本能的危险增加了一倍——眼下缺少发泄这些本能的机会——因而逐渐给它们加上了不道德的恶名，对其肆意加以诽谤。相反的本能和倾向却获得了道德荣誉；群居本能逐渐退出舞台。在一种观点、一种状况、一种感情、一种倾向或一种天赋中包含有多少危及社会的危险——这便是现在的道德视角；在这里，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正是在最高尚和最强烈的本能充满感情地爆发，并使人远远高于和超过群居良知的一般低水平时，社会的自我信赖能力便会被摧毁；社会对自己的信心，可以说社会的脊梁便会折断；因此，这些本能会受到最猛烈的谴责的诋毁。崇高的独立精神，鹤立鸡群的意志，乃至富于说服力的理性，都被觉得是危险的；于是，将个人提升至畜群之上，招致邻人恐惧的一切，都被称之为罪恶；宽容大度的、不喜铺张招摇的、善于自我平衡的性情，以及平凡的愿望和欲望，获得了道德上的殊荣和荣誉。最后，在和平气氛很浓的环境下，很少有机会也几乎没有必要把感情训练得严厉和严格；现在，每一种形式的严厉，甚至公正上的严厉，都开始使良心感到不安；透着傲慢与严厉的高贵和自负总是惹人生



厌，引起人的猜疑，“羔羊”，尤其是“绵羊”才赢得人们的尊敬。在社会发展史上，病态和温和娇柔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本身便会站在损害社会者的一边，站在罪犯的一边，而且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真心实意的样子。在社会看来，惩罚似乎有欠公平——的确，此时“惩罚”和“惩罚之义务”的思想叫人民感到痛苦和惊恐。“使罪犯不再能够为害，不就足够了吗？为何还要予以惩罚？惩罚本身太可怕了！”一旦提出这些问题，群居的道德亦即恐惧的道德，便会宣告终结。假如能完全消除危险，消除造成恐惧的原因，同时也就终结了这种道德，这种道德也就不再认为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无论是谁，只要考察一下当今欧洲人的良心，都总是会从其道德的褶皱处和隐蔽的凹陷处，发现相同的命令，胆小的民众的命令：“但愿迟早不再有可害怕的东西！”迟早——哪里是迟早，现在这种意志和通向这种意志的道路，在整个欧洲就被称作“进步”。

202

我要立即再说一遍，我已说过上百遍的事情，因为人们的耳朵不愿听这样的真理——我们的真理。我们都很清楚，若有谁直接地，不是在比喻的意味上把人归于动物之列，那听起来有多刺耳；可是，偏偏在谈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时，我们常常使用诸如“畜群”、“畜群本能”这样的词语，这会被视为我们的罪过。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新见识。我们已发现，在欧洲以及受欧洲影响的国家，人



们在主要的道德判断上的意见都一致：在欧洲，人们显然都知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知道当初那条著名的蛇答应教给人的事情——如今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如果我们老是反复说，欧洲人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欧洲人用自夸自责赞美自己、称自己为善的，乃是畜群之人的本能，那听起来一定很刺耳，叫人很反感。这种本能已显露出来且愈来愈强烈，而且随着其症状之生理上的近似性和相似性不断增大，它愈来愈占据支配地位，凌驾于其他本能之上。目前欧洲的道德乃是畜群道德；所以，照我们的理解，它仅是一种人类道德，与其相并列，在其之前和在其之后，可能还有而且也应该有其他许多道德，尤其是一些高层次的道德。可是，为免遭这种“可能”和“应该”的损害，这种畜群道德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它执拗而毫不容情地说：“我就是道德本身，再没有其他什么道德了！”实际上，借助于一种迁就和迎合畜群之最高尚欲望的宗教，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经常发现这种道德甚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民主运动继承了基督教运动的遗产。可是它的速度，对于那些性急者，对于那些被畜群本能弄得疯颠颠、心烦意乱的人来说，则嫌太慢而令人困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野狗越来越猛烈的狂吠和越来越不加掩饰的龇牙裂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野狗目前正在欧洲文化的街道上游荡。表面上都反对温和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思想家，更加反对蠢笨的冒牌哲学家和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希望建立“自由社会”的博爱空想家，可实际上却是一丘之貉，对于除了自治的畜群以外的任何社会形式，都抱有根本的敌意（甚至拒不接受“主人”和“仆人”



这样的概念——社会主义的公式是，既不要神，也不要主人）；都一致坚决反对一切特殊要求、一切特殊权利和优先权（这意味着最终反对一切权利，因为如果人人平等，也就没有人再需要“权利”了）；都一致怀疑惩罚的公正（似乎这是对弱者的一种侵犯，对所有以前社会的必然结果的不公平）；但他们也都同样信奉同情的宗教，凡是感受过、生活过和遭受过的一切，对之都表示同情（下至禽兽，上至“神”——过分“同情神”乃是民主时代的现象）。他们一起为同情呐喊，为同情焦急，一般说来，对痛苦恨得要死，几乎像女人那样不能目睹痛苦，不能听任痛苦存在。他们都不由自主地黯然忧伤，心肠变得很软，欧洲被其迷惑，仿佛受到一种新佛教的威胁。他们一致坚信相互同情的道德，好像这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顶点，是人类所达到的顶点，未来的、独一无二的希望，也是对当前的安慰，对过去所有债务的大清偿；全都一致相信社会是拯救者，也就是相信畜群，相信“自己”。

203

我们则有一种不同的信念——我们不仅把民主运动视为一种堕落的政治形式，而且认为它相当于人的一种堕落和衰落的形式，其中包含着人的平庸和贬值。那么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何处？寄托在新哲学家身上——别无其他选择：寄托在身体非常强健、创造力非常丰富的人身上，他们能提出相反的价值判断，能重新估价和颠倒“永恒的价值”；寄托在先驱者身上，



寄托在未来人身上，他们目前便勒紧裤腰带，打紧鞋带，迫使太平盛世走上新的道路。为了使人懂得人类的未来就是其意志，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的意志，为了准备好在培养和教育人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冒险和尝试，从而结束愚蠢和偶然的可怖统治（这种统治迄今的名称是“历史”，其最近的形式是“最大多数人”这一愚蠢说法）——为此目的，迟早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哲学家和命令者。一想到这些哲学家和命令者，一切与那些神秘的、可怕的和仁慈的生物有关的事物便显得那么苍白和矮小。这种领导者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晃动——我是否可以大声说，你们就是自由精神？为产生它们，人们一方面要创造同时也要利用的条件；还有所推定的方法和检验，借此，灵魂可逐渐成长，达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以致感到不得不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对价值的重估，在其新的压力和锤炼之下，良心会被铸得钢铁般坚硬，心肠会变得硬如黄铜，于是可承受责任的重压。另一方面则非常需要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很可能供应不足、早产和堕落——这些就是我们真正担心和发愁的事。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这些自由精神！这些便是横扫我们生活的思想及暴风雨。几乎没有哪一种痛苦比看到、发现或感受到一个杰出人物迷失道路和堕落，更叫人难以忍受了。但是，倘若某人个独具慧眼，看到“人类”自身有可能堕落，倘若他像我们那样认识到在摆弄人类命运的游戏里，迄今起作用的是极端的偶然性——无论是上帝之手，还是“上帝之指”都未参与这场游戏！倘若他发觉了隐藏在白痴般欣然接受和相信“现代思想”背后的命运，尤其是发觉了隐藏在全部基督教——欧洲道德背后的命运，那他遭受的痛苦便是其他任何人



所无法比拟的。他瞥见了通过耐心积蓄和扩大人的能力和能量所尚能发掘的人的潜力；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人尚有发挥最大潜力的余地，知道普通人过去常常面对神秘的决定和新的道路——他从自己最为痛苦的回忆中，可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即回忆一下各种讨厌的障碍，迄今都已成为碎片，被粉碎、沉没，变得不值一提。克服了这些障碍，便可取得最高层次的发展。人类普遍退化至“未来人类”——即社会主义蠢货和浅薄者所理想化了的未来人类——的水平，人类的这种退化和生长受到阻碍，变成绝对群居的动物（或者如他们所称谓的，变成“自由社会”的人），人类受到这种残酷对待，成为具有平等权利和要求的特别矮小的动物，无疑是可能的！谁参悟出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谁便体验到其余人类所未曾体验过的另一种厌恶——或许也是一种新的使命！



第六章 我们学者们

204

冒着道德说教一向显示出的那种风险——即，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坚决暴露自己伤口的风险——我斗胆对科学与哲学相互地位的改变而提出抗议，这两者之间的地位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必须有权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我看来，人们的经历总是不幸的——来看待如此重要的地位问题，而不要像瞎子那样谈论颜色，不要像女人和艺术家那样对科学说三道四（他们出于本能，也出于羞愧而叹息道：“唉！这该死的科学！它总是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科学家宣布独立，宣布从哲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是民主的组织状态和混乱状态的后果之一。现在的学者都是一副自我陶醉、自负自夸、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样子——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吹嘘就发出香气。此处还是民众的本能发出叫喊：“摆脱一切主人”。科学在反抗了神学，取得辉煌战果，不再是神学的“仕女”之后，现在肆无忌惮、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要为哲学制定法律，声称该轮到它来充当“主人”了——我在说什么呀！它是声称要由自己来充当哲学家。在我的记忆——对不起！是一



个科学家的记忆——中，可曾听说过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年老的医生（更不用提所有学者中最有教养和最自负的语文学家和中小学教师了，他们从职业上说不分你我）对哲学和哲学家采取的幼稚的傲慢无礼态度。有鉴于此，专科医生和专业人员出于本能对所有综合工作和综合能力采取守势；另一次，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察到哲学家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因而感到自己受了委屈，被人小看了。还有一次，功利主义者由于患有色盲症，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东西，而只是看到一系列遭到驳斥的体系和“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的”过高开支。另一次，人们普遍对隐蔽的神秘主义感到恐惧，担心知识的疆界被调整；另一次，对个别哲学家的蔑视，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了对整个哲学的蔑视。最后，我常常发现，在年轻学者对哲学不屑一理的态度背后，有某位哲学家造成的恶劣后果，虽然人们已下决心不再遵奉他，可是却未能消除他对其他哲学家的嘲笑和蔑视——结果是对整个哲学的敌意。（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最为现代的德国人造成的影响就是如此。由于疯狂地反对黑格尔，他成功地把整个最新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的联系切断了，而这种文化一直在提升和完善历史感；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本人的贫乏、接受能力之差和反德国精神之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的来看，正是现代哲学家的卑劣，从根本上损害了人们对哲学的尊敬，给民众的本能敞开了大门。仅让我们承认现代世界已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恩培多可勒世界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想一想那些庄严华贵的隐居修道者，当时被称作什么；而现在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当今时尚的影响，既高而又高，又低而又低（在德国，例如柏林的两头

雄狮，无政府主义者欧根·杜林和调和主义者埃迪亚德·冯·哈特曼，都是如此），对此，出身较高贵的老实的科学家又有何感觉。特别是，看到那些自称为“实在论者”或“实证主义者”的哲学家，肯定会使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心中产生不信任感：这些哲学家顶多是学者和专家，这一点很明显！他们都被科学所征服，重新受到科学的支配，他们有时要求从自身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无权享有这些“更多的东西”，亦无权承担这些更多东西的责任。他们目前在言行上值得称许地，并充满憎恨和仇恨地，不相信哲学的监督责任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科学蓬勃发展，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而现代哲学却在逐渐下沉，当前剩下的部分激起的即使不是轻蔑和怜悯，也是不信任和不愉快。哲学家已还原成“知识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各时代的一门缺乏信心的科学，一种教人忍耐的学说：哲学甚至还从未跨过门槛，尚未登堂入室；也可以说，哲学是在作最后的挣扎，已走到路的尽头，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之中，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这样一种哲学怎么能够占据支配地位？

205

阻碍哲学家成长的危险如今多而又多，以至人们怀疑这个果实还能否成熟。科学的范围和结构已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哲学家也越来越有可能在学习时就感到疲惫厌倦，越来越有可能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成为专家”，从而不会再往高升。也就是说，不会具有超人的眼光，不会做到滴水不漏，不会俯视



一切。或升高升得太晚了，成熟的最佳时期和力量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他已受到损伤，变得粗糙而衰弱，因而他的观点，他对事物的一般评价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也许正是智力良心的改进，使他在征途上犹豫彷徨；他害怕受到诱惑，变成浅薄的涉猎者，变成百足虫，变成千芯啄；他太清楚了，一个目光敏锐的人，若已丧失了自尊，便不再能发号施令，不再能引导人们了；除非他立志要成为伟大的演员，成为通晓哲学的江湖骗子，成为精神上的捕鼠者。总之，成为把入引上歧路的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不是个良心的问题，而是个趣味的问题。给哲学家增添更多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要求自己作出判断，说是或否，不是对科学，而是对人生和人生的意义。他不情愿地学会相信，作出这种判断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于是他不得不设法完全依靠最为广泛的（或许是令人烦恼的、毁灭性的）经历，来行使这一权利，并达到上述信念。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犹豫不决，产生怀疑，被惊得目瞪口呆。其实，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大众误认为是并混同于科学人士和典型的学者，或被误认为是并混同于具有高尚宗教情操的、无情无欲的、超凡脱俗的、耽于幻想的、醉心于上帝的人士；然而，当一个人听说某人由于过“富于智慧的”或“哲学家般的”生活而受到赞扬时，其意思只不过是过“谨慎而离群索居的”生活。智慧，对大众来说似乎是一种飞翔，是一种成功地脱离罪恶游戏的手段和手法；但真正的哲学家——我的朋友们，难道对我们来说看起来不是这样吗？——过的却是“非哲学的”和“没有智慧”的生活，尤其过的是一种不谨慎的的生活，感到有义务和责任做许许多多的尝试，感到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他不

断冒险，他参与这种罪恶的游戏。

206

所谓天才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要么产生，要么创造（都这两个词最充分的意思而言）。相对于天才而言，学者，即一般科学家，身上总是有某种老妇人的味道；因为，跟老妇人一样，学者也不熟悉人类的这两项主要功能。当然，应该承认，似乎是作为补偿，这两种人也是值得尊敬的——这里强调的是值得尊敬。但是，在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时，也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让我们较为仔细地考察一下：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首先，科学家是普通类型的人，具有普通的美德；也就是说，是非统治类型、非权威类型、非充满自信类型的人；他们勤劳刻苦，耐心地与普通人打成一片；他们生性喜欢像自己那样的人，生性喜欢这样的人需要的东西。例如：需要拥有足以过温饱生活的收入和一块绿草地，没有这些便无法放下工作稍作休息；需要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注（这些首先是得到承认和可以得到承认的先决条件）；需要好名声带来的温暖与幸福；他们的价值和有用性，需要得到永恒的认可，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内心对这一点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存在于所有从属性的人们和群居性动物的心底。学者与其身份相称，也有一些可鄙的毛病和缺点。他们气量狭小，充满了妒忌，对那些他们无法企及的性格，他们的眼睛特别犀利，可从鸡蛋里挑出骨头。他们易于相信别人，但只是在自己能随心所欲时才易于相信别人，并不



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正是在领导伟大潮流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得较为冷淡，不那么愿意开口——此时他们的眼睛像是平静而毫无波澜的湖面，狂喜或同情都不能使其有波动。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最坏和最危险的事情，产生于他那种类型的人的平庸本能，产生于平庸的耶稣会教义，此种教义出于本能尽力要消灭杰出人物，力图弄断——或更好些，放松——每一把弯弓。当然，要怀着体谅的心情放松，自然也是用宽厚的手放松——怀着易于相信别人的同情心放松。这就是耶稣会教义的真正手法，它一向知道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富于同情心的宗教，兜售给人们。

207

无论人们多么满怀感激之情地欢迎客观精神——谁不对一切主观性及其讨厌的自我意志腻烦得要死！——可是，最终人们甚至必须学会小心对待自己的感激之情，必须停止过分赞颂精神的无私化和非个人化，最近人们似乎把精神的无私和非个人化当作了目标本身，当作了拯救和荣耀——特别是悲观学派常这么做，而该学派也有充足的理由向“无私的知识”致以最高的敬意。客观的人，不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咒骂和斥责，理想的学者，在遭受了许许多多全面的和局部的失败后，其身上的科学本能开始全面发展，这样的人无疑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最昂贵的工具，但其作用却掌握在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人的手中。他仅仅是一件工具；我们可以说，他是镜子——他不是“目的”。

本身”。客观的人确实是镜子，习惯于拜倒在要了解的每件事情之前，只具有了解或“反映”等词语表示的欲望——他等待着，直到发生某件事，然后敏感地展开四肢，即使是神的轻轻脚步和飘然而过，也会在他的表面留下痕迹。不管他仍具有什么“个性”，这种个性在他看来都是偶然的、任意的，而且常常令人不安。他已慢慢地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视为外部形式和事件的经过和反映。他尽力回想“自己”，可常回想得不对；他动辄便把自己与其他人混在一起，搞错自己的需要，只是在这方面他不精细，粗心大意。他也许为自己的身体，为了与妻子和朋友闹点小别扭，为缺少朋友和社交活动而苦恼——的确，他设法思考自己的痛苦，但是白费力气！他老是走神，思考的总是较为一般的情形，昨天他不知道如何自助，明天他也不知道如何自助。他现在不认真对待自己，也不为自己花很多时间。他安详而宁静，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因为有能力理解和对付自己的烦恼。他习惯于殷勤对待所有事物和经历，高高兴兴、亲切接受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他总是那么性情温和，总是那么超然物外，对什么都不置可否。天哪！在许多情况下，他不得不为他的这些美德付出代价！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人，他太易于成为这种美德升华后剩下的渣滓了。假如有人想从他那里得到爱或恨——我指的是上帝、女人和动物所理解的那种爱和恨——那他会竭尽全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但是，如果他爱得不深，恨得不深——如果他在这方面表现得虚伪，脆弱，有问题和堕落，人们一定不要吃惊——他的爱是不自然的，他的恨是造作的，毋宁说是一种力气活儿，有点卖弄和夸张的味道。他的真诚完全以他的客观为转移；只有在完全安详和宁静时，



他才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他那映照一切和总是自己擦得很亮的灵魂已不知道如何肯定，已不知道如何否定；他不发号施令；他也不搞破坏。“我几乎什么都不怕”——他与莱布尼兹一起这么说。我们可不要忽视和小看这个几乎！他也不是模范人物；他不超过任何人，也不落后于任何人。他对一切都采取极其超然的态度，既没有理由支持正义事业，也没有理由支持非正义事业。人们长期以来把他混同于哲学家，把他混同于凯撒的老师 and 文明的独裁者，给予他太多的荣誉，忽视他身上较为本质的东西——他是一件工具，可以说是个奴隶，当然是那种最受人尊敬的奴隶，但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客观的人是一件工具，一件昂贵的、易于损坏的、易于失去光泽的衡量工具和反射工具，当小心使用和照料；但他不是目的，不是向外去和向上去的，不是其他存在物借以为自身辩护的互补性人，不是终点，更不是起点。不是一项创生性的或原创性的事业，没有任何想成为主人而必须具备的那种英勇果敢、坚强有力、以我为中心的气质；而只不过是陶工使用的柔软的、空心的、精巧的、可移动的模板，要用某种内容和框架使其“成形”。他通常是个没有框架和内容的人，一个“无私的”人。顺便说一句，也就是对女人毫无吸引力的人。

208

如果现今某一哲学家声称自己不是怀疑论者——我相信人们已从上面对客观精神的描述中推测出他会这么做——大家都



会听得不耐烦；人们因此会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他，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的确，在胆小的听者当中，他从此便会被说成是危险人物，目前有许多胆小的听者。在他们看来，他抛弃怀疑论似乎使他们听到远处响起了某种预示灾难声音，似乎某处正在试验一种新炸药，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炸药，一种新发现的俄国的虚无主义，一种悲观主义的善良意志，它不仅否定，意味着否定，而且——太可怕了——还实践否定。针对这种“善良意志”——一种简直就是实际否定生命的意志——当今人们普遍承认，没有比怀疑论更好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了，怀疑论是一种平和的、惹人喜欢的、诱骗人的罂粟花；当今的医生把哈姆雷特当成“精神”及其地下噪声的解毒剂。“我们的耳朵中不是已充满了令人不快的声音？”怀疑论者说，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安全警察，“这种暗中的否定太可怕了！住嘴，你们这些悲观的鼯鼠！”怀疑论者是种娇贵的动物，很容易被吓着。其良心所受的教育，使他一听到否定便惊跳起来，甚至听到清脆而坚定的肯定也会惊跳起来，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肯定！和否定！——在怀疑论者看来是与道德相对立的。正相反，他喜欢采取孤高超然的态度来显示他的美德，同时或许还会和蒙田一起说：“我知道什么？”或者和苏格拉底一起说：“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相信我自己，况且门也没有向我敞开。”或者：“即使门是开着的，我干嘛要立即进去？”或者：“仓促提出假说有何用？不提出任何假说倒可能很有风度。干嘛非得立即把弯的东西弄直不可？干嘛非得立即用某种麻絮填塞每个洞？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吗？没有空闲时间了吗？哦，你们这些坏家伙，难道就不能等



一等吗？不确定的事物也有其魅力，斯芬克斯也是女妖锡西，女妖锡西也曾是哲学家。”——怀疑论者如是安慰着自己。老实说，他需要某种安慰，因为怀疑论是某种生理气质性疾病在精神上的集中表现，这种疾病用一般话来说就是神经衰弱。每当长期分离的不同种族和阶级一下子突然相互融合在一起时，便会发生这种疾病。新一代人的血液中可以说继承了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对价值的评估，在他们身上，一切都是躁动不安的，一切都处于混乱、怀疑和试验当中。各种最有效的影响力作用都有限，各种美德相互阻碍无法成长，无法在人们心中扎根，无法相互保持平衡，无法成为稳定因素，人们的身心缺少垂直的稳定性。然而，这些无法形容的人患病最重和退化最利害的是意志；他们很长时间不再独立作决定，很长时间不再有运用意志力的压力感，不再有英勇无畏的冲动——他们对“意志自由”产生了怀疑，甚至不相信睡梦中有意志自由。当今欧洲景象是，人们愚蠢而轻率地力图把各个阶级，从而各个种族彻底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它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都表现出了怀疑主义情绪。有时展现出的是多变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迫不及待地、漫无边际地从一个枝干生长到另一个枝干，有时呈现出一片阴暗的样子，宛如填满了问号的乌云——常常对自己的意志厌烦得要死！意志瘫痪了；我们在哪里看不到这样的瘸子！可常常装扮得多么好看！打扮得多么诱人！为这种疾病备有最漂亮的盛装和伪装。这些盛装当前在橱窗中标示的名称大都是“客观性”“科学精神”等等。“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自觉的知识”只不过是经过打扮的怀疑主义和意志瘫痪——我愿意为欧洲病作出的这种诊断负责。意志病在整个欧洲的传播是不

等的；在文明盛行时间最长的地方，病得最利害，此种病的种类也最多；只要在西方文化松松垮垮的遮盖物之下，“野蛮人”仍（或再次）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病便会减轻。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和理解，正是在当今的法国，意志最为薄弱；法国一向善于把其可怕的精神危机转化为某种可爱而迷人的东西，现在突出地显示出了其对欧洲的智力优势，成了展示怀疑主义之全部魅力的课堂和展览会。作出决定以及坚决执行一项决定的力量，在德国较为强大，而在德国北部又比在德国中部强大；在英格兰、西班牙和科西嘉更为强大得多，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粘液^①，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坚硬的颅骨。更不用提意大利了，它还太年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先得表明自己能否运用意志；但运用意志的力量最为强大、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在广袤的罗马帝国中部，是在欧洲可以说是流回亚洲的地方——即俄罗斯。在那里，运用意志的力量已存储和积蓄了很长时间，在那里，意志——拿不准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虎视眈眈地等待着被释放（借用物理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词）。要使欧洲摆脱其最大的危险，或许不仅需要印度战争和在亚洲的纠纷，而且还需要有内部的颠覆，需要把帝国摧毁，分裂成一个个小国，需要建立极其愚蠢的议会，还需要使每个人感到有义务在吃早餐时看报纸。我说这些并不是真的希望发生这些事情；相反，我内心倒希望发生相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俄国表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架式，促使欧洲也下决心摆出同样咄咄逼人的架式——即，开始具有统一的意

古生理学所称四种液体之一，据信此液体多，则人迟钝。——译者



志，依靠一新的社会集团统治欧洲，这是欧洲自己的一种百折不挠的、令人敬畏的意志，它将确定未来几千年的目标；这样，在欧洲已上演了过长时间的小国家喜剧，以及欧洲在封建与民主之间的三心二意，最终便会宣告结束。小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下个世纪将发生争夺世界政治权的斗争——人们将屈从于大政治。

209

我们欧洲人显然已进入了新的好战时代，关于这种时代或许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怀疑主义发展，我想初步仅仅用一则寓言来发表我的看法。热爱德国历史的人是会理解这则寓言的。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古怪而令人难以捉摸，发疯似地喜欢长得高大漂亮的掷弹兵（他作为普鲁士国王，生了一个对一切抱怀疑态度的军事天才——因此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已成功地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新型德国人），一度曾具有天才的眼光和理解力：他知道当时的德国缺少什么，缺少这种东西要比缺少文化和社会形态更令人忧虑和担心一百倍——出于本能和内心的深深不安，使他对年轻的腓特烈抱有敌意。当时缺少的是男人；他极为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儿子不够男人气。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弄错了；但处于他的位置谁不会弄错呢？他看到儿子滑入了无神论的泥潭，整日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像机灵的法国人那样快活和轻浮。他在背景中看到了那个大吸血鬼，那个大蜘蛛，就是怀疑论；他感觉到一颗无可救药的、可怜的

心灵不再硬得足以作恶或为善，感觉到一不再下命令的、被折断的意志是不能再下命令的。可是与此同时，在他儿子的心中却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冷酷和危险的怀疑论——又有谁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正是由其父亲的恨、冷冰冰的忧郁和孤独的意志所造成的？——这是一种英勇无畏、充满男人气的怀疑论，与军事和征服天才紧密联系在一起，附着在腓特烈大帝的身上第一次进入了德国。这种怀疑论藐视一切，但却能把握一切；它颠覆一切，却也占有一切；它不相信一切，但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它孕育出危险的自由精神，但却牢牢地守护着心灵。这是德国式的怀疑论，作为挥之不去的腓特烈主义，已上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把欧洲置于德国精神及其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怀疑之下。仰赖于德国的伟大语文学家们和历史批判家们，其无比坚强的、不屈不挠的男人性格（亦可以正确地评价说，他们也都是进研摧毁和解构的大师），已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德国精神——尽管在音乐和哲学方面存在着浪漫主义倾向。这种精神中男人气的怀疑论明显地占上风，其表现是，譬如，无所畏惧地直视一切，勇敢而严格地剖析一切，毅然地踏上发现的征程，在一望无云而预示着危险的天空下毅然地加入圣洁的北极探险队。面对这种精神，面对米什莱称之为宿命论式的、讽刺性的、魔鬼般的精神，冲动热情而浅薄的人道主义者战栗着在胸前划十字，便不足为奇了。但是若要认识到德国精神中“男人”的这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使欧洲从独断论的沉睡中沉醒了过来，还得回想一下一定要用这

米什莱（1798-1897），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种新观念克服的以前的观念——并非很久以前，一个男性化的女人会大胆而无所顾忌地、自以为是地向欧洲这样推荐德国人，说他们是性情温和的、好心肠的、意志薄弱的、喜欢诗歌的傻瓜。最后，谨让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理解拿破仑见到歌德时的惊奇；他看到的正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人们视为“德国精神”的东西。“Voilà un homme!”^①——这等于说：“这是个男子汉！而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德国人！”

210

于是，如果在未来哲学家的画像中，某一特征使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何不就是前述意义上的怀疑论者，则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他们自身——便只能如此定名。他们也同样有权把自己称为批判家；而且他们无疑成为实验家。通过我冒昧地给他们取的这个名字，我已明白无误地强调了他们从事的尝试活动和他们对尝试活动的热爱。这是否因为他们作为名副其实的批判家，将喜欢在一种新的、或许更为广泛和更为危险的意义上利用实验？由于酷爱知识，他们是否会在大胆而痛苦的尝试中比民主时代受到娇纵的敏感趣味所能赞同的更向前迈进一步？毫无疑问，这些未来的哲学家绝对不能没有那些把批判家与怀疑论者区别开来并按良心办事的重要品质。我指的是他们对价值标准充满自信，有意识地运用首尾一致的

法文，意为“这是个男子汉！”——译者



方法，谨慎而勇敢，卓尔不群，有能力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且，他们将公开宣称自己喜爱否定和剖析，宣称应该具有某种谨慎的残酷，即便在心滴血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稳当而灵巧地运用匕首。他们要比讲人道的人所希望的更为严厉（而且并非仅仅总是对自己严厉），他们讨论“真理”不会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振奋”和“鼓舞”自己。相反，他们几乎不相信“真理”可以使人沉醉于这些感情。若有人当着这些严厉的人面说：“那种想法使人振奋，那它为何不是真的？”或者“那件作品使我着迷，那它为何不是出类拔萃的？”或者“那个艺术家使我感到充实，那他为何不是伟大的？”则这些人便会微微一笑，或许不仅是微微一笑，而且还从内心厌恶所有这些如痴如狂的、理想主义的、女人气的、不男不女的表现。若有人能窥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多半不会发现他们打算把“基督教感情”与“古代审美力”，甚或与“现代议会制政体”相调和（在我们这个很不确定的因而很调和的时代，则必须会在哲学家身上发现这种调和）。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不仅会要求自己具有批判素养和每一种有助于智力纯洁和严谨的习惯，他们甚至还会把它们展现出来，作为自己的特殊装饰，不过他们不会因此而希望别人把自己称为批判家。在他们看来，若像当今人们喜欢做的那样，判定“哲学本身就是批判和批判科学——仅此而已！”那可是对哲学不小的侮辱。虽然对哲学的这种评价会得到法国和德国的所有实证主义者的赞同（甚至可能会赢得康德的欢欣，很合他的口味：请回想一下他的主要著作的名称），但我们的新哲学家们即会说，批判家是哲学家的工具，正由于这一原因，作为工具，他们远远不是哲学家！就连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佬也只



是一个伟大的批判家。

211

我坚持认为，人们最终应停止把哲学工作者，以及一般的科学家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正是在这里，应该严格地使他们“各得其所”，而不应给予前者过多，而给予后者过少。要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亲自踏上过所有的台阶，而其仆从，即哲学的科学工作者，现在则仍然站立，而且必须仍然站立在这些台阶之上。哲学家自己或许必须曾经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此外还必须曾经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解谜者、道德家、预言家、“自由精神”，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从而遍历人类价值和判断的整个领域，能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和良知，从高处眺望任何远处，从低处仰望任何高处，从每一角落窥视任何辽阔之处。但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他执行其任务的初步条件；任务本身还另有所求——即要求他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则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光辉榜样，要确定某种现有的庞大估价系统，并使其形式化，不论是在逻辑领域、政治（道德）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所谓现有的估价系统就是以前确立、创造的价值，它们已广为流行，且暂时被称作“真理”。这些研究者所要做的是将迄今发生和受到尊敬的一切，弄得显而易见、易于想像、明白易懂、易于驾驭，把一切长的东西，甚至“时间”本身弄短，并制服整个过去。这是项令人惊叹的艰巨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任何高雅的矜持，

任何顽强的意志，都肯定会得到满足。然而，真正的哲学家们却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们最先确定人类的去处和动机，由此而撇开一切哲学工作者和一切制服过去者的先前劳动——他们用富于创造力的手掌握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由此而变成了他们的手段、工具和锤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一种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强力意志。现在有这样的哲学家吗？过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某一天是否一定会有这样的哲学家？

212

我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日益发觉自己，而且是不得已而发觉自己，处于与其生活的时代相对立的地位；他的敌人总是其时代的理想。迄今人们称之为哲学家的那些所有促进人性发展的非凡人物——他们很少将自己视为爱智慧的人，而是将自己视为招人讨厌的傻瓜和危险的质问者——已发现其使命，其非自愿的、必须执行的艰巨使命（不过，最终则将是伟大的使命），是充当其时代的内疚。在把解剖刀放在其时代道德的胸膛上时，他们便暴露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新的伟大，是为了发现一条尚未被踩出的提升人类的新路。他们总是发现，在大多数各种各样受人尊敬的当代道德的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伪善、懒惰、自我放纵和自我忽略，有许许多多的道德已经过时。他们总是说：“所以我们必须迁移至你感到最不舒适自在的地方。”现代



思想”想要把每一个人拘于一隅，限定在一个“专业”之中，面对大量这样的现代思想，哲学家，如果现今能有哲学家的话，将不得不把人的伟大，即伟大这个概念，定义为人的广博和全面，定义为人的多才多艺；他甚至要根据一个人所能忍受和承担的数量和种类，根据一个人所能肩负更多责任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和等级。如今，现代趣味和道德削弱和减弱了意志；最适合于现代精神的就是意志的薄弱；因此，按照哲学家的理想，伟大这一概念中尤其要包括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而相反的学说则适合于相反的时代，相反的学说确立的理想是病态的、弃绝欲望的、谦卑的、无私的人类。在这种时代，譬如十六世纪，意志能量过分积聚，私欲横流。在苏格拉底时代，有一些本能衰竭的人，即上了年纪的保守雅典人，他们纵情欢乐——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幸福”；正如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是为了快乐”。他们嘴上总是冠冕堂皇，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早已使他们无权这么说。在这些人当中，为了灵魂的伟大，也许需要佯装无知，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恶毒的厚颜无耻，他们不仅伤害了“高贵者”的灵与肉，而且砍伤了自己的肉，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说：“在我面前别遮遮掩掩的！喂——我们是平等的！”与此相反，当前在整个欧洲则只有群居动物得到荣誉和分配荣誉，“权利的平等”可以极其容易地转变为错误的平等。我的意思是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反对一切稀有的、奇特的、享有特权的东西的全面战争，反对高等人、高等灵魂、高等义务、高等责任、创造全权和贵族气派的全面战争。因而当前“伟大”这一概念中应包含努力使自己高贵，使自己离群索居，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尽力靠个人主动性生活；哲学家

的以下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自己理想：“最伟大的人是最能独处、最能隐藏、最能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是超越善恶的人，是掌握自己的道德的人，是意志极为充沛的人；这才可以称之为伟大：多样而完整，丰富而全面。”且再问个问题：现今伟大是否可能？

213

很难弄清楚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不能由别人告诉的事情，必须靠亲身经历来“了解”——也可以自负得不屑于了解。目前大家都谈论自己不能亲自经历的事情，不幸的是，在涉及哲学家和哲学问题的事情上尤其是这样——很少有人了解这些问题，也很少有人能了解这些问题，因而普通人对它们的了解都是错误的。譬如，快速运行的狂放而充溢的精神，与不出一点错的逻辑论证的严谨和必然，在哲学上的真正结合，是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凭自己的经验所不能了解的，所以若有人在他们面前谈论它，他们会表示不相信。他们觉得每一种必然性令人讨厌，是一种叫人感到痛苦的强迫性服从和受约束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思维本身是件缓慢而迟疑不决的事情，几乎是件麻烦事，常常“要令高贵者流汗”——决不是件容易而神圣的事，也与跳舞和充溢没有密切关系！“思维”和“认真”而“艰苦地”对待某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回事；这就是他们的“体验”。在这方面艺术家或许有更为敏锐的直觉；当他们不再“随意”做某事，当一切必然的事情达到顶点时，他们对



自由、微妙、力量的感觉，对富于创造性的确定、处置和塑造的感觉达到顶点时，他们会特别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简言之，此时那种必然性和“意志自由”对他们来说便是一回事。总而言之，心理状态有等级划分，各种问题的等级划分与之相对应；最高等级的问题无情地拒斥每一个这样的人，这些人胆敢过于接近这些问题，但上苍却未赋于他们崇高而强大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敏捷的普通智力，或笨拙而正直的力学以及经验主义者，以其平庸的抱负，奋力接近这样的问题，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这种“最为神圣的地方”（当今有那么多的人作此努力！），这又有什么用处。粗糙的脚千万不要踩这样的地毯——这是事物的基本法则所规定的。大门对这些不速之客仍然紧紧关闭着，虽然他们可以用身体和头猛撞大门！人们必须出身高贵，或更确切地说，必须有这方面的教养：一个人仅仅是凭借其出身而具有从事哲学的权利——此处哲学一词取其较高层次的含义。在这里，祖先，即“血统”，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有许多代人为哲学家的诞生铺平道路；他的每一种道德必须单独获得、培养、遗传和具体表现出来；其中不仅有狂放的、流畅的、细腻的思路和思绪，而且尤其要有肩负重大责任的心理准备，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目光和藐视一切的面容，要有不同于普通大众的义务感和道德感，要充满同情心地保护被误解和被恶言中伤的一切并为其辩护，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要满怀喜悦地实践最高的正义，要掌握发号施令的艺术，要在充足的意志，要有留恋不舍的目光，很少赞美，很少仰视，很少爱

……。



第七章 我们的道德

214

我们的道德？我们很可能仍然拥有道德，虽然它们很自然地不再是那些严肃而庄严的道德。正是因为这些道德，我们敬重我们的祖辈，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后天的欧洲人，20世纪的第一代人——仍将具有我们危险的好奇心，我们各种各样的掩饰技巧，我们在感官和精神上成熟，而表面上甜蜜的残忍——如果必须拥有道德的话，多半只拥有与我们内心感受最深的、最隐秘的倾向相吻合，与我们最强烈的需要相吻合的道德。好吧，那就在我们的迷宫中找一找这样的道德！我们知道，在这种迷宫中，许多东西丢失了，许多东西完全丢失了！还有比寻找自己的道德更滑稽的事吗？这不几乎就是相信自己的道德吗？但这种“相信自己的道德”——实际上不就是过去人们所谓的“问心无愧”吗？这是一种可令人尊敬的思想长辫子，我们的祖辈常将其悬在脑后，也常将其悬在理解力的背后。所以，情况似乎是，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多么不老派，多么不像祖辈那样令人尊敬，可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却在祖辈名副其实的子孙，我们这些问心无愧的、最后的欧洲人，我们



仍然留着他们的辫子。噢！但愿你知道情况会很快，非常快地发生变化！

215

在星空中，有时是两个太阳决定一个行星的轨道，有时是数个色彩不同的太阳，时而用红光，时而用绿光，在一颗行星的周围闪耀，随后又同时把两种光对准这颗行星，使它溢出缤纷的色彩。与此相同，由于我们的“星空”结构复杂，我们现代人也受到各种不同道德的影响；我们的行为交替辉映出各种各样的色彩，很少是意义明确的——在许多场合，我们的行为是杂色的。

216

爱自己的敌人？我认为人们已完全学会了这样做。这种事情在当前大大小小的规模上，千百次地发生着；而且有时会发生更崇高和更高尚的事情：在我们学会了爱的时候，而且恰恰是在爱得最深的时候，鄙视被爱的对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喧哗，没有任何夸示，只有善意的羞愧和遮遮掩掩，不允许傲慢而自负地大谈道德。道德作为态度——是与我们当今的趣味相对立的。这也是一种进步，就像在我们的父辈那里，宗教作为一种态度而最终与趣味相对立，

是一种进步。我们父辈的趣味包括对宗教抱有敌意和伏尔泰式的仇恨（以及所有那些以前属于自由思想家哑剧的东西）。它是我们良心中的音乐和精神中的舞蹈，清教徒的祈祷、道德说教和假道学，都不会与其合拍。

217

有些人非常看重别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圆熟老道，道德辨别力深刻而敏锐。与这些人打交道，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当着我们的面犯过一个错误（哪怕是有关我们的错误），他们决不会饶恕我们——他们出于本能，必须会毁谤和诬蔑我们，即使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保佑健忘者吧：因为他们甚至能“战胜”自己的错误。

218

法国的心理学家——如今其他地方还有心理学家吗？——从未停止过以讥讽态度，从多方面欣赏资产阶级的愚蠢，就好像……总之，他们由此揭露了某些东西。譬如，福楼拜，这位鲁昂的正直市民，最终既未看到、听到，也未品尝到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他的自我折磨方式和高雅的残酷。既然这一话题越来越令人厌倦，我就换个话题说点别的供大家消遣吧——我要说的就是，胖胖的善良而诚实的普通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对



较为高尚的人和这些人要执行的任务，作出机警的反应，这是一种敏锐的、带倒刺的、耶稣会会士的机警，要比鼎盛时期的中产阶级的鉴别力和理解力敏锐千百倍——甚至比其牺牲品的理解力还敏锐。——这再一次证明，“本能”是迄今发现的所有智力中，理解力最强的。总之，你们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规则”与“例外”斗争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们看到的是适于展示上帝和上帝般恶意的场面！或坦率地说，就是对“好人”，对“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对你自己作活体解剖！

219

作出道德上的判断和谴责，是智力低下者对智力较高者最喜爱进行的复仇；也是对其天赋较差的补偿。最后，这是一种获取精神和变得敏感的机会——获取的是一种恶毒的精神。令他们内心高兴的是，到底还是有一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天赋较高的人和天生享有较多特权的人，与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几乎是为因此而需要信仰上帝。正是在他们当中，可以见到最坚定的无神论反对者。假如有谁对他们说：“崇高的精神与纯粹有道德的人的诚实和可敬有天壤之别，”那会使他们勃然大怒；我将设法不说这样的话。我要用我的理论奉承他们，说崇高精神本身只是作为道德品质的最终产品而存在；它是“纯粹有道德的”人身上所有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只有通过长期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或许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获得。崇高精神完全是正义的精神化，是仁慈和纯洁

的精神化，它知道自己被授权维持世界上的等级划分，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甚至在事物之间，维持等级划分。

220

既然人们现在都那么热烈地赞扬“无利害关系的人”，我们就来——或许不无某种危险地——看一看人们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看一看普通人从根本上说在内心深处一般关心什么事情，假如表面的东西不欺骗我们的眼睛的话——这里所谓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学者，或许还有哲学家。令较高层次的天性和较高雅、较挑剔的情趣感兴趣及沉醉的大多数事情，普通人似乎对之绝对“不感兴趣”——假如他还是发觉应该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他便称这种态度为无利害关系的，并奇怪怎么能够“置身事外”。一些哲学家也总是像大众那样，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地表现出这种惊奇（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未体验过这种较高层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率真朴实的、合情合理的事实真相，即“无利害关系的”行为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有利害关系的”行为，只要……“那么爱呢？”爱毕竟是“非利己主义的”吧？——你们这些傻瓜！“那干吗还要赞扬自我牺牲者？”——凡是实际作出牺牲的人都知道，自己想为此而得到某种东西，或许是某种内心的东西；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牺牲，是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或许只是一般地更多，甚至只是感到自己得到的“更多”。可这却是个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领域。较为挑剔的人是不愿意



留在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真理要回答问题时，必须强忍住不打呵欠。毕竟，真理是女人，对其不应使用武力。

221

一道学家对传闲话者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但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人。总之，问题总是他是谁，另一个人又是谁。譬如，在一个命中注定下命令的人身上，自我牺牲和与世无争，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对美德的糟蹋。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每一种无私道德体系，都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是对每一个人有吸引力的，因而这种道德体系不仅对高雅趣味是犯罪，而且还会刺激人们犯下忽略个性的罪，是一种在博爱的掩盖之下对人的另一种勾引——而且偏偏是对各种高级、罕见和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勾引和损害。各种道德体系首先一定要屈从于等级划分；其假设必须作得问心无愧，以至它们最终要彻底明白，说“适合于一个人的也适合于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那个道家 and 好人如是说。他如是劝说道德体系实践道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如果谁想站在嘲笑者一边，那他也许正确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有不当之处。

222

凡是在当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



测得正确的话，没有哪种宗教比这种宗教鼓吹的时间更长了。心理学家都应侧耳静听，透过所有的那些虚荣，透过此种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习以为常的噪音，他会听到一自我蔑视的纯正旋律，沙哑地呻吟着。欧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辉，变得丑陋不堪。一个世纪以来，此种情况有增无减（其首批症状已在加利亚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丰富思想的信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愿自我蔑视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即自负的类人猿，对自己极端不满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受苦，他的虚荣偏偏要他“与其同胞一起受苦”。

223

杂种欧洲人——一般说来，就是不算太丑陋的平民——绝对需要一套服装。他需要把历史当作服装的储藏室。他自然注意到，没有哪套服装合他的身——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让我们看一看十九世纪，该世纪的人们对各种服装样式的喜好变了又变，并且时常因为“没有一套服装适合自己”而感到绝望。无论是把自己打扮成浪漫的，还是古典派的，或基督教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兼具的、“民族的”，一切都是白费，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精神”，却受益于这种绝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过去的和外国的新样品，穿了脱，脱了穿，然后打包收起来，尤其是对其进行了研究——我们的时代是在“服装”方面第一个勤奋好学的时代。



这里所谓服装指的是道德、信条、艺术趣味和宗教，我们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准备好举行盛大的狂欢，准备好发出最富于精神性的节日般欢笑和表现出无比的妄自尊大，准备好干下天大蠢事，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嘲弄世界一番。或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事发明的天地，甚至仍可发挥创造力，很可能是作为世界历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许，虽然目前一切的前途黯淡，但我们的欢笑本身却可能前途一片光明！

224

历史感（即迅速察觉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一个人赖以生活的估价等级体系的能力，也即“察觉本能”，察觉这些估价之间的关系，察觉这些估价之权威与作用力量之权威的关系）——我们欧洲人宣称这种历史感是我们所特有的，是有各阶段和各种族的民主式混合中，使欧洲陷于迷人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之后，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人们才承认这种能力是第六感官。由于这种混和，过去的每一种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过去各种紧密相邻和互相重叠的文化，汇成了我们这些“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目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混乱：如前所述，最终精神会在其中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借助于肉体和欲望的半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暗中进入各个地方，进入高尚时代的人们从未进入过的地方。尤其是可以进入各种不完善的文明的迷宫，进入迄今地球上存在过的各种半野蛮状态。由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处于半野蛮状态，因

而历史感几乎就是对一切的感觉和所有方面的本能，就是对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口才。由此即证明，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卑鄙的感官。譬如，我们再次欣赏一下荷马：最令我们高兴的也许是，我们知道如何欣赏荷马，而很有文化的人（例如十七世纪的法国人，像圣-埃夫雷蒙，他责备荷马精神过于宽广，甚至像该世纪的最后回声伏尔泰）则不能这么容易地欣赏他——他们几乎不准自己欣赏他。他们鉴赏力的非常明确的肯定和否定，他们很容易产生的憎恶，他们对一切陌生事物的犹豫和不愿接受，他们对令人不快的强烈好奇心的极端厌恶，以及一般说来，每种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新的欲望，都不愿承认不满意自己的状况，不愿赞美陌生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甚至不喜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对于这种人来说，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历史感及其屈服于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令人惊异地把西班牙人、摩尔人和撒克逊人的趣味综合在一起，埃斯库罗斯圈子内的古雅典人若见到此种情形，会笑死、气死的。可是我们——却偏偏接受了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对最为精巧之物、最为粗糙之物和最为矫揉造作之物的混合，这种暗自以充满信心和真心诚意的态度所作的混合；我们欣赏这种混合，将其视为专门为我们保留的精美艺术品，尽量不让自己受到那些包围着莎士比亚艺术和趣味的英国大众那令人窒息的烟雾和亲近的干扰，或许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区奇亚扎那样，尽管这里的下水道味刺鼻，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



可我们仍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所有的感官保持着警觉。作为具有“历史感”的人，我们有自己的美德，这是不容争辩的。我们不虚伪，不自利，谦逊，勇敢，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很知道感恩，很有忍耐力，很殷勤——但尽管具有这一切美德，我们可许却不是很“有品味”。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这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最难理解、感受、体会和喜爱的，我们从根本上对之抱有成见，因而几乎对之采取敌对态度的，但是每种文化和艺术的完善和最终的成熟，工作中和人本质上高贵的东西，如大海般的平静和自立自足的时刻，表明一切均已善尽美的金黄色和冰冷。或许，我们历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于，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对照，至少是同很低级的趣味形成对照。我们只能在心中唤起微小而短暂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觉和对人类生活的赞美，宛如它们是零零散散地照耀着我们，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动停在无穷和无限之前的那些时刻和奇妙体验——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仍然颤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阵狂喜时的那些时刻和奇妙体验。成比例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让我们承认：我们实际上渴望的是无限，是浩瀚的无垠。像骑在气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马上的人那样，我们面对无限，放松了手中的缰绳——只有当我们处于最危险的状态时，我们才感到幸福之极。

225

无论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幸福论，所



以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根据快乐和痛苦，即根据伴随情况和次要因素，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因而只是在表面讲得通的思维方式，是天真幼稚的，每个意识到创造力量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瞧不起它，对其表示蔑视，尽管并非没有同情。同情你！——当然，这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同情，不是对社会“疾苦”的同情，不是对“社会”中病人和不幸者的同情，不是对躺在我们周围地上身心有缺陷的人的同情，要不是对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闹革命的奴隶阶级的同情——他们力图夺取权力，并把这称为“自由”。我们的同情是一种较为高尚的、目光较为远大的同情——我们看到了人如何使自己变矮小，其实是你如何使人变矮小！我们有时以无法形容的痛苦心情，看待你的同情，有时抵制你的同情，我们有时认为你的一本正经比任何一种轻浮更加危险。如果可能的话（没有比“如果可能的话”这一说法更为愚蠢的了），你想要消除掉痛苦，那我们呢？实际上我们似乎反而想要增加痛苦，想要使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你所理解的幸福——肯定不是一个目标；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结局；此结局立即使人类显得荒唐可笑和可鄙——同时也就使人类的毁灭合乎需要！痛苦，巨大痛苦的磨练——你难道不知道正是这种磨练带来了人类迄今的全部提升？遇到不幸时心灵的紧张和由此获得的力量，见到残垣断壁时心灵的震颤，经历忍受、解释和利用不幸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和英勇精神，以及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深刻、神秘、假相、精神、诡计或伟大——哪一样不是通过痛苦，不是通过巨大痛苦的磨练获得的？在人身上，被创造物和创造者结成了一体：在人身不仅有物质、破布条、无节制、泥土、淤泥、愚蠢、混乱；而



且还有创造者、雕塑家、铁锤的坚硬、旁观者的神奇和安息日。你懂得这种对比吗？你对“人身上被创造物的同情”，便是同情那些不得被塑造、捣烂、锻冶拉长、烘烤、淬火和精炼的东西，同情那些必然受苦和注定受苦的东西。而我们的同情——你难道不明白我们相反的同情对象是什么吗？既然它抵制你的同情，将你的同情说成是最糟糕的纵容和软弱无力——因而可以说是同情反对同情！但再重复一遍，还有比快乐、痛苦和同情更高级的问题；所有只讨论快乐、痛苦和同情的哲学体系都是天真幼稚的。

226

我们这些不讲道德的人。与我们有关的这个世界，我们身处其中、有恨和有爱的世界，由微妙和命令和微妙的服从组成的这个几乎看不见、听不见的世界，一个在各方面都“几乎”吹毛求疵、暗中使坏、刻薄苛刻、从而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容笨拙的旁观者和常见的好奇心窥探！我们被织进了一义务网和外衣中，无法摆脱义务——正是在这里，我们是“负有义务的人”！固然，我们偶尔可以戴着“镣铐”混在“刀剑”丛中跳舞；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咬牙切齿的，并对不可思议的艰苦命运很不耐烦。但若我们随心所欲，傻子和幽灵便会说：“你们是没有义务感的人”——傻子和幽灵总与我们作对！



227

诚实，姑且承认它是我们，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无法摆脱的美德。好吧，我们便以我们的倔强和爱培育它，不知疲倦地“完善”我们的这种美德，因为只有这种美德能与世长存。愿它有一天像光彩夺目的、嘲弄人的蓝色黄昏那样，以其阴郁暗淡的严肃表情，扫视一下这个上了年纪的文明！然而，如果我们的诚实有一天感到了困乏，叹口气，伸伸四肢，发觉我们太辛苦了，想让诚实像招人喜爱的邪恶那样可爱一点、平易一点、柔和一点，那就让我们这些最近的禁欲者仍然辛苦下去吧，让我们用我们身上仍有的魔鬼般倾向去帮助那一美德吧！我们对粗陋之物和未下定义之物的厌恶，我们竭力禁止一切的意志，我们对冒险的喜爱，我们那敏锐而好挑剔的好奇心，我们那极难捉摸的、被掩盖着的、富于理智的追求权力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意志（此种意志将在未来的所有领域贪婪地游荡）——让我们与我们的所有这些“魔鬼”一起去帮助我们的“上帝”吧！人们很可能会因此而误解和误会我们。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会说：“他们的‘诚实’——那是他们的魔鬼般倾向，决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即使如此，这又有什么关系！即便他们说对，难道迄今所有的神就没有被重新洗礼而命名为魔鬼吗？说到底，我们对自己知道些什么呢？那引导我们想要被命名的精神，我们对其又知道些什么？（这只不过是个名称问题）我们内心到底有多少种精神？让我们这些自由精神谨防我们的诚实变为我们



的虚荣、我们的装饰和夸示、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愚蠢！每一种美德都很容易变为愚蠢，每一种愚蠢都很容易变为美德，“愚蠢到神圣的程度”。他们用俄语说——让我们谨防因为我们过于诚实而变为圣人和招人讨厌的人！生活对我们来说不是已短了一百倍，太短暂而不能再使我们自己厌烦了吗？我们不得不相信永生，以便……。

228

我希望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我发现，迄今为止的一切道德哲学都是单调乏味的，都属于催眠器具。在我看来，“美德”更多地是被其鼓吹者的单调乏味，而不是被任何其他东西损害了；但与此同时，我不想忽视它们的一般有用性。最好是思考道德的人尽可能地少，因为最好是道德老是不会令人感兴趣！但我们不要害怕！目前的情况仍然和以前一样。欧洲没有人认为（或暴露出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用危险的、强词夺理的、诱人上圈套的方式，对道德作理论探究——没有人认为这种探究会带来灾难。譬如，看一看不知疲倦的、不可避免的英国功利主义者吧。他们是多么沉重而令人尊敬地步边沁的后尘，大踏步前进（荷马式的隐喻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意思），正像边沁曾步爱尔维修 的后尘那样！（不，用加利亚尼^②的话来说，爱尔维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
加利亚尼（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译者



修这个冷漠的上议员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没有新的思想,也未用较优雅一点的词语表达旧的思想,甚至未把前人发表的看法做适当的汇编。总而言之,是一种叫人无法忍受的文献,除非人们知道如何使它带有恶作剧的味道。实际上,英国人由来已久的恶习,即所谓言不由衷,也即道德上的虚伪,已经暗暗钻入了这些道德家的身子(若要读懂他们,读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动机)。这回是隐藏在科学精神这一新的形式之下;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秘密地与良心作斗争,在用科学精神拙劣地修补道德时,以前的清教徒们自然要忍受良心的极度痛苦。(道德家不正是清教徒的反面吗?也就是说,道德家不正是思想家吗?思想家则把道德看做成问题的,值得加以考问的。总之,把道德看做是个问题。道德化不正是——不道德吗?)最后,他们都希望英国的道德被世人承认具有权威性,因为人类,或“一般效用”,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不!是英国的幸福,由此得到最大的改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相信,努力追求英国式的幸福(我指的是追求舒适和时髦,其最高级形式便是议员席位),就是踏上了享有美德的正道。实际上,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相信,如果说世上迄今为止有美德的话,那么美德便存在于这种努力之中。这些受到良心驱使的、心情沉重的群居动物(它们竭力鼓吹利己主义事业有助于增进一般福利),没有一个知道哪怕一丁点以下事实,即“一般福利”,决不是人们所能理解的理想、目标或观念,而只是一种骗人的万应灵药。对某个人公平的事,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是不公平。一种道德对所有人的要求,实际上会损害高等人。一句话,人与人之间因而道德与道德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些信奉功



利主义的英国人是一种谦逊的、从根本上说平庸的人，因而如前所述，就他们是令人生厌而言，人们对他们的用处不可能有很高的评价。人们甚至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以下诗句鼓励他们——

为汝等名人欢呼吧，推着独轮车旋转，
“愈长久——愈好”，从而显示出，
脑袋和膝盖更加僵硬；
没有欢笑，从不开玩笑，
永远平庸，
决无天资，亦没有机智！

229

在近来这些以人道引以自豪的时代，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恐惧，存在着大量对恐惧的迷信，存在着对“残忍的野兽”的大量恐惧。抑制这种恐惧，便是这些较为人道的时代的自豪所在——以致连明显的事实，似乎也争得了几个世纪的同意。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人提及，因为提及这些事实，似乎会帮助已被杀死的野兽起死回生。我听凭这样的事实逃走，或许在拿某种东西冒险；那就让其他人再捉住它，给它喝大量“虔诚感情的牛奶”^①，使它在以前的角落安静地躺下来，被人遗忘掉。人们应重新了解残忍，睁开自己的眼睛；我们最终应学会不耐烦，

席勒《威廉·退尔》第4幕第3场中的说法。



以使一些厚颜无耻的严重错误——例如古代和现代哲学家，使人们对悲剧产生错误的看法——不再能趾高气扬地到处游荡。我们称之为“高等文化”的每一样东西，其基础都是对残忍的精神化和强化——这就是我的论点。“野兽”根本没有被杀死，它还活着，还在健壮在成长，只不过被改变了外形。构成悲剧痛苦的欢乐的东西，就是残忍。在所谓悲剧式同情中欣然起作用的东西，在每一崇高之物，甚至是形而上学最为崇高和最为细腻的震颤中，欣然起作用的东西，只是从搀和在一起的残忍成分中才获得了其甜蜜的感觉。古罗马人在竞技场中所享受到的，基督教徒在对十字架的迷恋中所享受到的，西班牙人见到的柴捆和火刑柱时或观看斗牛时所享受到的，当今自愿受苦受难的日本人，向往流血革命的巴黎郊区工人，耐着性子看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演出的瓦格纳音乐的爱好者——所有这些人所享受到的，是女巫喀尔克的“残忍”这副灵丹妙药。当然，我们在此处必须完全抛弃以往大错特错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教导人们，残忍只是产生于见到其他人受苦，其实，从自己遭受的痛苦中，从致使自己遭受痛苦中，也会获得极大的享受。只要人们心甘情愿地进行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否定，像腓尼基人和禁欲主义者那样进行自我残伤，或者一般地禁绝酒色，禁欲和追悔，只要人们像清教徒那样一阵阵地悔罪，剖析良心和像帕斯卡尔那样献祭理智，人们在内心中就受到了残忍的引诱和逼迫，一种危险的自己对自己的残忍。最后，甚至可以说，追求知识的人也是残忍大师和残忍的崇拜者，因为他迫使自己违背自己的意向，常常是违背自己内心的希望：想予以肯定，表示喜欢和爱慕时，却不得不说“不”；的确，每当人们想从本



质上深刻理解某一事物时，便是对精神的根本意志的违背，便会对它造成有意的伤害，因为精神出于本能瞄准的是肤浅的外表和表面的事物，——甚至追求知识的每一渴求，都有些残忍。

230

或许若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人们便不会理解我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的根本意志”；那就让我作一点解释吧。那个通常被称作“精神”的专横傲慢的东西想要在内部和外部都成为主人，想要感觉到自己是主人；它有一追求简化的多样化意志，是一有约束力的、有驯服力的、专横傲慢的、实质上力图统治一切的意志。在这里，其需要和机能，与生理学家认为一切活着、成长和繁殖的东西所具有的需要和机能一样。精神占用异体成分的能力，表现在将新事物同化于旧事物、简化复杂事物、视而不见或否认绝对矛盾的事物这样一种强烈倾向中。同样，它还随意重新强调、突出和伪造异体成分中，“外部世界”各部分中的各个特征和各个方面。因此，其目的便是把新“经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纳入旧的排列中。总之，就是成长；或者较为严格地说，其目的是感觉到成长，感觉到能力的增强。这种意志还有一种显然相反的精神上的冲动可供利用，一种突然对无知，对关上门、关上窗子的偏爱，一种内心对这、对那的否定，一种对接近的禁止，一种对许多可认识的事物的戒备态度，一种对默默无闻，对离群索居的满足，一种对无知的接受和赞

同。若采用比喻的说法，就是其占有能力、“消化能力”所能承受的一切（实际上，“精神”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类似于胃）。在这方面，精神还有一偶尔表现出来的习性，那就是听凭自己受骗（或许会淘气地觉得事情不是这样，但却听凭被看做这样），喜欢不确定和模糊不清，极为喜爱随心所欲的、异乎寻常的狭隘，喜爱离自己特别近的东西，喜爱特别显眼的东西，喜爱被放大的、被缩小的、畸形的、被美化的东西。总之，喜爱强力的所有这些随心所欲的表现形式。最后，在这方面，精神还肆无忌惮地欺骗其他精神，在其他精神面前掩藏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对创造力、塑造力和变化力的不断挤压和滥用。精神由此而欣赏其诡计多端和多种多样的伪装，还欣赏由此而获得的安全感。正是依靠其多变的手法，精神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隐藏！与这种喜欢表面事物，即喜欢简化，喜欢伪装，喜欢覆盖物，喜欢外表——因为每一外表都是覆盖物——的倾向相反，还有知识分子的一崇高倾向在起作用，就是坚持深刻地、多方面地、透彻地看待事物；这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良心和趣味的一种残忍，每一英勇无畏的思想者都会承认自己身上有这种残忍，只要他已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使自己的眼睛变得敏锐而冷酷无情，足以进行反思，并已习惯于严厉的惩罚和尖刻的词语。他会说：“我的精神倾向中有某种残忍的东西。”以此谨让道德高尚者与和蔼可亲者尽力劝说他相信，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如果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我们这些很自由的精神所谈论的、低声议论的和赞美的，不是我们的残忍，而或许是我们的“过分诚实”，那听起来会好听一些——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死后荣誉！与此同时，因为到那时还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们决不应该用这种辞藻华丽的、天花乱坠的道德废话包装自己；我们以前的全部行为已使我们厌恶这种趣味和这种趣味的泛滥。它们是些漂亮的、闪光的、铿锵有力的、喜庆的字眼，例如：诚实、热爱真理、热爱智慧、为知识献身、诚实者的大无畏精神。在这些字眼中有某种东西使人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但我们这些隐士和土拨鼠，很久以前在我们良知的深处便已深信，辞藻的这种值得尊敬的炫耀，也属于人类潜意识中虚荣的陈旧而虚假的装饰、便宜而俗艳的服装和金粉，并深信即使在这种讨人喜欢的颜色和重新涂的油漆之下，也必能再次辨认出自然之人。总之，把人还原为自然状态；明了迄今乱涂乱画在自然之人这一永恒的观念之上，有许多徒劳而不真实的解释和次要意义；使人从今以后站立在人的面前，就好像他受过科学训练后变得冷酷，而站立在其他形式的自然面前那样，两眼像俄狄浦斯那样无所畏惧，双耳像尤利西斯那样紧紧塞住，对旧形而上学的捕鸟者发出的引诱声充耳不闻，这些捕鸟者已在太长的时间内向他发出哨声：“你拥有的更多！你的地位更高 你的出身不同！”——这可能是一项古怪而愚蠢的任务，但谁又能否认这是一项任务！我们为何情愿从事这项任务？或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干嘛非得了解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向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一再受到追问，我们也千百遍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未曾找到，也无法找到较好的答案……。

231

学识会改变我们，其功用正像不仅仅起“保存”作用的营养那样——生理学家明了这一点。但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完全“在下面”，确有某种顽冥的东西，某种坚如磐石的精神上的命运，对预先确定和选定的问题预先给出的判定和回答。对于每一基本问题，说出的都是这样一句不可改变的话：“我就是如此。”譬如，思想者无法重新了解男人和女人，而只能更全面地了解男人和女人。他内心最终所能了解的只是关于他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偶尔发现问题的某些答案会成为我们的坚强信念；或许它们此后便被称作“信仰”。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在这些信仰中便只能看到自知之明的足迹，只能看到标示出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路标。或更正确地说，只能看到我们所包含的巨大愚蠢，我们在精神上的命运，在我们身上的，完全“在下面”的顽冥之物。在对我自己作了这番慷慨的恭维之后，我或许能说一些有关“当今妇女”的实话，只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我说的绝对是实话。

232

女人希望独立；于是就开始向男人说明有关“当今妇女”的事情——这是全面丑化欧洲的最严重的事态之一。这种带有



女人气的科学性、想要自我暴露的笨拙尝试，究竟要展现什么东西给人们啊！女人有太多的理由感到羞耻；女人暗中是那么爱卖弄学问，那么浅薄，那么爱摆小学校长的架子，那么气量狭小而又自以为是，那么放纵和轻率。只要仔细看——女人对孩子的言行，便会了然！实际上，这一切迄今只是由于惧怕男人才得到了最好的抑制和控制。假如听凭“女人身上永远令人生厌的东西”——简直太多了——肆意而为，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假如她开始从根本上和原则上丢掉她那些显示魅力、玩耍嬉戏、驱走忧愁、减轻痛苦和从容不迫的智慧及艺术，假如她忘记了自己渴望得到好东西的细腻天性，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女人的嗓音已被提高，经由圣·阿里斯托芬之手！有人感到害怕的是，女人极其明确地以威胁语调说出了女人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女人因此声称自己是科学的，这难道不是最俗气的吗？迄今为止，幸好启蒙一直是男人的事情，男人的天赋——因而我们仍然“在自己人之间”；最后，看一下女人所写有关于女人的全部东西，我们很可能会十分怀疑女人是否真的想要了解自己，是否能够了解自己。如果女人不是想由此为自己得到一新的装饰物——我认为装饰打扮永远属于女性——那么她为何想使人们怕她？或许她想由此获得控制权。但女人不想了解事情真相——女人关心事情真相有何用？从一开始，事情真相就最令人感到陌生，最令女人反感，也对女人最富有敌意。女人了不起的本领是造假，关心的主要是外表和漂亮。让我们承认，我们男人尊重和喜爱的正是女人的这种本领和本能。我们任务艰巨，为调剂身心，喜欢寻找这样的人为伴，在她们身边，在她们的扫视之下，与她们纤巧的愚蠢相对照，我们的严

肃认真、我们的一本正经、我们的博大精深也几乎像是一种愚蠢。最后，我要问的是：女人是否认为女人的思想深刻，或是否认为女人心中有一杆公平秤？迄今最瞧不起女人的是女人自己，而根本不是我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男人所希望的是，女人不要为了再教育男人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了；教会发布命令说：女人莫谈神学——这正是男人对女人的关心和照顾。拿破仑曾告诫极为高雅的斯塔夫人：女人莫谈政治！这也是对女人好。在我看来，谁要是对于当今的女人大声疾呼：女人莫谈女人！那他便是女人的真正朋友。

233

当女人提及罗兰夫人^②、斯塔夫人或者乔治·桑^③，似乎由此证明了有利于“当今妇女”的什么东西时，其实是暴露了本能的堕落——以及趣味的低级。在男人看来，这三个女人是滑稽可笑的——仅此而已！——恰好是不利于妇女解放和自主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最好反证。

斯塔夫人（1766—1817），一译“史达尔夫人”，法国女作家，文艺评论家。其沙龙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拿破仑的中心。——译者

②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她的家成为吉伦特派成员的活动中心。——译者

③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译者



234

厨房中的愚蠢就是女人做饭、烧菜和操持家务，全然不动脑子！女人不理解食物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味地做饭烧菜！假如女人是能思考的动物，那她在做了几千年的饭之后，肯定已发现了生理学上最重要的事实，也掌握了医术！由于女人做的饭很糟糕——由于厨房中完全没有理性——人类的发展已在极其长的时期受到阻碍，受到最严重的干扰：甚至在今天事情也几乎未见好转。——说给中学女生听的一席话。

235

有些胡思乱想和异想天开的想法，有些句子或就那么几个词儿，可一下子把整个文化，整个社会浓缩进去了。德·兰伯特夫人随便对儿子说的一句话就属于此类：“亲爱的，你向来只知道做蠢事，做蠢事使你特别快活。”——顺便说说，这是古往今来对儿子所说的最富于母性、最富于智慧的话。

236

毫无疑问，每个高贵的女人都会反对但丁和歌德对于女人



所抱的信念——前者这样唱道：“ella guardava suso, ed io in lei”^①，后者把它解释为“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因为女人恰恰把这一点寄托在永恒的男性身上。

237

关于女人的七则格言

有个男人向我们匍匐而来，
漫长的无聊时间便会逃走！
唉！上年纪和学问，
为柔弱的美德赋予了力量。
灰黑色衣服和沉默不语，
使每个女人显得——庄重。
我在幸福时要感谢谁？
上帝！——和我那不错的女裁缝！
年轻时，饰满鲜花的洞穴；
年老时，一条龙从中爬出。
高贵的称号，漂亮的腿，
还有男人：哦，但愿我是他。
言简意赅——
对母驴是光滑的冰！

^① 意大利语，引自但丁《神曲·天堂篇》，意为：她望着上天，我望着她。



237A

女人迄今一直被男人像鸟儿那样看待，是从高处降落到他们中间、迷了路的鸟儿。女人被视为柔弱的、脆弱的、未经驯化的、陌生的、可爱的和活泼的东西——可又被视为必须关起来的東西，免得她飞走。

238

在“男人和女人”这一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认男人和女人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必要存在永远敌对的紧张状态，梦想着男人和女人或许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受同等的教育，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思想浅薄的典型标志。一思想者若在这一危险的方面显得浅薄——简直是本能上的浅薄！那他便可以被认为是可疑的，岂只是可疑的，而且是被出卖的和被泄露的；他很可能就会在所有根本的人生问题上太“浅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人生问题，就无法具有任何深度。另一方面，一个人若在精神和欲望方面具有深度，且在慈悲方面具有深度，能严肃和严厉起来，能既仁慈又严厉，则他就只能像东方人那样看女人。他肯定会把女人想像为一种所有物，一种可关在屋子里的财产，命中注定必须干家务，履行自己的天职。他肯定会像以前希腊人所做的那样，在这一问

题上根据亚洲的绝妙理性，根据亚洲的优越本能来采取自己的立场。亚洲的那些最优异的继承者和学者——众所周知，随着其文化和强力的增加，从荷马到伯里克利时代，逐渐变得对女人越来越严厉，总之，变得越来越具有东方特点。让我们好好想一想，这是多么必要，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合乎人性啊！

239

女性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民主时代的趋向和基本趣味，恰似不尊敬女性属于旧时代那样——于是立即滥用这种尊敬，又有什么奇怪？她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她学会了提出要求，对她的满腔同情和尊敬终于令人感到不那么舒服；她喜欢为得到权利而竞争，其实是喜欢争斗本身：一句话，女人正在失去贤淑和端庄。她正在抛弃对男人的恐惧。但“抛弃恐惧”的女人会牺牲掉自己最具女人特点的本性。一旦不再需要也不能充分发展男人身上的那种令人惧怕的品质——或更明白地说，男人身上的那种男子汉气概——女人便会得寸进尺，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叫人不那么好理解的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促使女人堕落。这正是当今的情况。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自欺欺人了吧！哪里的勤劳精神战胜了尚武精神和贵族精神，哪里的女人便会争取获得小职员那样的经济和法律上的独立。在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入口处，镌刻着这样几个大字：“作为女职员的妇女”。虽然她由此盗用了新的权利，渴望成为“主人”，并把妇女“进步”镌



刻在了她的旗帜上，但显而易见，结果却正好相反：女人退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妇女的影响力随着其权利的增加，反而下降了；因此，“妇女解放”只要是妇女自己所希望 and 要求的（而不仅仅是浅薄的男性所希望 and 要求的），到头来便会是最具女人特征的本性不断削弱和消亡的明显征兆。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一种愚蠢，一种几乎是男性的愚蠢，对此，有教养的女人——此种女人总是很聪明的——会深感羞耻。在自己最有把握取胜的领域丧失直觉；不注意练习运用适合于自己的武器；在男人面前，甚至“在书本面前”忘乎所以（而以前她在这两者面前则表现出节制和温文尔雅的谦恭态度）；大胆而放肆地消除男人对蒙着面纱的、具有根本不同理想的女性所抱有的信念，某种永恒而必要的并具有女人味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劝说男人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要看护、照顾、保护和纵容女人，似乎女人是某种娇弱的、极难接近的、又常常很招人喜爱的家畜；劝说男人放弃一切不得体的、令人气愤的、带有奴役和束缚味道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是妇女在迄今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曾经招致的和仍然招致的（似乎奴隶制是每一种高级文化和文化的每一次升级的反证，而不是其条件）：这一切不是预示着女性本能的瓦解，即非女性化，又预示着什么呢？的确，在有学问的男性蠢驴当中，有不少女人的蠢朋友和腐蚀者，他们劝说女人按上述方式实行非女性化，仿效欧洲“男人”，以及欧洲“男子汉气概”遭受的所有那些愚蠢。他们想要把女人降低至“一般文化”的水平，甚至想让妇女只知道看报和插手政治。他们在各处甚至想使女人成为自由精神和文艺工作者。似乎不虔诚的女人并不会使思想深邃的、不信神的男人感到十

分可恶和可笑；几乎在各地，女人的神经都正在被那种最为病态和最为危险的音乐（即最新的德国音乐）所摧毁，她一天一天地愈来愈歇斯底里，愈来愈无法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即生育强壮孩子的职责。他们想在更多的方面“培养”女人，正如他们所说，是利用文化使“女性”强健起来。似乎历史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培养”人类和人类的衰弱——也就是说，人类意志力的衰弱、减弱和消失——总是齐头并进，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和影响最大的女人（最近的一位便是拿破仑的母亲），要感谢的正是其意志力——而不是其中小学老师——使她们获得了力量和超越了男人。使人尊敬女人以及常常害怕女人的，是她的天性（女人的天性要比男人的天性更加“自然”），她的纯真的、食肉动物般的狡猾与灵巧，她的手套下面的老虎爪子，她的天真幼稚的利己主义，她的桀骜不驯和内心的放荡、她的叫人不可理解的、范围广泛的、偏离常规的欲望和美德……。人们尽管害怕但却同情“女人”这只危险而漂亮的猫，原因是，女人似乎比任何其他动物遭受的痛苦更多，更加脆弱，更加需要爱，更加注定要感到幻想的破灭。恐惧与同情：迄今为止，男人正是带着这些感情站在女人的面前，总是一只脚已陷入了悲剧，这种悲剧在给人乐趣的同时也叫人撕心裂肺。不是吗？一切不是都行将结束吗？女人不是正在摆脱幻想吗？女人不是正慢慢地愈来愈招人厌烦吗？欧洲啊！欧洲！我们知道总是有脚的动物对你最有吸引力，这种动物又在威胁着你！你那古老的寓言会再次成为“历史”。一种巨大的愚蠢会再次制服你并把你带走！上帝并没有隐藏在它的下面——绝对没有！只有一种“思想”，一种“现代思想”！……





第八章 民族与国家

240

我破天荒又听了一遍理查德·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这是一部恢宏的、华丽的、冗长的当代艺术作品，它自豪地假设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因而人们能够理解这部作品。令德国人感到光荣的是，这一假设没有落空！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中混杂有各种风格和力量，各种季节和气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会儿是古代气息，一会儿是异国情调，叫人难以接受，过于现代派，既传统得自命不凡，又狂放不羁，不时显得调皮捣蛋，更多的时候却是粗糙而刺耳——有火一般的热情和勇气，同时也有成熟得过晚的水果的暗茶色皱皮。它忽而广阔汹涌地奔流，一下子又踌躇徘徊片刻，宛如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敞开一个缺口，沉闷得几乎迫使我们作一场恶梦；但它已再次扩展和拓宽古老的欢快之流，并扩展和拓宽了新老幸福之流。其中特别包括这位艺术家毫不掩饰地对自己感到的快慰，他欣喜而惊异地觉察到自己精通作品中运用的各种应急手法，这些都是些新的、新学会的、未得到全面检验的艺术上的应急手法，但他却清晰地展示给我们。然而从各方面来说，



却毫不优美，毫无南方风格，绝无南方万里无云的清澈天空，毫无优雅可言，没有舞曲，也几乎没有追求逻辑的意志；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并有意加以突出，似乎这位艺术家想要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意图。”它像是一沉重的装饰物，某种过于粗俗而死板的东西，大肆炫耀高深的、老古董般的、别出心裁的比喻和俏皮话；像是某种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国式东西，某种德国风格的东西，由许多部分组成，杂乱无章，不可穷尽；像是德意志灵魂的某种扩充和膨胀，不怕将自己隐藏在极端的堕落和颓废之下——或许惟其如此，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像是德意志灵魂的真正名副其实的象征，既年轻又年老，太成熟，可还是太富于发展潜力。这种音乐表现了我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属于前天和后天——他们尚没有今天。

241

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也会一连几小时沉酒于强烈的爱国主义，陷入古老的恋情和狭隘的观点——我刚刚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连几小时充满民族激情，充满爱国痛苦，充满其他各种汹涌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时间，另一些人则要花半辈子时间，这要看他们消化和“改变材料”的速度和力度。实际上，我可以想像一些懒惰的、优柔寡断的种族，他们甚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欧洲，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克服爱国主义和乡土情感的返祖性发作，才能再次返回理性状态，也就是说，返回“善良的欧洲主义”。我在脱离主题思



考这些事情时，碰巧亲耳听到了两位老爱国主义者的对话——他们的听力显然都不大好，因而说话声音较大。一个说：“他对哲学的了解跟农民或新兵一般多，很无知。可如今这有什么关系！目前是大众时代，大众匍匐在一切规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家给大众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众把极端庞大的帝国和极端巨大的权力称作“伟大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较为谨慎和保守的人，不放弃古老的信念，仍然认为只是伟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动或事情伟大，这又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激烈的政治活动”，人民则天生没有搞政治的天赋，因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弃爱，趋向于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强使其人民“从事政治活动”，而人民在此之前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去思考，从内心深处厌恶政治性国家的动荡、空虚和争吵不休。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激发其人民的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耻辱，使他们对自己的洋腔洋调和隐藏在内心永恒的东西感到讨厌，想要贬低他们的最基本的脾性，搅乱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思想狭隘，趣味“民族化”——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干这些勾当，其人民要在未来的全部日子里为此而悔过（如果他们有未来的话）这样一个政治家会是伟大的吗？当然了！”另一位老爱国者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想做这种事也许是发疯了！但一切伟大的事情开头也许都是这么发疯！”真是滥用词语！”另一位大声反驳道：“是强大！强大！强大而疯狂！而不是伟大！”两位老人显然激动起来，互不相让地喊叫着自己的“真理”；但我却在一旁感到很悻



意，思量着较为强大的一方会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着一个民族在智力上的浅薄会得到补偿——即，另一个民族会变得深刻。

242

不管我们是将其称为“文明”、“人性化”还是“进步”（欧洲人现在正是以此闻名于世），也不管我们是否只褒不贬地用政治套语，将其称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总之，在所有由这类套语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后，一庞大的生理过程正在展开，且在日益扩大，这就是欧洲人的同化过程；他们正日益脱离各统一种族在气候和遗传上由以产生的那些条件；他们正日益摆脱许多世纪以来铭刻在身心的环境限制；也就是说，正在缓慢地出现一种从本质上说是超民族的游牧性人。从生理上说，这种人的特征是，拥有最大的适应本领和能力。欧洲人的这种演化过程，其速度会由于旧病的严重复杂而受到阻碍，但其强度和深度却或许会因此而增强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风暴和重压，还有方兴未艾的无政府主义，都与其有关。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其天真的宣传者和赞颂者，即“现代思想”的倡导者所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条件——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劳的、可充当不同角色的、聪明的群居人——极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特殊人物，这些人具有最为危险的媚人品质。因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每隔一代人，甚至每

隔十年便开始一项新的工作，从而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那种类型的人；虽然这种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说会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巧的工人，他们像需要每天的面包那样，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因而虽然欧洲的民主化会有助于产生一种准备接受奴役（取其最微妙的意思）的人，但是在一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下，强者会比以往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要归因与他所受的无偏见的教育，归因于他诡谲多变的手法、办法和伪装。我的意思是，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培养暴君的环境——我取暴君这个词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其最超自然的意思。

243

我欣喜地听说，我们的太阳正快速向武仙星座移动，但愿地球上的人们仿效太阳。首先是我們，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

244

有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于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有深度；但既然现在最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得到完全不同的荣誉，并或许已体验不到有深度的“妙处”，因而眼下采取下述观点，就是适时的和爱国的，即：我们曾自我欺骗，自我表扬。总之，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本质上是种异样的、不对头的东西——某种



谢天谢地，我们即将成功地摆脱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试着重新了解德国人的深度；为此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聚集拼凑成的，而不是实际建造成的——其起源造成了这一结果。如果一个德国人冒昧地宣称：“哎呀，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国人的灵魂远不只是两个。作为由许多种族混合掺杂而成的民族（甚或主要成分是雅利安人之前的种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欧民族”，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加不可捉摸，更加充实，更加自相矛盾，更加未被人认识，更加不可预料，更加令人惊讶，更加可怕。他们是无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单单这一点就令法国人望尘莫及。德国人的一个特点是，“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从未消失。科策布^①确实非常了解德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他喊到，“我们是大家所熟知的”；桑^②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让·保尔^③知道自己在宣称对费希特的虚伪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恭维和夸大感到愤慨时在做什么。但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却很可能不同于让·保尔，尽管他承认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对的。问题是，歌德究竟怎么看德国人？可是歌德对周围的许多事情从未明确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很狡猾，整个一生都知道如何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他这样做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使他感到高兴的既不是“独立战争”，也不是法国

① 科策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译者

② 桑（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以笔名乔治·桑闻世。——译者

③ 让·保尔（1763—1825），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译者

④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译者

大革命，促使他重构“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个问题的事件，是拿破仑的出现。他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谴责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来自于外国：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国人的气质界定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他是不是搞错了？德国人的特点是，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有走廊和游廊，其中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虽然杂乱无章，但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魅力无穷；德国人非常熟悉通向混乱的小径。正如一切事物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朦胧的、演进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湿的、隐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确定的、未充分发育的、自我置换的、成长中的东西，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不存在，他正在变化，正在“发展”。所以，“发展”实质上是德国人的发明，在哲学惯用词语的广大范围内，击中了一主导思想，该思想连同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正努力使整个欧洲德意志化。外国人对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展现出来的谜，感到惊讶并为其所吸引（黑格尔将这些谜予以体系化，理查德·瓦格纳则最终将它们谱成了曲）。“性情温和而怀有恶意”——这样一种并列在每个其他民族那里是荒唐的，但不幸的是，在德国却常常是正当的：只要在斯瓦比亚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体验到这一点！德国学者木讷而不善交际，可使人惊奇的是，身体却异常灵活，胆子特别大，善于走钢丝，连诸神都不敢睁眼看。谁若想亲眼看一看德国人的灵魂，那就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国人的艺术和举止好了——粗俗得哪里谈得上“趣味”！最高贵的和最俗气的竟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整个构造是多么杂乱，多么丰富！德国人拖拽着自己的



灵魂，拖拽着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极差，从未“摆脱”它们；德国人内心深处进行着的是一种艰难而犹豫不决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欢方便的东西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诚实”；坦率和诚实来得多方便！德国人的诚实，这种袒露心迹，这种自满自得，这种亮底牌，很可能是德国人当今所作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成功的伪装，也正是他玩弄的靡菲斯特手法；运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许多”！德国人自由放纵，因而用忠实而茫然的蓝眼睛注视着一切——其他国家便立即把他与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听凭“德国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样吧——我们或许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随便嘲笑它！今后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对它的外貌和好名声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将我们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声誉，太廉价地换成普鲁士的“精明”，换成柏林的风趣和坚毅。一个民族还是做作一点好，就让人们认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诚实、傻气好了；这样做或许反而是深刻的！最后，我们应对我们的名声表示敬意——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作“虚伪的民族”……。

245

“古老的美好”时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这样唱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乐仍然对我们具有吸引力，他那“与人们相投的志趣”，他那细腻的热情，他那孩子般对中文及其华丽辞藻的喜爱，他的谦恭有礼，他那对典雅、多情、轻快、



伤心落泪的渴望，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唤着留在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哦，这一切迟早将结束！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的理解和喜爱，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只不过是风格断裂和过渡的最后回声，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伟大鉴赏力的最后回声。贝多芬是一经常出毛病的古老灵魂和—不断生长且过于年轻的未来灵魂之间的中间事件；他的音乐映照永恒失去和永恒希望的曙光，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曙光之中而与卢梭一起做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舞，最后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险些跌倒。但这种思想感情已多么快地变得那么苍白，如今理解这种思想感情是多么困难。卢梭、席勒、雪莱和拜伦的语言，我们听起来是多么陌生，只有在他们的共同胸中，欧洲的命运才能说出话，才知道如何用贝多芬的曲调歌唱！无论德国音乐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都属于浪漫主义，也就是属于这样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历史上看，要比那一伟大的插曲，即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的过渡，更加短促、更加短暂、更加肤浅，同时也属于蓬勃兴起的民主精神。韦伯——如今我们多么为《自由射手》和《奥伯龙》担心！多么为马施内的《汉斯·海灵》和《吸血鬼》担心！甚至多么为瓦格纳的《汤豪舍》担心，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而且，整个浪漫主义音乐不够高贵，音乐味不够浓，只能在剧场中和大众面前维持其地位；从一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是二流音乐，真正的音乐家不把它放在眼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位性情平和的大师，以其较轻盈的、较纯洁的、较愉快的灵魂，很快就赢得了赞誉，也同样快地被人遗忘了，成了德国音乐的一段美丽插曲。但罗伯特·舒曼却认真对待



事物，因而从一开始也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创立流派的最后一个人，——现在舒曼的浪漫主义流派已被超越，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吗？舒曼遁入了其灵魂的“撒克逊式瑞士”，性格一半像维持，一半像让·保尔（肯定不像贝多芬！肯定不像拜伦！）。他的《曼弗雷德》歌剧音乐是个错误，是个误解，冤枉了拜伦；舒曼的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说，是一种危险的——在德国人当中则是加倍地危险——喜欢温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倾向）。他总是离群索居，胆怯地后撤和退缩，是个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溺于千篇一律的欢乐和忧伤，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女人气，有点高傲自傲。这样一种舒曼早已仅仅是音乐上的一德国事件，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样，是一欧洲事件；在舒曼那里，德国音乐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不再是欧洲灵魂的代言人，而沦为纯粹的民族事务。

246

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读者来说，阅读用德文写出的书真是一种折磨！他站在缓慢旋转的声音沼泽地旁，是多么气愤，在没有旋律、没有节拍、没有舞曲的情况下，德国人竟称其为“书”！竟还是读书的德国人！他读得多么懒散，多么勉强，多么差劲！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并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每一好的句子中都有艺术——若要理解每一好的句子，就必须觉察这种艺术！例如，若误解了其速度，便会误解句子本身！人们

不应对决定韵律的音节犹豫不决，应感觉到打破过于严格的对称是有意的，是一种魅力，应耐心地仔细听每一不连贯之处和自由速度之处，应觉察出元音和复合元音之间顺序的意义，应觉察出其排列顺序可多么微妙地、多么丰富地给它们增添色彩和再增添色彩——读书的德国人当中，有谁会殷勤地承认这种义务和要求，有谁会殷勤地非常仔细地倾听语言中的艺术和意愿？毕竟，人们“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人们没有听到风格上极为明显的对比，最为细腻的艺术技巧浪费在了聋子身上。以上便是我看到人们极其笨拙而并非出于直觉地把两位散文大师混淆在一起时的感想。一位大师的词语迟疑不决，冷冰冰的，似乎是从潮湿洞穴的顶上落下来。他希望它们发出沉闷响声和回声；另一位大师则像灵巧地舞剑那样挥洒语言，从手臂到脚趾上下翻飞，嗖嗖作响，寒光冽冽。

247

德文文体与和谐悦耳的声音和耳朵毫不相干，我们的优秀音乐家文章写得很差，便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人不大声读书，不为耳朵读书，而只是使用眼睛；他已暂时把耳朵收在了抽屉中。在古代，一个人读书时——这种情况很少见——是为自己读某种东西，而且高声朗读；若某个人不出声地读书，他们会感到惊奇，会尽力悄悄地弄清其原因。所谓高声朗读，就是运用声音的逐渐增强、转调、声调变化和速度的改变，古人乐此不疲。那时，书面语规则和口语规则是一致的；这些规则部分



取决于耳朵和喉咙的发展和细微要求；部分取决于古人的肺活量。在古代，句号首先代表一生理上的总体，代表一口气说出的东西。狄摩西尼和西塞罗的文章中出现的句号，包括声音升高两次和声音降低两次，都在一口气中完成，古人感到其中乐趣无穷，他们通过学校教育知道如何欣赏其中的功效，知道使用这种句号的人多么稀少，使用这种句号多么艰难。我们实际上无权使用这种大句号，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从每一种意义上说都气短！其实，这些古人都是演说的爱好者，因而都是行家，都是批评家——于是他们使演说家的技巧达到了顶点。与此相同，在上个世纪，由于意大利的所有贵妇人和绅士都知道如何唱歌，因而对歌曲的鉴赏（连同歌唱艺术）达到了巅峰。然而在德国（直到最近才有一种讲台雄辩术开始羞怯而笨拙地扑打其稚嫩的翅膀），严格说来，只有一种接近于艺术性的公开演讲——即布道坛上的讲道。在德国，只有牧师知道音节或词语的重量，知道句子如何撞击、弹跳、奔突、流淌和结束；只有他的耳朵有良心，但也常常是不安的良心，因为有许多原因致使德国人很难熟练掌握演说技巧，或几乎总是掌握得太晚了。所以无怪乎，德国散文的杰作便是其最伟大的牧师的杰作——《圣经》迄今一直是最优秀的德文书籍。与路德的《圣经》相比，几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印刷品”——某种与《圣经》不同、并非生长于德国因而一直未在德国人的心中扎根的东西。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322），古雅典雄辩家。——译者



248

世界上有两类天才：一类天才的要务是生成，设法生成，另一类天才则情愿结果实，开花结果。与此相同，在杰出的民族当中，有这样一些民族，妇女的怀孕问题，即形成、成熟和完成这一秘密任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譬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法国人亦如是。另一些民族则不得不结果实，不得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像犹太人、罗马人那样，或毫不夸张地说：像德国人那样？这些民族被不可名状的狂热所折磨和激动，不可抗拒地要挣脱自己，喜欢和向往外族人（向往“听凭自己结果实的人”），而且像意识到自己充满生殖力因而受到“上帝恩宠”而被授权的一切东西那样，自高自大。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相互追求；但他们也相互误解——像男人和女人那样。

249

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伪善，并将其称为美德。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250

欧洲欠犹太人什么？有许多东西，好的和坏的，尤其是一种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东西，即庄重的道德风格，可怕而威严的无数要求和无数意义，整个浪漫主义和壮丽而崇高的道德可疑性——因而还有在那些彩虹和生活的诱惑物中的一个最吸引人、最诱人和最精美的要素，在其余晖中，我们欧洲文化的天空，其夜晚的天空，在闪闪发光——或许行将熄灭。为此，在旁观者和哲学家当中，我们这些艺术家——要感谢犹太人。

251

如果各种各样的阴云和干扰——简言之，就是愚蠢行径的一次次轻度爆发——经常笼罩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这个民族具有民族狂热和政治野心，那我们就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了。比如，在当今德国人当中，交替出现的有反法蠢行、反犹蠢行、反波蠢行、基督一浪漫蠢行、瓦格纳蠢行、条顿人蠢行、普鲁士人蠢行（请看一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济贝尔之流和特赖奇克之流，以及他们那紧紧缠着绷带的脑袋吧），以及所有其他遮蔽德意志精神和良心的东西。愿人们原谅我，每当我大胆地在这种传染病流行得很利害的地方作短暂逗留时，我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疾病，而是像其他每个人那样，开始思考与我无关的事情

——这正是患上政治传染病的最初症状。譬如，关于犹太人，请听我说说以下的事情：我还从未遇到一位对犹太人抱友好态度的德国人；不管谨慎的政治家多么坚决地驳斥反犹主义，这种谨慎的政策或许都不是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只是针对这种情感危险的多余部分，尤其是针对这种多余情感的令人反感的无耻表露。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够多的了，德国人的肚子，德国人的血液难以消受目前这么多“犹太人”（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困难）——正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虽然消化能力较强，但也有困难那样。这就是一般本能之明确无误的宣言和立场，人们必须仔细倾听，必须依此而行。“别让更多的犹太人进来了！关好门，特别是关好通向东方（和通向奥地利）的大门！”——性格仍然软弱和不稳定，因而很容易被另一更强的种族消灭。然而，毫无疑问，犹太人是欧洲当前最强大、最坚强和最纯的种族；他们甚至知道如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取胜（实际上要比在有利条件下更知道如何取胜），所依靠的是某种道德，如今人们想把这种道德称为罪恶。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必在“现代思想”面前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自己确实发生了变化时，才改变自己，其方式恰似俄罗斯帝国进行征服的方式，恰似一拥有充足时间而尚未衰落的帝国——即，遵循“尽可能慢”的这一原则！一位心里装着欧洲未来的思想家，在其关于这种未来的所有看法中，会首先像预料俄国人那样，预料到犹太人将在诸种力量的大竞赛和大搏斗中，成为最稳健、最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当前在欧洲被称作民族而实际上是制造之物而不是天生之物（的确，有时混同于且类似于臆造和描绘



之物)的东西,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某种在不断演变、尚很稚嫩、很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像犹太人那样,是个比青铜更持久的种族。这样的民族应极其小心地避免一切鲁莽的对抗和敌对!的确,犹太人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如果像反犹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使他们受到驱使的话,现在就可以取得对欧洲的优势,不,其实是霸权。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并没有在为这一目的努力和筹划。相反,他们希望,甚至有点胡搅蛮缠地想要被欧洲吸收和同化;他们渴望在某个地方定居,得到承认和尊重,希望结束游牧生活,不再做“漂泊的犹太人”。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到这种冲动和倾向,应该对其采取主动态度(这很可能预示着犹太人本能的减弱)。为此,把那些大叫大嚷的反犹主义者驱逐出境或许是有益的,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应非常谨慎地,有选择地采取主动态度,恰似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自不待言,新德意志精神的较有势力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应毫不迟疑地着手与犹太人建立关系,譬如,与来自普鲁士边境的那个贵族军官建立关系。看一看这位赚钱和忍耐方面的天才(他特别具有某种智力和智能——可惜在上面提及的那个地方和缺少这种智力和智能)能否也通过训练掌握遗传的下命令和服从的技巧(德国目前因掌握这两种技巧而享有盛名),在许多方面是很有意思的。但在这里最好中止我洋洋自得的长篇大论和我轻快活泼的亲德立场,因为我已触及到了我的严肃主题,即我所理解的“欧洲问题”,也就是如何为欧洲培养新统治等级的问题。

252

他们不是哲学的种族——这些英国人：培根意味着对哲学精神的全面进攻，霍布斯、休谟和洛克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哲学家”这一概念的被唾弃和贬值。康德奋起反对休谟而抬高自己，正是冲着洛克，谢林掷地有声地说，“我瞧不起洛克”。在与英国机械论愚弄世界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歌德）站到了一起；这两个在哲学上相互敌视的天才兄弟，向着德国思想的对立两极分头推进，因而正如只有兄弟俩才会做出的事情那样，互相冤枉。英国目前所缺少的，而且一直缺少的东西，卡莱尔这个半吊子演员和雄辩家，这个愚蠢的糊涂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力图把他对自己的了解，即自己所缺少的东西隐藏在热情的假面具之后，他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智力，知觉的真正深度，简言之，就是哲学。此种非哲学种族的特点便是严守基督教——他们需要其戒律来实施“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国人比德国人阴郁、好色、固执和残忍——正由于这一原因，就成为两者之中的较为卑劣者，同时也最为虔诚；英国人因此而更需要基督教。对于较敏感的鼻子来说，连英国的基督教也有英国人的特有气味，即忧郁和饮酒过度，于是人们有充足理由用基督教来充当解毒剂——用较为精制的毒药中和较为粗制的毒药。较为雅致的毒化形式，对于行为举止粗俗的民族而言，实际上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向着精神化迈进了一步。英国人的粗俗和乡巴佬式的拘谨，现在仍通过上演基督教童话剧，通过



祈祷和唱赞美歌被令人满意地掩盖着（或更正确地说，由此而得到了解释和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对于从前在卫斯理派的影响下（最近则作为“救世军”）学会了作作叽哩咕噜的道德说教的大群醉鬼和浪荡子来说，一阵忏悔实际上可能是相对而言他们所能达到的“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承认以上所述。不过还有一句伤害英国人的最富于人性的话，那就是他们缺少音乐感，借助于比喻来说就是（而且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身心的动作之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对节奏和舞蹈的渴望，没有对“音乐”的渴望。听一听他们说话；看一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更漂亮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一听他们唱歌！可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

253

有些真理得到了平庸头脑的最充分的承认，因为这些真理最适合他们，有些真理对平庸的精神来说，只是具有魅力和诱惑力。我不得不逼迫人们面对这一叫人不快的结论，因为现在一些令人尊敬的、但平庸的英国人——可以提及的有达尔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力，在欧洲的中产阶级内正开始取得支配地位。其实，谁会怀疑这样的头脑暂时占据支配地位是有益的？若认为高度发达的、突兀高耸的头脑，特别适合于确定和收集许多琐碎的普通事实，适合于从中推出结论，那就错了；相反，作为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相

对于那些作为“规则”的人而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毕竟，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不仅仅是感知。实际上，他们必须是某种新东西，他们必须意味着某种新东西，他们必须代表新的价值！知识与才能之间的鸿沟或许要比人们想像的更大，也更神秘——仪态大方而能干的人，即创造者，也许必须是无知的人。而另一方面，对科学发现而言，例如达尔文的那些发现，某种狭隘、乏味和勤恳认真（总之，英国人身上的某种东西）也许不会有什么妨碍。最后，不要忘记，英国人及其根深蒂固的平庸，再次导致欧洲智力水平的全面下降。所谓“现代思想”，或“十八世纪的思想”，或“法国人的思想”——即德意志思想深恶痛绝并奋起反对的东西——源自英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国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模仿者和实施者，是其最优秀的战士，仅此而已！是其第一批意味最为深长的牺牲品；由于“现代思想”极端亲英，法国人的灵魂最终已变得极为瘦弱和憔悴，以致当前人们回忆起法国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情景，回忆起其充满激情的巨大活力与卓越的发明创造力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不过，我们必须坚决维持历史上的公正裁决，保护它免遭当前的偏见和表面现象的影响：欧洲的高贵——情感、趣味和举止方面的高度，从这个词的每一最佳意义上说——是法国的产品和发明；欧洲的卑贱，现代思想的平庸——是英国的产品和发明。



254

甚至在目前，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富于理智的文化中心，仍然是培养趣味的高等学府；但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发现这种“充满趣味的法国”。有趣味的法国人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而且还可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搂抱最强壮的大腿，其中一部分是宿命论者、忧郁症患者、病残者，一部分是放荡不羁、过于完美的人，有藏匿深山的抱负。他们的共同之点是，面对具有民主精神的中产阶级的胡说八道和高谈阔论，他们都捂上了耳朵。实际上，当前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醉醺醺的、变得很野蛮的法国，懒散地躺在那里——它最近刚刚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上花天酒地了一番，趣味低级，带有孤芳自赏的味道。他们还有另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欢抵制理智上的德意志化——同时也根本没有能力在理智上德意志化！在这种富于理智的法国，也是悲观主义盛行的法国，叔本华或许要比在德国更加如鱼得水，更加土生土长。更不用提海因里希·海涅了，他早已重新化身于巴黎，成了一个更为高雅和讲究的抒情诗人；也不用提黑格尔了，他目前通过泰纳^①——这位在世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发挥着几乎像专制君主般的影响力。然而，说到理查德·瓦格纳，法国音乐越是学着使自己适应现代灵

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

译者



魂的实际需要，它就将越是“瓦格纳化”。我们可以事先有把握地预见到这一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法国人仍然可以自豪地把三件事情吹嘘为自己的遗产和所有物，吹嘘为自己古时在欧洲享有智力优势的标志，尽管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趣味德意志化和庸俗化了。首先是有唤起艺术激情、献身于“形式”的能力，为此而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许多词语——三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就不缺少这种能力。由于尊重“少数”，法国一次又一次地使音乐文献中的所谓室内乐得以保存下来，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寻觅不到室内乐。法国人可借以宣称对欧洲享有优势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那古老的、多侧面的、关注道德的文化，人们可以发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连给报纸写故事的小说家和偶尔逛巴黎林荫大道的人，也在心理上很敏感，好奇心很强。而例如在德国，人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知道这件事情本身了！）。德国人几个世纪都未看到达到上述境界所必需的关注道德的作用，而如前所述，法国却有很多这类作品。那些因此而认为德国人天真的人，是在称赞他们的一个缺点。（德国人在惟意志心理学方面，即无经验、又无知，德国人之间交往的单调乏味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在这一细腻而令人心灵震颤的领域，法国人则具有真正的好奇心和创新能力，作为前者的对立面，同时也作为后者最成功的表现，亨利·贝尔^①值得加以注意。这位卓越的超前的先行者，以拿破仑的速度，横穿了欧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灵魂的考察者和发现者，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后

^① 亨利·贝尔（1783—1842），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原名。——译者



人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在某方面赶上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觉察到一些使他困惑和狂喜的谜——这位古怪的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和提问者，这最后一位伟大的法国心理学家。)还有第三种优势：就是法国人的性格中，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对南北方的成功综合，这使他们领悟了许多事情，也命令他们做其他一些事情，而英国人却绝对无法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气质时而接近、时而远离南方，时时涌动着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人的血液，保护他们免受北方可怕的、灰暗色的影响，保护他们免受阴沉沉的概念幽灵的纠缠，保护他们免受贫血的损害——由于贫血，我们德国人的趣味摇摆不定，趣味的过于摇摆不定，使我们目前以很大决心开出了铁血政策，即“高压政治”这剂药方（依据的是一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该方法要我们等待，再等待，而不是寄予希望）。法国还对于较为难得的人和极少感到满足的人，表现出超前的理解和欢迎态度。这些人理解力太强，不能满足于任何一种对祖国的信仰，他们在北方时知道如何爱南方，在南方时知道如何爱北方——是天生的中部地区的人，“善良的欧洲人”。对于他们来说，天才创造了音乐，这位最近出现的天才看见了一种新的美和富有魅力的东西。他发现了一个沉浸在音乐中的南方。

255

我认为，应多多提防德国音乐。假设一个人像我那样热爱南方，把南方视为一所恢复大多数精神罪恶和大多数肉体罪恶



的太学校，视为——阳光无限充足和灿烂的地方，到处都是充满自信的人——哦，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对德国音乐有所提防，因为此种音乐不但会再次伤害他的趣味，而且还会再次伤害他的健康。这样一个南方人，一个并非籍贯上的而是信仰上的南方人，若梦想着音乐的未来，就必须还梦想着音乐摆脱北方的影响；就必须在耳畔回响着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有力、或许还更有有悖常情和更为神秘的音乐序曲，一种超级德国音乐，它不像所有德国音乐那样，一见到变幻无常的蔚蓝大海和地中海万里无云的晴空，便减弱，苍白无力，渐渐消失。一种超级欧洲音乐，它即使面对大漠上昏暗的晚霞，也能毫不退缩，也能保持舒适自在，照样与漂亮而孤独的大型猛兽一起徘徊徜徉，其灵魂类似于棕榈树……。我可以想像这样一种音乐，其极大的魅力在于，它对善与恶一无所知；或许只有海员的一些思乡之愁、一些金色的影子和一些轻微的爱好的爱好，轻轻掠过它的表面；这种艺术会从远处看到一逃向它的、正在沉没的、几乎叫人无法理解的道德世界的色彩，并会表现得非常殷勤好客，非常谦卑，接受这些姗姗来迟的避难者。

256

由于民族主义狂热在欧洲各民族之间，过去制造了而且现在仍在制造病态的陌生感，也由于短视和轻率的政治家，借助于这种狂热，目前掌了权，并不认为他们目前奉行的分裂政策必然仅仅是一插曲。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以及眼下完全无法提及



的许多原因，人们现在忽略了或武断而错误地误解了欧洲希望统一这个明确无误的表示。对于本世纪所有思想较为深刻和视野较为宽广的人来说，其心灵神秘劳作的实际普遍倾向，便是为实现这种新的综合铺平道路，便是尝试着预测未来欧洲人的样子。只是在对他们的模仿中，在他们较为虚弱的时候，或许在他们年老时，他们才属于“祖国”——只是在成为“爱国主义者”时，他们才平静下来。我想到的这种人有拿破仑、贝多芬、司汤达、海因里希·海涅、叔本华。如果我把理查德·瓦格纳也算做这些人中的一个，请不要见怪。关于瓦格纳，人们千万不要被他对自己的误解所欺骗（像他这样的天才很少有权理解自己），更不要被目前法国抵制和反对他的不礼貌的喧闹声所欺骗。其实，理查德·瓦格纳与 40 年代末的法国浪漫主义，是最紧密和最亲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其需要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是相似的，从根本上说是相似的；欧洲，统一的欧洲，其灵魂以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方式，急迫而充满渴求地向外和向上突进——往哪里去？是沿着一道新的光线，还是向着一个新的太阳？但谁会力图准确地表达出所有这些新说话方式大师无法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的确，同样的暴风雨和紧张折磨着他们，他们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探索，这些最后的伟大探索者们，他们都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是第一批文学研究大师。甚至本人大都是作家和诗人，是艺术和感官的中间人和调合人（瓦格纳，作为音乐家亦被视为画家，作为诗人亦被视为音乐家，作为艺术家一般说来亦被视为演员）；他们都疯狂地“不惜以任何代价”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要特别提及与瓦格纳

关系最近的德拉克洛瓦^①；他们都是崇高的领域内，以及令人讨厌和叫人害怕的领域内的伟大发现者，实际上都是表演和剧场艺术的伟大发现者；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过其天赋，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鉴赏家，能神秘地接近所有那些诱人、诱人、抑制人和使人心烦意乱的东西；都是逻辑和直线的天生敌人——追求奇异的、异国的、可怕的、扭曲的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人，作为意志上的坦塔罗斯^②，作为粗俗的暴发户，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运动中，与高贵的速度和缓板无缘——譬如，请想一想巴尔扎克——他们都不要命地工作，几乎把自己累死；他们在行为举止上都是放弃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反叛者，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不知保持心情平静，不知享受生活；他们最终都在基督的十字架旁撞得粉碎而沉没（理应如此，因为他们当中有谁足够深刻，又具有足够的独创性，能提出一种反基督的哲学呢？）总的说来，他们是鲁莽冒失的、盛气凌人的、野心勃勃的、好高骛远的高等人阶级；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所在的世纪——这是个人民群众的世纪——懂得“高等人”这一概念……。理查德·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们应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一看瓦格纳的艺术中有没有纯德意志的东西，看一看其享有的崇高声誉是否恰好得自超德意志的根源和冲动。就此而言，不应低估巴黎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的发展多么必不可少，本能的力量曾使他渴望在最关键的时刻访问巴黎。也不

德拉克洛瓦（1789—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译者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漏天机，被罚立在齐下巴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口渴欲饮时，水即流失，腹饥欲食，果子就被风吹去。——译者



应低估他的整个行为方式和自我标榜，是使徒的做法如何只有在见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原件时，才能自我完善。较为仔细地比较一下或许会发现，令理查德·瓦格纳的德意志禀性感到荣耀的是，他在各方面的行为都要比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更有力量、更大胆、更严厉和更高贵。原因是，我们德国人到目前为止要比法国人更为野蛮。或许，理查德·瓦格纳的最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仅在目前，而且永远都无法为当今的整个拉丁种族所接近、理解和仿效：齐格弗里德^①的形象，即那个非常自由的人的形象，或许太自由了、太真实了、太欢乐了、太健康了、太反对天主教了，叫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的趣味无法接受。这个反对拉丁人的齐格弗里德甚至是对浪漫主义所犯下的一种罪恶：哦，瓦格纳在其凄惨的晚年，充分赎回了这种罪恶，他当时预料到人们的趣味将具有政治倾向，于是以他特有的宗教热情，至少开始宣传通向罗马之路，虽然尚未开始踏上这条道路。为了使人们不误解上面最后几句话，我将借助于几句强有力的韵文，使即便不那么灵敏的耳朵也听出我的意思——我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最后的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音乐正相反：

——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嚎叫，是否出自德国人的心灵？

这种自己对自己的撕咬，是否出自德国人的身体？

这种教士般的铺叙，

这种香气缭绕的兴高采烈？

这种摇晃、跌倒和蹒跚，

齐格弗里德，德国民间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这种难以捉摸的叮叮当当声？

这种修女般偷偷的媚眼，祈祷报时钟的鸣响，

这种完全虚假的天国中的欢腾雀跃？

——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

好好想一想吧！——你仍等待着得到承认——

因为你听到的是罗马——罗马出于直觉的信仰！





第九章 什么是高贵？

257

“人”类的每一次提升，都是贵族社会造成的成果，而且永远都是如此。贵族社会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巨大的等级差别和价值差异，认为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奴役。距离的感伤力，例如若没有产生于具体的阶级差别，产生于统治阶级总是逼视和俯视他们的部属和工具，产生于统治阶级发号施令、控制和保持距离的习惯的那种感伤力，人们就不会希望不断扩大灵魂本身之内的距离，就不会形成较为高级的、较为难得的、更进一步的、较为广大的、较为全面的国家，“人”类就不会提升，或者在超道德的意义上使用道德上的惯用语句，就不会出现不间断的“人的自我超越”。毫无疑问，对于贵族社会的起源史（即对于典型“人”提升的起始条件），人们一定不要抱有任何仁慈的幻想：真相是残酷的。让我们没有偏见地看一看迄今每一较为高级的文明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仍然具有自然本性的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食肉的人，仍然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权力欲，向较为虚弱的、较有道德的、较爱好和平的种族（或许是从事贸易的、或饲养家畜的村落）猛扑了过去，向古老而成熟的文



明民族猛扑了过去。这些民族智穷才尽，颓废堕落，其最后的生命力正在渐渐熄灭。开始时，高贵种姓都是野蛮种姓，他们的优势不仅表现在其身体力量上，而且还表现在其精神力量上——他们是较为全面的人（较为全面的人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较为全面的动物”）。

258

腐败堕落，标志着各种本能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被称为“生命”的各种感情的基础将被动摇——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根本不同的东西。譬如，大革命开始时，法国贵族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放弃了其特权，沉溺于道德感情之中，这就是腐败堕落。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腐败堕落的尾声，在这一过程中，法国贵族逐渐放弃了其贵族特权，把自己的身分降低至王族的附庸（最终甚至只充当点缀，只出席阅兵典礼）。然而，强壮而健康的贵族的本质特征却是，它不应把自己视为王权或国家的附庸，而应把自己视为王权和国家的意义所在和最高辩护者——所以它应问心无愧地接受大批人的牺牲，为了它，必须压制他们，使他们沦落为有缺陷的人，沦落为奴隶和工具。其基本信念恰恰必须是，不应听凭社会为了自身而存在，社会仅仅是一个基础和脚手架，借此一经过挑选的阶级，可以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的职责，并一般地可以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级的存在，就像爪哇岛上那些追逐阳光的攀缘植物那样——它们用枝干盘绕着栎树，直到最后远远高于栎树，但却

因为栎树的支撑，方能在明媚阳光之下展开其顶端，显露出幸福之情。

259

避免相互损害，避免相互使用暴力，避免相互剥削，使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即，在一个组织之内，个人的力量和价值以及相互关系实际上是相同的），这会在某种不精确的意义上，导致个人之间的良好品行。可是，一旦人们想要普遍地采用这一原则，甚至把这一原则当作基本的社会原理，那就会立即暴露出它的内涵——它是否定生命的意志，是分解和腐烂的原则。在这里，人们必须作根本性的思考，抵制一切感情上的脆弱。生命本身实质上是占有、损害、对异国人和弱者的征服、镇压、严酷，即使用最温和的词语形容，至少也是剥削。尽管很久以来，这些词语就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但为什么人们还老是使用它们呢？即便是那个如前面所假定的，在其内部是每个人相互平等对待——每一健康的贵族集团内部就是这样——的组织，如果它是个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垂死的组织的话，也必须对其他组织做所有那些事情。虽然在其内部每个人避免相互做这些事情，它将不得不成为强力意志的化身，不得不努力成长，努力有所发展，努力获得优势。这不是因为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活着，因为生命就是强力意志。然而，在这方面，欧洲人的普通意识要比在其他方面更不愿意被纠正；无论在哪里，



人们现在都在热烈谈论未来的社会状况，甚至假借科学的名义大谈特谈，说“剥削性”将退出历史舞台。在我听来，似乎是他们保证要发明一种生活方式，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生命将避免发挥所有机能。“剥削”并不属于堕落的或有缺陷的原始社会；剥削是固有的强力意志的结果，而强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尽管这作为一种理论是新奇的，但作为现实的它，却是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让我们在此限度内真诚对待自己吧！

260

我在迄今流行于或目前仍流行于这个地球上的许多高雅和粗俗的道德之间游历了一番，发现一些特征有规律地反复同时出现而且相互联系，最后，我发现两种主要类型，就是存在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不过，我要立即补充说明，一切较为高级的混合文明也试图调和这两种道德；但更为常见的是，两者的混淆和相互误解，而且有时会难分难解地并列在一起——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灵魂内部。道德值的特征要么产生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意识到自己不同于被统治者而感到高兴；不然就是产生于被统治阶级，即各种各样的奴隶和依附者。在前一场合，由于是统治者决定“善”这个概念，因而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被视为优越的特征，这种个性决定着等级差别。高贵型的人区别于这样的人，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与上述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相反：他鄙视这些人。在第一种道德中，“善”与“恶”的对立其实就是“高贵”与“可鄙”的对

立——尽管“善”与“恶”的对立出于另一来源。懦夫、忧心忡忡者、卑鄙猥琐者、只考虑眼前利益者，都是受鄙视的；而且，眼光狭隘的多疑者、自卑者、甘受虐待如同狗一样的人、摇尾乞怜的拍马屁者，尤其是说瞎话者，也都是受鄙视的。所有贵族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平民百姓是靠不住的。“我们这些可信赖之人”——古希腊的贵族都这样自称。很显然，无论在什么地方，道德价值的名称都首先运用于人，然后才被加以引申，运用于行为；所以，道德史家从“同情他人的行为为何受称赞”这一问题出发，是大错特错的。高贵型的人把自己视为价值的决定者，因此不需要得到认可；他断定：“凡是对我有害的，其本身就是有害的。”他知道，完全是他自己赋予事物荣誉；他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尊重自己内心承认的一切——这样的道德乃是自我赞美。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富裕意识，所以高贵者也会帮助不幸者，但不是——或几乎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充溢的强力所产生的一种冲动。高贵者把自己尊为强力者，并能控制自己，知道如何说话，如何保持沉默，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并且敬重一切严厉而苛刻的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则英雄传奇中说：“奥丁给我的胸中放了一颗铁石的心。”这是从一个自豪的维京族^②人的心里理所当然地唱出来的。这种类型的人甚至为自己天生不善于同情而自豪。因此，这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以告诫的口吻补充道：“谁在年轻时

奥丁，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最高神。——译者

维京族，8—11世纪在北欧海岸从事海岛生涯的诺曼族。——译者



没有铁石的心，谁就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心。”抱有这种想法的高贵者和勇敢者距离下面这样一种道德最为遥远，这种道德认为：同情，或为他人做事，或无私，才是有德者的特征。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充满自豪感，对自私怀有根本的敌意和嘲讽态度，跟自然而然地看不起同情心和“温情”一样，肯定属于高贵的道德。正是强壮有力的人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这是他们的本领，是他们发挥创造力的领域。深深崇敬古代和传统——一切法律都建立在这种双重的崇敬之上。信任和偏爱祖先，不信任和不喜欢后来者，是强壮有力者的道德的典型特征；相反，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几乎本能地相信“进步”和“未来”，越来越不尊崇古代，由此充分暴露出这些“思想”出身卑贱。然而，统治阶级的道德，由于其原则很严厉，与当代的趣味最相抵触，最令当代的趣味不舒服。这一原则就是，人们只对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承担义务；对地位较低的人，对一切异己者，可任意地或者“随心所欲”地行事，总之，可以“超越善与恶。”正是在这里，同情和与其类似的感情享有一席之地。长久地感激和报复的能力与义务——这两者只存在于地位相等者的圈子内——巧妙地报复，优雅细腻的友谊，树敌的某种必要性（以此发泄忌妒、好斗、傲慢等情绪——其实是为了成为好朋友），这一切都是高贵道德的典型特征。这种道德，如前所述，不是“现代思想”的道德，因此目前很难付诸实施，也很难发掘和揭开它。第二种道德，即奴隶的道德，则是另一番情景。假设受虐待者、受压迫者、受苦者、未获解放者、厌倦者和那些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也来谈论道德，那么，他们的道德评价中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对人类的整个状况表示

悲观主义的怀疑，而且或许会谴责人类及其状况。奴隶不喜欢强壮有力者的道德；他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绝对不相信强壮有力者尊重的一切“善事”；而宁愿使自己相信，强壮有力者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那些有助于缓和受苦受难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质，则受到推崇和吹捧；正是在这里，同情、温和、乐于助人、宽厚、忍耐、勤劳、谦恭和友善，赢得了尊敬；因为在这里，这些是最有用的品质，而且几乎是承受生存重负的惟一方法。奴隶道德实质上是功利主义道德。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尽人皆知的“善”与“恶”的对立：强力和危险性被认为属于恶，即不容轻视的某种恐惧、难以捉摸的力量被认为是恶。所以，按照奴隶道德，“恶”人引起恐惧；按照主人道德，恰恰是“善”人引起恐惧和试图引起恐惧，而恶人则被视为卑鄙的人。若按照奴隶道德的逻辑推论，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鄙视这种道德的“善”人——哪怕是轻微的、好意的鄙视——两者之间的对比便会达到最大的效果；因为，按照奴隶的思维方式，善人不管怎样都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人，必须是性情温和的、容易受骗的、或许有点儿傻的老好人。在奴隶道德占优势的地方，无论何处，语言都显示出使“善”和“傻”这两个字眼的意思相互接近的倾向。最终的根本区别是：对自由的渴望、追求幸福的本能以及细腻的自由感情，必须属于奴隶道德和奴隶品性，正如巧妙而狂热的崇敬和献身，乃是贵族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的通常表征。由此我们可以立即明白，为何作为激情的爱——这是我们欧洲人的特点——一定有其绝对的高贵来源；众所周知，这种爱的发明权属于普罗旺斯的骑士诗人，即那些出色的、富有独创性的、有“快乐知识”的人，欧洲欠



他们的太多，甚至欧洲本身的存在都受惠于他们。

261

虚荣也许是高贵的人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其他人认为虚荣是不言而喻的，而高贵的人却倾向于否认虚荣的存在。关键是要让高贵的人认识到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力图使别人对自己产生好的评价，虽然他们“不配”得到这种评价，可却相信所产生的好评价。这在高贵的人看来，一方面趣味太低下了，太不自重了，另一方面也太可笑和荒唐了，以致他宁愿把虚荣看做是一种例外，在人们谈到它的大多数时候都表示怀疑。譬如，他会说：“我也许弄错了自己的价值，却要求别人承认我对自己的评价。不过，这并不是虚荣（而是自负，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所谓‘谦恭’和‘谦虚’）。”他甚至会说：“由于许多原因，我可以喜欢别人的好评价，这可能是因为我热爱和尊重他们，他们快乐我也高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好评价，可增强我对自己的信心，同时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好评价，即便我不同意，现在或以后对我也是有用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虚荣。”具有高贵品格的人，首先必须借助于历史而清楚地认识到，从远古以来，在所有社会阶层，普通人都仅仅是被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东西——根本不习惯于确定价值，甚至给自己选定的价值正好是主人给他选定的（创造价值是主人的特有权利）。即便是现在，如果普通人仍老是等待着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出于本能使自己服从这一评价（决不是仅仅服从于“好的”评价，

而且还服从于坏的评价和不公正的评价。譬如，想一想大多数虔诚的妇女从告解神父那里学会的，以及虔诚的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学会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贬低），那也会被看做是不同寻常的返祖现象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随着民主社会秩序的缓缓崛起（这种社会秩序崛起的原因是，主人血统和奴隶血统的混合），主人的那种为自己选定价值和对自己“评价很好”的高贵冲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发展；但总是有一种更为古老的、更为强大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倾向与其作对——而且在“虚荣”现象中，这种较为古老的倾向征服了年轻人。爱虚荣的人每一次听到对自己的好评价都会感到高兴（而完全不考虑其用处，也不考虑其是真是假），正如他每一次听到不好的评价都生气那样，因为他屈从于这两种评价，并且感到不得不屈从于这两种评价，最为古老的屈从本能充溢于他的内心。正是爱虚荣的人血统中的“奴隶气”，奴隶残存的那点狡猾——譬如在女人身上，就仍有许多奴隶气！——诱使人们尽力博得好评；也正是奴隶随后立即匍伏在这种评价面前，似乎这种评价并不是他呼唤出来的。所以，我再次声明，虚荣是一种返祖现象。

262

一个（物）种的产生，和一个类的确立及强大，要经过与基本上不变的恶劣条件作长期斗争。另一方面，饲养者的经验告诉人们，某一（物）种若得到的营养太多，受到的保护和照料过多，便会很快产生大量变种，产生许多奇异和畸形之物



（也产生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恶）。姑且把贵族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某一城邦，或威尼斯，视为养育人的一种有自由意志和没有自由意志的装置；其中一个人挨着一个人，要靠自己独力生存，他们想要使自己所属的种占优势，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占优势，否则便要冒被消灭的巨大危险。那里缺少促进变种生长的特殊照顾，没有过多的营养和保护；他们必须作为种，作为某种东西而存在，只有借助于其坚硬的、一致的、简单的结构，才能在与其邻人或与其反叛的，或要反叛的仆人的不断斗争中，占优势和永存。各种各样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主要是哪些特质使他们面对各种神和人，仍然生存了下来，并迄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他们把这些品质称为美德，仅仅发展了这些美德，使其趋于成熟。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很严厉，其实他们渴望严厉；每一种贵族道德的教育年轻人、管束女人、婚姻习俗、长幼关系、刑法（它只注意防止堕落）等方面，都是偏执的。它以“正义”的名义，把偏执本身视为一种美德。由此而产生了一类具有若干很明显特征的人，一种表情严肃的、尚武的、矜持寡言的人（他们对社交活动的魅力和微妙之处，有极敏锐的感受力）历经世代交替而不受影响；如前所述，与不变的恶劣条件展开不间断的斗争，是使一类人变得稳定和坚强的原因。然而，最终会出现幸福局面，严重的紧张状态会得到缓和；也许邻人当中不再有敌人，乃至享受生活的资料极其丰富。古老行为准则的束缚和约束一下子解除了，人们不再把它看做是必不可少的，不再把它看做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即使它继续存在，它也只是一种奢侈，一种仿古趣味。变种，无论是更高级、更雅致、更难得的变种，还是退化和畸形的变种，都会突然大量涌现；

个体敢于成为个体，敢于脱离集体。在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种像原始森林中那样多种形式的蓬勃生长和抗争、一种热带速度的生长竞争以及一种令人惊奇的衰落和自我毁灭，会并列出现，而且常常混杂和纠缠在一起。原因是各种利己主义残酷无情地相互对抗，迅猛地发展，互相争夺“阳光”，无法再用迄今存在的道德规定界线，予以限制或叫它们克制自己。正是这种道德本身积累了如此巨大的力量，把弓拉得这么满，以致它现在已经“过时”，或正在变得“过时”。目前已经达到令人不安的危险之点，人们将超越旧道德，过一种更加伟大的、更多方面的、更全面的生活；“个人”将占据突出位置，将不得不自己颁布法律，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巧和策略来自我保存、自我提升和自我解脱。只有新的“为什么”，只有新的“怎么会”，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准则，在一起时只会相互误解和不尊重，衰落、堕落和最高尚的欲望可怕地纠缠在一起，从善与恶的各种丰饶角中，涌现出大量天才，春季和秋季不祥地同时出现，充满了尚不疲乏、尚不疲倦的新腐败中特有的新魅力和新奥秘。会再次出现危险，道德之源会受到巨大的威胁；这次将威胁到个人，威胁到邻人和朋友，威胁到普通人，威胁到他们的孩子，威胁到他们的心灵，威胁到他们的欲望和意志中所有与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最为隐秘的深处。此时出现的道德哲学家将要宣讲什么呢？这些目光锐利的看客和游手好闲者发现，结局正在迅速向人们逼近，周围的一切都在衰败并引起衰败，除了一种人即不可救药的平庸者外，一切都不会延续到后天。只有平庸者有可能继续存在和繁衍。他们将是未来之人，将是仅有的幸存者；“跟他们学！做平庸者！”是目前仍然有意义和仍可赢得听众的



惟一道德。但宣讲这种平庸的道德却很难！这种道德是什么，想要什么，谁也说不清！它只能谈论节制和尊严，只能谈论义务和兄弟般的友爱——要掩盖其讽刺意味，很难！

263

有人具有追求地位的本能，同任何其他本能相比，具有此种本能已经是地位高的标志；有人乐于怀有细腻微妙的崇敬之情，由此可推断出他们的出身和习惯都很高贵。灵魂的纯净、善良和高尚，在某样东西根据追求地位的本能，来判断具有最高的地位，但却尚未受到令人敬畏的权威的保护，而免遭鲁莽的触摸和不文明行为的损害时，会受到可怕而危险的检验。这种东西宛如一颗活的试金石，普普通通，尚未被人发现，具有试探性质，或许有意蒙着一层面纱，作了伪装。致力于考察灵魂的人，可利用这种手法的许多变形来确定某一灵魂的最终价值，确定其所属的固有等级。他可以用其尊重的本能来检验它。差别造成仇恨，若把某一神圣的器皿、某一密闭神龛中的珠宝、某一部关乎人类命运的书籍放在这一本能之前，许多粗俗的本性便会像脏水那样突然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则会有不由自主的缄默、犹豫的目光和一切手势的停止，由此而表明灵魂真切地感受到了最值得尊敬的東西。欧洲迄今尊重《圣经》的方式，或许是欧洲受基督教训导而行为举止教养有素的最好例子。像这样内容如此深奥和意义极其重大的书籍，需要有一种表面上专横残暴的权威来保护它们，这样，要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时

期，才能全面理解它们和揭开它们的奥秘。一旦逐渐灌输给了大众（即各种浅薄之人和傻瓜）这样一种情感，即他们不得触摸每一样东西，在一些神圣的体验面前，必须脱掉鞋子，把脏手藏在背后，那么，便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几乎可以说是向人性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相反，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在“现代思想”的信奉者当中，最令人憎恶的莫过于他们的寡廉鲜耻，莫过于他们触摸、品尝和拨弄每一样东西时，眼和手的从容不迫和傲慢无礼；尽管如此，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在下层阶级当中，尤其是在农民当中，可能还是比在喜欢读书看报、有知识的半上流社会即有教养的阶级当中，有更多较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

264

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抹不掉其祖先最喜欢和最经常做的事情。不论其祖先是勤劳节俭之人，埋首在书桌和钱箱之前，欲望不太大，与小市民没有什么两样，道德标准也不太高；还是习惯于从早到晚发号施令，喜欢粗野的消遣和更加粗野的义务及责任；或是最后不时地放弃血统和财产上的古老特权，以求全身心地为其信仰——为其“上帝”——而生活，做无情地服从良心和良心无比敏感的人，为每一次违背良心而脸红。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本性上没有其父母和祖先的特性和偏好，无论表面上的情形显得多么两样。这就是种族问题。假如对父母有所了解，便可推知孩子的情况。不管何种令人讨厌的无节制，不管



何种卑劣的忌妒，不管何种笨拙的自吹自擂——这三种特征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切时代的真正的平庸类型——都必然会遗传给孩子，像卑贱血统那样肯定会遗传给孩子。借助于最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只能就这种遗传进行自我欺骗。当今的教育和文化又能做些什么！在我们的很民主的，或毋宁说很平庸的时代，“教育”和“文化”从本质上说必然是骗术——在出身方面，在身心继承的平庸方面进行欺骗。当今的教育工作者鼓吹真诚高于一切，向学生不断高喊：“要真诚！要自然！是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即便是这样品行正直而一本正经的蠢驴，很快也会学会利用贺拉斯的螫。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一直退化为“平庸”。^①

265

冒着触怒天真无邪的耳朵的风险，我提出：利己主义乃是高贵灵魂的本质。我指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信念。其他存在物必须自然地服从于像“我们”这样的存在物。高贵的灵魂接受利己主义这个事实，不提出丝毫异议，也未感觉到其中有什么刺耳、令人不舒服或武断之处，而是将其视为这样一种东西，其根基存在于事物的基本规律之中。如果要为它取名字的话，他会说：“这就是正义本身。”在某些情况（这些情况会使他在开始时犹豫不决）下，他承认，有另外一些享有同样得天独厚

贺拉斯，《书信集》，I. x. 24。



条件的人；一旦解决了这一地位问题，他便仰赖杰出人物都懂得的一种上天赋予的超凡心理机制，像自己独处时那样，充满自信而又谦逊地知道如何尊重他人，周旋于那些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和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当中。在与地位相等的人交往时，必须具有的这种技巧和必须进行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利己主义的又一例证。每一杰出人物都是相互一样的利己主义者；他尊重他们就是尊重自己，让予他们权利就是让予自己权利，他确信，荣誉和权利的交流，作为一切交往的本质，也是事物的自然状态。高贵的灵魂受充满激情而敏感的报答本能的推动，既索取又给予，这一本能位于其本性的根部。在地位同等的人当中，“施惠”这一概念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名声；也许有高妙的办法赠与礼物，像是从上面照到人身上的阳光，有高妙的办法把它们当作露珠如饥似渴地喝下。但高贵的灵魂却没有玩弄这些手法和作这些夸示的才能。在这方面，利己主义阻碍了他。一般说来，他固执地“往高处”看——他要么水平地和故意地往前看，或往下看——他知道自己处于一定的高度。

266

“人们只能真正尊敬不考虑自己的人”——歌德对拉特·施洛塞尔说。



267

中文有个俗语，做母亲的甚至用它教育孩子，这个俗语就是：“小心。”从本质上说，这是现代文明的根本趋向。我确信，古希腊人也会首先注意到我们当今欧洲人自己使自己矮小——单单在这方面，我们就立即会使古希腊人感到反感。

268

卑贱究竟是什么？词语是观念的发声符号；而观念则是经常重复和同时出现的感觉，或感觉群中或多或少明确的心理符号。使用相同的词语并不足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我们还必须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种类的内心体验，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有共同的体验。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不同民族的人使用相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内的人也要比不同民族的人能更好地相互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若人们长期在相同的（气候、土壤、危险、需要、辛劳等）条件下一同生活，便会产生一个能够“自我理解”的实体——即，一个民族。在一切灵魂中，相同数目的、经常反复出现的体验已压倒了较少出现的体验，于是，关于这些体验，人们能迅速地相互理解——语言的历史就是一种缩写过程的历史。依靠这种迅速的理解，人们愈来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危险愈大，迅速而无障碍地就必要事项达成一致

意见的需要也愈大；处于危险状态的人们不相互误解——这是交往过程中万万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切爱和友谊中，人们体验到，一旦发现使用相同词语的双方，有一方的感情、思想、直觉、愿望或恐惧不同于另一方，爱和友谊便不复存在了。（对“永恒误解”的恐惧，正是这一守护神常常阻止异性过于匆忙地相互依附，尽管感官和心灵促使他们相互依附——不是某种叔本华式的“人类的守护神”！）灵魂中的哪类情感觉醒得最快，开始讲话和下命令，哪类感情便决定价值的一般等级次序，并最终决定想要东西的清单。一个人对价值的看法，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其灵魂的结构，由此可看出其生活状况，其内在需要。假如由于命运的安排，一切时代所聚拢的只是能用相同符号表达相同需要和相同体验的人，那么，总的结果便是，人们的需要很容易传播开来，这最终意味着人们只具有普通的和共同的体验，在迄今作用于人类的一切力量当中，这肯定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较为相同的、较为普通的人，一向总是占有优势；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很少能繁衍生存下去。必须借助于相反的巨大力量，才能阻止这种自然的、太自然的使人人相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会演化成千人一面的、普通的、平庸的、喜欢群居的人——演化成卑贱的人！



269

心理学家——我指的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心理学家——愈是将注意力放在较为杰出的个人和病例上，被同情心窒息的危险就愈大。他必须比其他人更加严厉，更加欢乐。因为，较优秀的人，生来较为特殊的灵魂，其堕落和毁灭实际上是普遍现象。老是目睹这种现象是可怕的。心理学家发现了这种毁灭，先是偶尔发现一次，然后是在整个历史上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较优秀的人的这种普遍的内心绝望，这种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永远的“太晚”。心理学家由此而遭受的多方面折磨，有一天会致使他转而仇恨自己的命运，致使他力图自我毁灭——即致使他“想要毁灭”自己。人们会在几乎每一位心理学家身上，发觉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倾向，即他喜欢与生活井然有序的普通人交往。由此暴露出他总是需要治疗，需要某种逃避和忘却，远离他的洞察力和敏锐目光——即他的“职业”——使他的良心感到的东西。害怕记忆是他独有的特征。别人的判断很容易使他保持沉默；他不动声色地倾听人们如何表示尊敬，如何赞美，如何爱 and 如何颂扬，尽管他对这些已有所察觉——他甚至明确同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以此掩盖他的沉默。或许，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可怕，以致他学会了深深地同情和极端蔑视，而大众、受过教育的人和空想家，则学会了深深地崇敬“伟人”和奇异的动物。由于有这些伟人和奇异的动物，人们便祝福和尊敬祖国、地球，人类

的尊严和人们自己，让年轻人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楷模教育年轻人。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在所有引人注目的事例中，发生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大众崇拜一个神，而这个神只是一个可怜的被献祭的动物！成功一向是最大的说谎者，而“行动”本身就是成功。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发现者，都被掩盖在他们的业绩中，直到认不出他们来；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行动”，只是创造了如此行动的人，只是创造了被普遍认为如此行动的人；被人们崇敬的“伟人”，是后来编造出来的可怜的小小谎言，就如在历史价值领域，盛行铸造伪币。譬如，那些伟大的诗人，如拜伦、缪塞、坡、莱奥帕尔迪、克来斯特、果戈理（我不敢提及更加伟大的人物，而只是把他们珍藏在心中），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和过去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样子，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充满了热情，非常敏感，带有孩子气，不稳重，相信和不相信全凭一时冲动；灵魂中总有某种瑕疵要掩盖；常常为了内心的亵渎而用作品进行报复，常常试图忘却，远远脱离太真切的记忆，常常掉在泥潭中，并几乎爱上了泥潭，以致变成像是沼泽地周围的鬼火，并自称是星星——于是人们把他们称作理想主义者，常常与挥之不去的厌恶情绪作斗争，与不时出现的怀疑幽灵作斗争。这一幽灵使他们变得冷漠，使他们渴望荣誉，使他们从喝醉了的谄媚者手中，接过“现在的信仰”吞下去。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一般所谓的高等人，对曾经发现了他们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啊！因而可以想见，正是从女人——女人在受苦受难的世界里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同时不幸的是，想要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帮助和拯救受苦的人——那里，他们如此快地学会了让无限而忠实的同情心大发作，而大



众，尤其是虔诚的大众，却不理解这种同情心，用许多刨根问底的、自鸣得意的解释，使他们不知所措。这种同情总是对自身的力量抱有错误的看法；女人喜欢相信，爱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女人特有的迷信。哦，了解心灵的人发现，即使是最热烈、最深切的爱，也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那么做作，那么笨拙——他发现，爱与其说会拯救人，不如说会毁灭人！在有关耶稣生平的神圣寓言和滑稽模仿之下，可能隐藏着最令人痛苦的有关爱的知识的殉难，是最清白无辜的和最热烈渴求的心灵的殉难，这颗心灵从未有过足够的人类之爱。它需要爱，不屈不挠地和疯狂地需要被人爱，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对拒绝给他爱的那些人大发脾气。这是有关一个可怜灵魂的故事，它渴望得到爱，因此而创造了地狱，把那些不愿意爱他的人送到那里。它最终了解了人类的爱，因为这种爱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无知！有这种看法的人，对爱有这种了解的人——是在找死！——可是人们为何讨论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呢？当然是因为人们不得不讨论。

270

每个深深地遭受过痛苦的人，会从理智上变得倨傲不逊和怀有厌恶之情，这几乎决定了人们的地位等级，决定了人们能多么深地忍受痛苦。一件使人胆寒的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他因此而会受到彻底的影响，被打上深深的烙印，经历过痛苦之后，他比最机灵、最聪明的人懂得更多，熟悉和“通晓”了许多遥



远而可怕的世界，而“你对这些世界却一无所知”！受苦者的这种理智上的倨傲不逊，被选中的有知识的人、“被引入门的人”、几乎被献祭的人的这种高傲，需要用各种形式的伪装来保护自己，以免与好管闲事的、爱表示同情的人接触，以免与所有那些未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接触。深深的痛苦可以使人高贵，可以把人与人区别开来。最为精致的伪装形式之一，就是伊壁鸠鲁学说，连同某种无拘束的炫耀性趣味，伊壁鸠鲁学说不把痛苦放在眼里，防备一切伤感和深奥。伊壁鸠鲁主义者是利用快乐的“快乐之人”，因为他们由于快乐而被误解——他们希望被误解。还有一些利用科学的“科学家”，因为科学显示出快乐的外表，因为科学性得出一个人是肤浅的这一结论，他们希望把人引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还有一些奔放不羁的傲慢之人，他们想要掩盖和否认他们具有破碎的、不可救药的高傲心灵（例如哈姆雷特的愤世嫉俗——加利亚尼的事例）；偶尔愚蠢本身就是不幸的、过于自信的知识面具。由此可以认为，“尊崇这一“面具”，不在错误的地方利用心理学和好奇心，是较为高雅的人性的一部分。

271

把两个人最为深刻地区分开来的，是不同的纯洁感和标准。这与他们的全部真诚和相互帮助又有什么关系？这与他们的全部相互友好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依然是——他们“彼此闻不出对方的味儿！”追求纯洁的最高本能，使受这种本性影响的人成



为一个圣人，处于最为奇特和最为危险的孤立境地。这正是这种本能的神圣之处和最高的精神化。沐浴时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快乐，心中怀有热望和渴求，不断迫使灵魂走出黑夜，进入明媚的早晨，摆脱忧郁，摆脱“苦恼”，进入晴朗、明亮、深邃和高雅的境界。恰如这样一种倾向区别于其他倾向那样——这是一种高贵的倾向——它也把人与人区别了开来。这位圣人可怜的是污秽的人性，太人性。而假如可怜本身被他认为是不纯洁的，是污秽的，那就有水平和高度了。

272

高贵的标志是，从未想到过要把我们的义务降格为对每个人承担的义务；不愿放弃或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特权和行使特权视为我们的义务。

273

一个人若想要成就一番伟业，便会把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视为有利于自己前进的手段，或视为阻碍自己前进的障碍——或视为暂时的歇脚处。只有在他得到了提升和享有支配地位之后，他才有可能以独特的傲慢方式，对同胞表示出慷慨大度。在此之前，感到不耐烦和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经常上演喜剧，因为即便是奋争也是一场喜剧，会像每一手段那样掩盖目的

——会破坏与他人的所有交往；这种人熟悉孤独，熟悉孤独中最有毒的东西。

274

等待者的问题。要有好机会，要具备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这样，将问题的解决搁置起来的高等人，才会在适当的时刻采取行动，或者说才会“爆发”。通常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的一切角落，都有人坐着在等待，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将等到何时，更不知道自己将空等一场。偶尔，也会听到起床号，也会出现“准许”采取行动的机会，但往往来得太迟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采取行动的力量，已在坐着不动中耗竭了；多少人想“跳起来”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麻木，精神也太沉重！他自言自语道：“太迟了！”他已没有了自信，自此以后永远废了。就天才而言，“没有手的拉斐尔”（取这个词最广的意义）也许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情况，谁又说得清呢？或许天才根本就不是那么罕见，而罕见的是那五百只手——天才需要五百只手来对“合适的时机”施行暴政——来抓住时机！

275

谁不想看一个人的高度，而只是睁大两眼注视此人身上的那些明显的低处——谁就会由此而将自己暴露无遗。



276

遭受各种损害和损失时，粗糙的低等灵魂要比高贵的灵魂境况好。考虑到后者生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它遇到的危险肯定更大，实际上极有可能遭受不幸而毁灭。晰蜴断了爪子会再长出来，人则不能。

277

太糟了！老是这种样子！一个人盖好了房子之后常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绝对应该在着手盖房子之前知道的。总是听到致命的那句“太晚了！”已完成的每样东西的抑郁症！

278

漫游者，你是谁？我看见你蹒跚而行，没有嘲笑，没有爱，目光深不可测，像一个线锤那样湿漉漉的，显得悲伤不已，刚刚探测过每一深度，从水中拉上来，一副不满足的样子——它在水下要寻找什么？——胸中从不叹息，双唇掩盖着厌恶之情，一只手只是在缓缓握紧：你是谁？你做了些什么？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此处热情款待每一个人——恢复恢复精神吧！你到

底是谁，眼下什么会使你高兴？什么会使你恢复精神？说出来，只要我有，我就给你！“使我恢复精神？使我恢复精神？使我恢复精神？唉，你真是多管闲事，你说的够多的了！可还是给我吧，求求你——”给你什么？什么？快说出来！“另一个面具！第二个面具！”

279

内心忧愁的人在幸福的时候会暴露出真面目，他们抓住幸福的方式，似乎是要出于忌妒而闷死和勒死它——哎，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幸福会逃离他们！

280

“可惜呀！可惜！他说什么？他——不回来了？”是的！但如果你为此而抱怨，你就误解他了。他会回来的，就像每个想要高高地跳起来的人那样。

281

“人们会相信我的话吗？我坚持认为人们会相信我的话。我想到自己总是感到很不满，总是对自己很不满，虽然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到自己，而且总是



不喜欢我‘这个主体’，老想脱离‘自我’，总是不相信这个结果，因为老是抑制不住地怀疑自己认识自己的可能性，这致使我觉得连理论家们提出的‘直接知识’这一观念也有词语上的矛盾之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几乎是我对我自己最确定无疑的了解。我内心中肯定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不愿相信任何有关我自己的确切事情。或许其中有什么谜？很可能；但幸运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痛恨。或许这暴露出了我所属的种类？但没有暴露给我自己，这着实叫我感到很惬意。”

282

——“你怎么了？”——“我不知道！”他支支吾吾地说：“或许鸟身女怪 刚飞过我的饭桌。”——如今一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且不爱交际的人，有时会突然发狂，摔盆砸碗，把饭桌掀翻，尖声喊叫，咆哮怒吼，使每个人惊骇不已。最后安静下来，感到无比羞愧，对自己又气又恼——这是要干什么？是为了什么？是要饿死自己吗？是要用记忆把自己憋死吗？对想要有一颗高尚而高雅的灵魂、却很少见到有人把自己的饭桌摆好、把饭菜做好的人来说，发怒的危险总是很大——不过，现今这种危险特大。若一个人被抛入一喧闹的平庸时代，而自己又不想与之同桌就餐，那他很容易饿死和渴死，或者最终会突然

鸟身女怪，希腊神话中一种脸及身躯似女人，而翼、尾、爪似鸟的怪物，性残忍贪婪。——译者



“开始”感到恶心。我们大家很可能都坐在了不属于自己的桌子旁；恰恰是我们当中那些最崇尚精神从而也最难养的人知道，如果我们突然洞悉了自己吃的东西和与自己同桌吃饭的人，并由此而感到希望破灭，会造成多么危险的消化不良，亦即饭后恶心。

283

如果真的想要赞扬，那只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赞扬才是一种既精巧、又高贵的自我克制——否则实际上便会赞扬自己，这与高雅趣味是背道而驰的。毫无疑问，上述自我克制提供了不断被误解的极好机会和诱因。要能使自己具有这种真正的趣味和道德，就一定要不要生活在智力低下的人当中，而要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这些人高雅的误解和错误，引人发笑——否则就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赞扬我 所以他也就承认我是正确的”这种愚蠢的推理方法，会毁掉我们这些遁世者的一半生命，因为由此我们将以傻瓜为邻，以傻瓜为伴。

284

生活在广袤而高傲的平静之中；永远超越……。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具有或不具有感情，表示赞成和反对；一连几小时把自己降格至它们的水平；像坐在马背上，或像坐在驴背上那



样坐在它们身上——因为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愚蠢和它们的热情。保留自己的三百个显著位置；并保留自己的墨镜：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人一定盯住我们的眼睛，更不会盯住我们的“动机”。而且选择那个调皮而欢快的恶德即温文尔雅为伴。并且保持四项美德：勇气、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独。因为，孤独作为一种把我们引向纯洁的崇高趋势和倾向，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美德。它发觉，人与人相互接触——即“处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肯定是不纯洁的。无论何种交往，均会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变得——“平庸”。

285

最伟大的事件和思想——不过，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需要最长的时间才能被理解。而与其同时代的那几代人，不会经历这样的事件——他们活不过这些事件。这里发生的事情，类似于恒星领域发生的事情。最遥远的星星发出的光，到达人类所需的时间也最长；在它尚未到达时，人类否认——遥远的天际有星星。“一种思想需要多少世纪才能被理解？”这也是一种标准，同时也得对此进行等级划分和制定规则，这对于思想和星星来说都是必要的。

286

“这儿自由眺望，精神无比昂扬。”^①——可是还有一种与此相反的人，这种人也处于一定的高度之上，也展现了自由的前景——可却两眼往下看。

287

什么是高贵？如今高贵这个“词”对我们仍具有什么意义？高贵的人以何种方式表现自己，在平庸向我们袭来、一切都变得灰暗不明的这种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如何辨认出高贵的人？确立其高贵地位的并不是其行动——行动总是模糊不清的，总是神秘莫测的；也不是其“作品”。如今在艺术家和学者当中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通过其行为暴露出，对高贵的深切渴望驱使着他们；但是，这种对高贵的需要从根本上不同于高贵灵魂本身的需要，实际上反而是缺少高贵灵魂的明显而危险的标志。在这里，我们再次在一种新的和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借用一古老的宗教套语：起决定作用的和决定品级的，不是行为，而是信仰。高贵的灵魂拥有的是某种对自身的根本肯定，这是一种不能被追求、不能被发现、或许也丢不掉的一种东西。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崇奉玛利亚的博士所说的话。



高贵的灵魂是自己尊敬自己。

288

有一些不可避免地富有理智的人，让他们扭动自己的身子，用手捂住自己奸诈的眼睛好了——似乎他们的手不是告密者；最终总是会暴露出，他们有某种东西要隐藏——即，理智。至少尽可能长久地进行欺骗，并成功地表现得比实际上蠢的最巧妙方法之一——此种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被称作热情，其中包括属于热情的东西，比如美德。因为正如不得已而了解了这一点的加利亚尼所说，美德即热情。

289

在一个隐居者的著作中，人们总是可以听到某种旷野的回声，某种孤独的窃窃私语和怯生生的警觉；在他最激烈的言辞中，甚至在他的哭泣中，发出的是一种新的、较为危险的沉默之声，隐藏之声。他孤独地日日夜夜、年复一年地坐在那里，灵魂陷于常见的冲突和对话之中，他已变成了洞熊，变成了寻宝者、保护珍宝者，或是洞穴中的一条龙——他的洞穴可能是个迷宫，也可能是个金矿。其思想本身最终具有了自己的一种暮色，具有了一种很深的土壤气味，即某种无法与人交流、令人讨厌的东西，冷冽地吹在每个过路者的身上。这位隐居者不

认为哲学家——如果哲学家首先总是隐居者的话——在其著作中陈述过自己真正的最终看法，写书不正是为了隐藏我们内心的东西吗？他甚至会怀疑哲学家究竟能否具有“最终的真实”看法；会怀疑在哲学家的每一洞穴之后，是否一定有一更深的洞穴，除表面的东西外，是否有一更宽广的、更奇异的、更丰富的世界，在每一底部之下，每一“基础”之下，是否有一深渊。每种哲学都是表面上的哲学。一隐居者得出的结论是：“哲学家突然停在这里，回头张望和四处张望，有某种随意性；他在此处把铁锹放在一边，不再往深处挖，也有某种随意性——而且其中还有某种可疑的东西。”每一种哲学也掩盖了一种哲学；每一种看法也是一隐藏处，每一字词也是一个面具。

290

每一深刻的思想家较为害怕的是被人理解，而不是被误解。后者或许会伤害他的虚荣心；但前者会伤害他的心灵，他的同情心，他的心灵总是说：“哦，你怎么也和我受过同样的苦？”

291

人，是一种复杂的、爱撒谎的、狡诈的和不可思议的动物。令其他动物感到可怕的，是他的狡诈和智慧，而不是他的力量。人发明了问心无愧，最终把灵魂当作某种简单的东西来享受；



因而，全部道德便是一种长期的、厚颜无耻的造假活动，借此，才有可能在看到灵魂时得到享受。从这观点来看，“狡诈”这一概念或许包含有比一般所认为的多得多的东西。

292

一个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断地经历、看到、听到、觉察到不同寻常的事情，并希望和幻想着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特有的一种事件和闪电，似乎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和下面；他自己或许就是一场孕育着新闪电的暴风雨；是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在其周围总是有隆隆声，有窃窃私语声，有人惊得目瞪口呆，有奇怪的事情在发生。哦，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常常逃离自己，常常害怕自己——但好奇心又总是使他“恢复自制力”。

293

一个人如果说：“我喜欢这件东西，我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打算保护它免遭每个人的损害”；一个人如果能处理一件事情，能使决心付诸行动，能坚持自己的看法，能占有一个女人，能惩罚和回击傲慢无礼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能发怒，能运用武力，使弱者、受苦者、被压迫者，甚至动物乐于服从他和自然而然地归属于他；总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生来是个主人——

喔，如果这样的人有同情心，那这种同情心才具有价值！但那些受苦者的同情心又有什么价值！那些鼓吹同情的人的同情心又有什么价值！如今几乎整个欧洲，有一种对痛苦的病态过敏和敏感，还有一种令人反感的、不可抑制的唠唠叨叨，一种女人气，这种唠叨和女人气，在宗教和哲学上胡说八道的帮助下，试图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高人一等的东西——有一种对痛苦的十足崇拜。我认为，这些幻想家所谓的“同情心”没有男子汉气概，总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我们必须坚决而彻底地杜绝这种最新的低级趣味；最后，我希望人们把“快乐的科学”这个有效的护身符，挂在胸前和脖子上，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低级趣味的影响。

294

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恶习。——有个哲学家，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曾试图在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面前诋毁笑，他说：“笑是人性的一大缺点，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应努力加以克服。”（霍布斯语）——而我却宁愿按照笑的质量给哲学家评定等级——最高一等是那些能发出宏亮笑声的哲学家。假如诸神也作哲学思考（由于许多原因，我坚信这一点），那我确信，他们由此也知道如何以超人特有的新方式大笑——尽管会损害所有严肃的事情！诸神喜欢嘲笑，即便谈论神圣的事情，他们似乎也禁不住发笑。



295

心灵的守护神，那个巨大而神秘的东西具有的守护神，那个诱惑之神和那个凭良心行事的捕鼠者，他的声音能传入每一灵魂的地狱之中，他说的每一句话和投射的每一瞥，无不带有些许引诱的动机和味道，与他的完美相适合的是，他知道如何露面，不是像上面说的那种样子，而是披上伪装，对其追随者进行额外的限制，迫使他们更加靠近他，更加热诚和全面地追随他。心灵的守护神，强使每个大声喧哗和自负的人保持沉默，给他们关心和照料，抚平狂躁不安的灵魂，使它们体验到一种新的渴望，希望像镜子那样平静地躺下，映照出高高的天空。心灵的守护神，教会了笨拙和过于急躁的手如何停顿，如何更为灵巧地把握；他可嗅出隐藏的、被人遗忘的财宝，可嗅出厚厚的黑色冰层之下点点滴滴的善和甜甜的精神性，可探测出长久掩埋在泥沙中的每一粒黄金。每个人与心灵的守护神接触之后，离开时都会感到更加充实；不是受到了偏爱或受到了惊吓，不是对其他人的好事感到高兴或感到压抑；而是自身感到丰富充实，感到比以前精神振奋，似乎迎面吹来一股解冻的春风，冰融化了；也感到更加没有把握，或许更加敏感，更加脆弱，更加易受伤害，但心中充满了叫不出名字的希望，充满了新的意志和倾向，充满了恶意和相反的倾向……。但朋友们，我正在做什么呀？我正在跟你谈论谁呀？我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他的名字？你是不是自己已经觉察出这个想要受到如此称赞的、值

得怀疑的神和人是誰？因為，像每個自童年起便總是在外國跑個不停的人經歷的那樣，我也在旅途中遇到過許多陌生和危險的人；不過，一次又一次地，遇到都是我剛談到的那個人，其實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就是那個偉大的、說話支支吾吾的人和誘惑者。如你所知道的，我曾暗中無比崇敬地把第一批果實獻給了他——在我看來，我是最後一個向他供奉祭品的人，因為我尚未發現有誰能理解我當時所做的事情。然而，與此同時，我却對這位神祇的哲學有了很多的了解，而且如我說過的，我是酒神的最後一位真傳弟子。朋友們，或許我如最終也可以讓你們尝尝這種哲學的味道？講授這種哲學的聲音要壓低，惟有低低的聲音才合適，因為此種哲學講的都是難以理解的、新的、陌生的、奇妙的和不尋常的事情。狄俄尼索斯是個哲學家，所以眾神也作哲學思考，這一事實在我看來是件新奇事，並非沒有圈套，就是在哲學家當中也會引起懷疑。在你們當中，我的朋友們，反對者也許較少，只不過感到這一事實來得太晚了，來得不是時候；因為，我已覺出來，你們現在不願意相信神和神祇們。或許，我應更加直言不諱，說些逆耳的話。的確，酒神在以下對話中向前走了一步，走了很遠，總是超過我許多步。……實際上，根據人类的習慣做法，我本應授予他一些光彩奪目的、華而不實的榮譽稱號，本想讚美一番他作為研究者和發現者表現出來的勇氣，讚美一番他的無所畏懼的真實、誠實和對智慧的熱愛。但酒神不知道如何處置所有這些令人尊敬的虛名。他會說：“這些留給你們自己和像你們這樣的人吧，其他人誰又會要它們！我——有什麼理由遮盖我赤裸的身子！”人們是不是覺得這種神和哲學家缺少羞恥心？他有一次曾說：“在某些



情况下我爱人类。”并因此而提及了在场的阿里阿德涅^①：“我认为，人类是一种招人喜欢的、勇敢的、有发明创造力的动物，地球上没有什么能与其匹敌，他能穿过所有迷宫不断前进。我喜欢人类，常常想如何能使他进一步提高，使他更加强大、更加邪恶、更加深刻。”更加强大、更加邪恶、更加深刻？”我惊恐地问。“是的”，他再次说，“更加强大、更加邪恶、更加深刻；也更加漂亮”。这位诱惑之神于是微微一笑，似乎他刚刚说了一些娓娓动听的恭维话。人们由此会立即看出，这个神不仅缺少羞耻心；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一些事情上，众神都可以教导我们人类。我们人类——人性多了一点。

296

哎呀！你们到底是什么呀，我写下和画出的那些思想！不久以前，你们还是那么色彩斑斓、年轻和心存恶意，充满了那么多的刺儿和暗香，使我打喷嚏和发笑——可现在呢？你们已不再让人有新奇感，其中有些恐怕会很快成为真理，它们看起来那么不朽，老实得那么可怕，那么令人生厌！能是特种样子吗？那么我们写下和画出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使用毛笔的中国官吏，我们这些使适合于写下的东西成为不朽的人，我们单靠自己能画出什么呢？哦，只能画出马上要褪色和走味的东西！哦，只能画出力量耗尽的、渐渐远去的暴风雨和过时的阴郁感

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弥诺斯的女儿。——译者



情！哦，只能画出迷失了方向和飞累的鸟儿，它们现在听凭自己被手捉住——被我们的手！我们使不能活得更久、不能飞得更久的东西不朽，只是使那些力量耗尽而温和的东西不朽！只是为了你们的下午。你们，我写下和画出的思想，只是为了这些思想，我才拥有颜料，许多种颜料，或许许多各式各样的颜料，五十种黄色颜料、棕色颜料、绿色颜料和红色颜料。但谁都不会由此而猜测出你们在早晨是什么样子，你们，从我的孤独中突然迸发出的火花和产生的奇迹；你们，我过去的、可爱的——罪恶的思想！



该书从根本上讲是对现代的批判，包括现代科学、艺术、乃至政治，同时提出与它们对立的类型。他要尽可能地摩登，他是这种高贵而肯定的人。在后一种意义上说，该书是高等人的读物。这个概念比以往所认为的更具精神性、更激进。人们要经得这一概念，则体内必须具备这种勇气，必须无畏才行……



前 言

假设真理是女人——那会怎么样呢？难道就没有理由认为，所有哲学家由于一直是独断论者而未能理解女人吗？——难道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通常一本正经、死乞白赖地向真理献殷勤是赢得女人的笨拙的不恰当方式吗？的确，真理从未让谁赢得她的芳心；眼下每一种教条都悲伤而沮丧地站在那里——如果它仍站着的话！因为有些嘲笑者认为，每一种独断理论都倒下了，一切独断理论都躺倒在地上——岂止是躺倒在地，更是在喘最后一口气。老实说，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哲学中的一切独断阐述，无论显得多么庄严，无论采用多么不容置疑的手法，都只不过是一种崇高的傻气和幼稚；也许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到底需要些什么东西，便足以给独断论者们迄今竖立起的一座座雄伟壮丽的哲学大厦打好地基：或许需要某种远古以来的民间迷信（譬如相信灵魂不死的迷信，此种迷信以主体和自我迷信的形式，仍在作害为孽），需要玩弄词语，需要在语法上做手脚，需要对很有局限性的、很个人化的、很人性的一太人性的事实，作厚颜无耻的抽象和概括。这些独断论者们的哲学，恰似年代更为久远的占星术，仅仅是一种对几千年以后事情的允诺，在它上面，我们或许比在任何真正的科学上，花费了更多的劳动、金钱、敏锐和耐心：多亏有了它，有了它在亚洲和



埃及的“超脱尘世的”抱负，我们才有建筑上的宏伟风格。看来，所有伟大的事物要永久地铭刻在人类的心中，就得先被画成巨大而可怖的漫画，在地球上四处游荡：独断论哲学——比如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和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就是一幅这样的漫画。让我们对它表示谢意吧，尽管必须承认，人类迄今所犯的一个最为严重、最招人讨厌且最为危险的错误，就是独断论错误——即柏拉图杜撰的纯精神和善本身。但这个错误现在已被克服，摆脱了这场恶梦的欧洲又能自由地呼吸了，至少能较安稳地睡觉了，于是我们这些有义务不睡觉的人，继承了反对这种错误的斗争所培育起来的全部力量。像柏拉图那样谈论精神和善，等于颠倒事实真相，等于否定生活的全景——否定生活的根本状况。人们实际上会像医生那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古代最优秀的人物柏拉图，怎么会染上了这样的病？邪恶的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使他堕落了？苏格拉底或许真的毒害了年轻人，罪有应得，应该被毒死？”但是，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更加简单明了地说，对“民众”而言就是——反对几千年来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对“民众”而言就是柏拉图主义），却在欧洲产生了一种灵魂上的极度紧张，以前在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紧张；使用拉得这么紧的弓，现在人们可以瞄准最遥远的目标。实际上，欧洲人觉得这种紧张是一种痛苦，已庄重地做出了两次尝试来松开弓弦：一次依靠耶稣会教义，一次依靠民主启蒙——民主启蒙借助于新闻和读报自由，实际上会使精神不再那么容易陷于“痛苦”！（德国人发明了火药——真是多亏了他们！但他们也使一切整齐化——他们发明了印刷术。）但我们既不是耶稣会会士，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甚至不是十足的

德国人，我们是善良的欧洲人，是自由精神，非常自由的精神——我们仍在受苦，所有精神上的痛苦和拉得过紧的弓！或许还有箭、义务，说不定还有要瞄准的目标……。

1855 年 6 月写于上恩加丁，西尔斯 – 玛利亚



引 言

自康德以来，还没有哪位哲学家像弗里德里希·尼采那样，给现代思想打上了如此不可否认的烙印。即便是几乎震撼了全欧洲的叔本华，也没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不仅在道德和文学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尼采那塑造人心的巨手在起作用，使人精神振奋而饱满，而且在教育学和艺术，政治和宗教等方面，也可以看到他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

有关尼采的生平材料少之又少，而且很简单。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洛肯，这是普鲁士萨克森州的一个小村庄；有意思且自相矛盾的是，这位最可怕、最具破坏性的基督教及其理想的批判者，其父系和母系中却有长长一大串的神学家。尼采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出生于1846年，弟弟出生于1850年。妹妹取名为特里斯·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后来成为尼采最亲密的朋友、保护人和最多产的尼采传记作家。弟弟约瑟夫则生下来不到一年就死了。父亲去世后，全家迁居璠姆堡；此时尼采年仅6岁，被送入了当地的一所市立小学；后来退出该小学，就读于一家私立小学，准备报考教会文科中学。几年之后，尼采考入了著名的普福塔州立中学，1864年入波恩大学。

正是在波恩，尼采的宗教观点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也正是



在这里，他与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里敕尔建立起伟大的友谊。里敕尔转到莱比锡大学后，尼采也跟随他来到莱比锡。在这里，他遇到了瓦格纳，结识了艾尔温·罗德，发现了叔本华，还在内心深处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激起这个年轻人狂热的爱国热情。他两次申请服役，但都因为近视而未能入伍。不过，1867年秋颁布了新的征兵条例，尼采在瑙姆堡应征，加入了炮兵部队。但在训练中从马上摔下，胸部严重受伤，不得不永远退役。

1868年10月，尼采返回莱比锡大学，不久，年仅24岁的他，便受聘于巴塞尔大学，出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两年后，普法战争爆发，加入医疗部队，当了一名志愿看护兵。但他身体很差，担负不了这项工作。随后染上白喉和严重的痢疾，不得不完全中断服役。他妹妹告诉我们，这场病使他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是造成他以后身体状况非常差的最主要原因。身体尚未复原，他便重新开始教学；正是因为本来就很虚弱，又加上这种新的紧张工作，导致他健康状况终于崩溃。

1872年，尼采的第一本重要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问世；1873年，他写出了一系列著名的小册子，后来这些小册子被汇编成一本书，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糟，于是，时而在瑞典度假，时而在意大利度假，力图使身体复原。在瑞典，他住在瓦格纳那里，但1876年，他与这位作曲家的友谊开始冷却。他曾去拜罗伊特听了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对瓦格纳与基督教的妥协，他感到愤恨和厌恶。但由于非常喜爱瓦格纳这个人，直到10年以后，他才把长久埋在心里的话，变成文字，写出了那本抨击瓦格纳的有名著作。



《人性的，太人性的》出版后一年，病情加重，迫使尼采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位；两年之后，他的第一本充满建设性思想的著作《朝霞》问世。尼采的余生都花在想要恢复健康的徒劳无益的努力中。一连 8 年，在忙于写作的同时，他不断寻找能使身体复原的气候——先后去过瑞典的西尔斯-玛利亚、热那亚、摩纳哥、墨西拿、格吕内瓦尔德、陶特堡、罗马、瑙姆堡、尼斯、威尼斯、芒通和里维拉，但都毫无用处。他经常生病，大部分时间形单影只。在这段漂泊不定的时期，他与精神抑郁和肉体痛苦展开了不懈的对抗。在这 8 年中，尼采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快乐的科学》《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看哪这人》《尼采驳瓦格纳》，以及大量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他最后一部巅峰之作《强力意志》。尼采这一时期的生活未发生什么大事。或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识路·沙乐美。但甚至连这个插曲也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只是由于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显得很突出，而被传记作家大大地渲染一番。

1889 年 1 月，尼采中风，预示着死亡的逼近。其行为举止突然变得令人担忧，表现出许多乖僻的行为，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损害。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尼采不是逐渐精神失常的，他实际上一生下来，精神就不正常。但没有证据能证实这种看法。一些人宣称，尼采的著作是疯子的著作，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著作是清晰而严密思考的产物；他与朋友交往时表现得相当克制，并无异常；他的大量书信直至最后，无论是感情还是语气，都未表现出任何变化。他的精神失常来得很突然，事先毫无预兆；利用他生命最后几



年的精神状态来批评他的哲学，是幼稚无知的。必须依靠内部的证据来断定他的著作是否站得住脚，由此立场判断，他的著作绝对是健全精神的产物。

尼采的精神崩溃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为了医治失眠症而服用过多的安眠药，用脑过度，经常处于失望和贫困中，精神孤独，长期忍受肉体痛苦，关于他发疯前几天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他的朋友奥维贝克接到一封满是胡言乱语的信后，随即赶到都灵，发现他精神崩溃了。尼采被安置在耶拿的一家私人疗养院中，稍稍恢复后，便返回了瑙姆堡。后来，他妹妹特里斯·尼采将他迁移至魏玛的一幢别墅中；三年后，1900年8月25日，尼采去世，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洛肯村。

《善恶的彼岸》于1885年夏动笔，翌年冬完成。写作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和阐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是为写作他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强力意志》作准备。尼采在该书中力图界定“善”与“恶”这两个相对的词，力图区分不道德和非道德。他察觉到人们为使古代道德准则和现代人的需要相一致所做的努力，是有矛盾的，他认识到人们经常在道德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作出妥协。他的目的是确立道德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行为构造一可操作的基础。所以，《善恶的彼岸》是尼采对一种新道德体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触及了其哲学的许多最深层的原理。

《善恶的彼岸》第一章篇幅很长，题为“哲学家的偏见”，在这一章中，尼采勾勒出他的辩证法将采取的路线。他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阐述，首先是分析和驳斥先前的教条主义者所采



用的思维方式，其次是解释他自己的哲学所依据的前提。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实际也阐明了其强力意志学说的基本原理。该章确立了尼采的哲学立场，严密解释以下的各章采取的路径。所有真理都具有相对性，这是他在以前的著作中常常采用的一个假设，在该章中，他用比喻和论证为这一假设作了辩护。利用其他主要哲学类型作为探究的依据，他对真理的绝对性提出了质疑，指出了最后定义的困难在何处。尼采在其分析和批判中，并非仅仅进行摧毁；他还暗在“强力意志”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体系。这个短语在第一章分析研究中出现过多次。随着论述的展开，这种强力意志学说也得到了逐步发展。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长达 26 页的第二章中，给他所谓的“自由精神”下了最精彩的定义，即：善于思考的人、知识贵族、哲学家和统治者，并接连用一些较长的段落——要长于他惯常的段落——描述了这种优等人的主要特点。不过，千万不要把“自由精神”混同于超人。前者是当今的人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中必须跨越的“桥梁”。在该章对自由精神的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瞥见他最为突出的精神特征。在此之前，例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只是对他作了部分的说明，而在此则概述了他的本能和欲望，他的习惯和活动。而且，该章还解释了他与劣等人的关系以及与周围生物的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章，因为它在不少地方详细阐述了尼采的许多主要哲学原理。另外，这一章还对不同阶级作了严格区分，虽然至此尚未界定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但却对这两者作了对照比较，并通过区分主人和奴隶，明确提出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人的行为举止标准。



本书第三章对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而意义深远的分析。这一章谈到了基督教的各种影响，但论述范围甚至比《反基督》一书还要广，该书中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这里见到。此章论及了人类的许多内心体验（这些体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宗教教义的产生），追溯了信仰本能的起源，并对宗教信仰的结果和个人及种族的需要作了对照比较。尼采在研究宗教情绪时把精力放在了以下一些问题上，如宗教狂热和纵欲之间的关系、教徒想要否定意志的企图、宗教上的感激之情向恐惧的过渡、圣徒崇拜背后的心理等。该章还阐述了宗教上的残忍行为经历的各种重要阶段，阐述宗教上各种献祭行为背后的动机，颇具启发性。

这种对宗教生活的批判，包含了尼采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诋毁尼采学说的人认为，全面接受尼采的理论会使社会陷于混乱。尼采并不是想要所有的人都接受他的信念。他猛烈抨击基督教，目的不是要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相信他们的偶像，而只是试图使强者摆脱基督教的束缚，因为基督教仅仅适合于弱者的需要。他既不希望也不想使广大民众抛弃基督教或任何类似的得自宗教教条的安慰。相反地，他谴责那些力图削弱宗教基础的浅薄无神论者。他认为，实际上需要宗教来充当奴隶道德的基础，因而在该章中他敦促统治者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作一种统治手段——当作惩罚和教育的工具。他的整个道德体系是建立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完全分离的基础之上；因而应该认识到，他的“超越善恶”的学说只适用于上等人。将它运用于所有阶级，会使尼采的整个道德体系陷于寸步难行和荒唐可笑的境地。



考察完宗教情绪，尼采进入了一更为广阔的道德研究领域，力图追溯道德的历史与发展。他指责哲学家回避真正的道德问题，即：检验道德信念背后的信仰和动机。这就是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在题为“道德的自然史”一章中，他考察了道德的起源——这种考察扩充成了他接下来论述更为详尽的著作《道德的谱系》。不过，本章分析的范围和深度却超过了他以前的著作，如《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在此之前，他只是分析道德准则和体系，只是分析道德和不道德行为，只是分析对行为所作的判断。在《善恶的彼岸》中，他把道德偏见视为与人类进步共同起作用的力量。另外，该章还有一种明确的建设性态度，而这在他以前的著作中是没有的。

在题为“我们学者们”的一章中，尼采继续给哲学家下定义，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类型的人。除了描述这种“自由精神”的智力特征外，该章还列举了那些冒充哲学家的现代人的缺点，并分析了科学家和天才，估量了他们在社会中的相对重要性。实际上，尼采在这一章中最为精确和全面地给肩负着人类进步重担的人下了定义。对智力领路人所做的这些评价，对研究尼采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理解这些评价，便有助于理解尼采后来写的著作。

“我们的道德”一章包含有许多重要材料，涉及尼采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该章较为一般地探讨了人的行为，较为广泛地研究了道德，并辅之以对具体道德特性的研究。这一章对现行道德提出了质疑，弄清了它们的历史意义，考察了它们对不同类型的人所具有的价值，考察了奉献、同情、手足之情、为他人服务、忠诚、利他主义、相同的理想等道德的价值，证明这

些道德与现代社会交往的需要是不相容的。针对这些道德，尼采提出了一些较为严厉和较为严格的行为方式，指出它们能在哪些方面适应目前人类发展的需要。该章为建立一种新的道德做了伏笔，还解释了双重道德准则。双重道德准则是其哲学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在提出双重道德这一概念之前，尼采力图确定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指出社会不仅需要每个女人发挥女性的职能，而且需要保持两性关系中男女截然不同的作用。

尼采的许多哲学观念是在最后一章中形成的。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学说，虽然前几章已做了伏笔和部分说明，但却是在本章中直接提出来的，并特别解释了构成主人阶级“高贵性”的那些道德和特性。尼采指明了他所谓的贵族肩负的责任，而且根据个人地位为人类性格特点作了分类。酒神狄俄尼索斯这一概念，是尼采后来所有著作的基础，这一章对其作了首次直接的阐述和运用。尼采认为，较为冷酷的人类性格特点，如利己主义、残忍、傲慢、报复和占有，要优于柔弱的道德，如同情、仁慈、宽容、忠诚和谦卑，宣称前者对于天生的贵族来说，是其道德准则的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里开始了价值的重估，这一工作要在《强力意志》一书中才能完成。

威拉德·亨廷顿·赖特



发现遗产书系

- 威廉·莎士比亚 [法] 维克多·雨果
善恶的彼岸 [德] 尼采
我毕生的故事 [法] 乔治·桑
我生命的附言 [法] 维克多·雨果
智慧的七大支柱 [英] T.E. 劳伦斯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善恶的彼岸

N
Liesche